

中國人民日報社
中國人民日報社

血雨腥风十四年

哲里木盟伪满时期史料

《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四辑

政协哲里木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10

血雨腥风十四年

哲里木盟伪满时期史料
《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哲里木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通辽市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170,000 开本：787×1062 印张：8
印数：1—7000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冯庆和 封面设计：舍冷业喜
封面题字：王再天

NXTZZ90—81 定价：3.50元

重溫民族的悲劇，更加
珍惜祖國光明的今天。

阿拉坦敖其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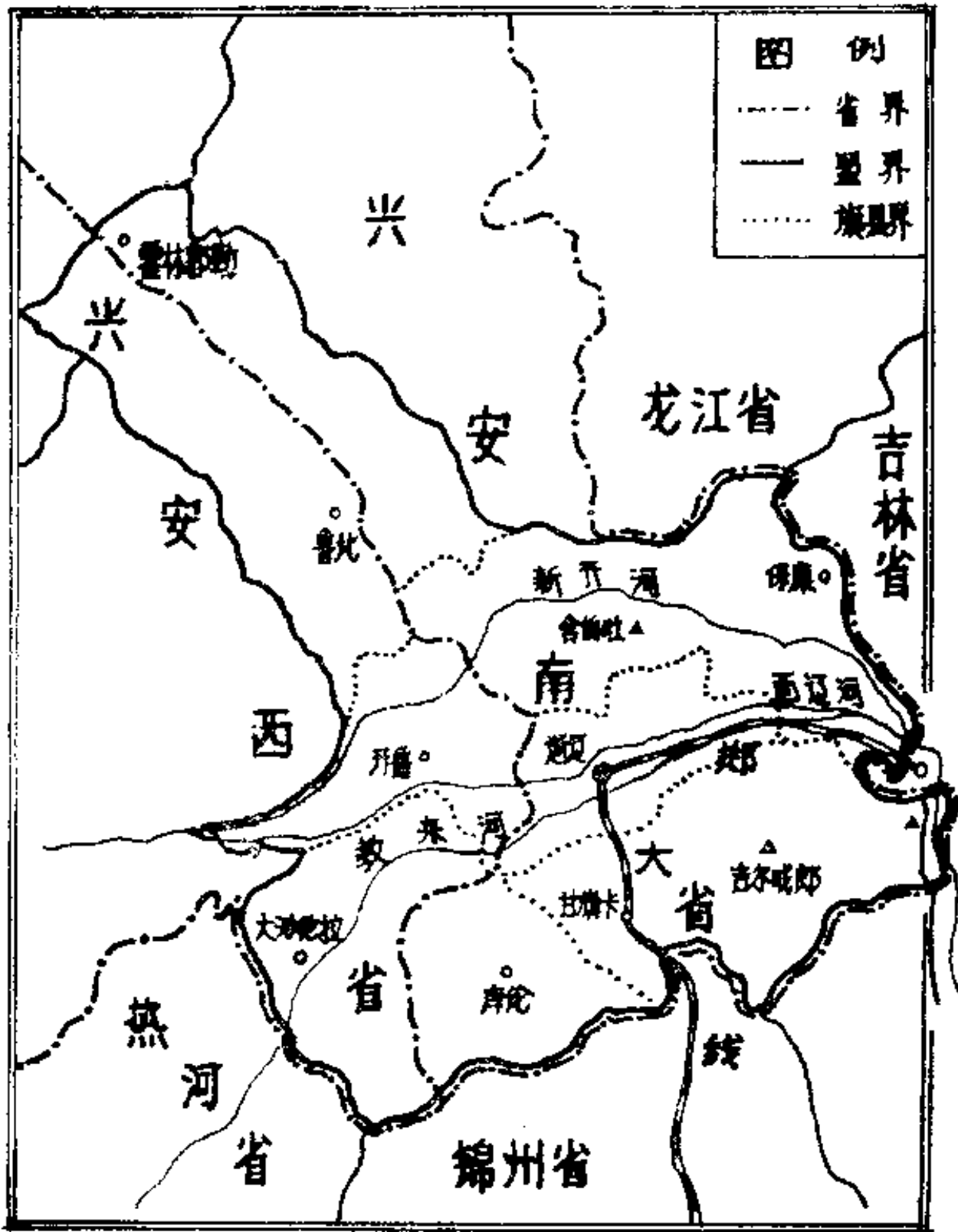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三月

石志同书

曹振、孔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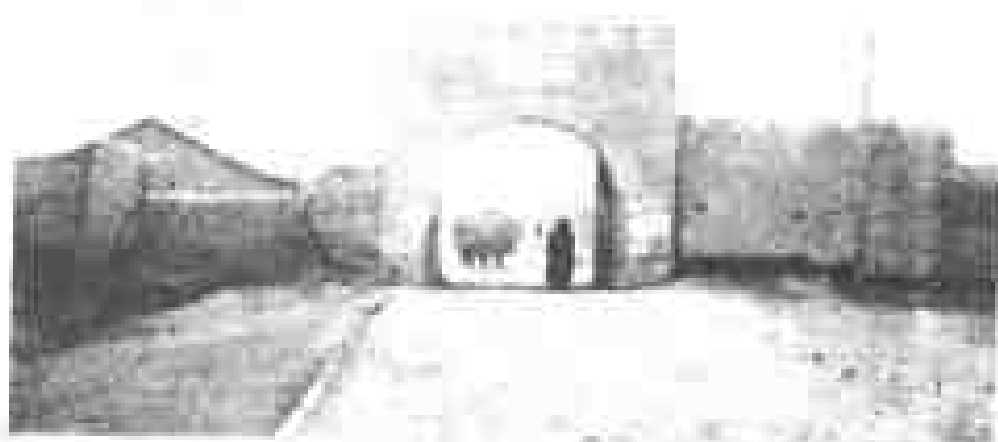
张平武
如平武

伪满时期哲盟分属略图





遊江郵政局



开魯崇仁門



河鉄我家店菜種坂



通江紙工公會



通江尋常小學



通江電報電話局



通江縣立農民市場



通江稅捐局



重原村公所



通辽地方法院



开鲁街一带

本书插图照片除“开鲁崇仁门”“开鲁城一带”为玉泉平提供外，其余均翻拍于通辽市档案馆。

目 录

| | |
|--------------------|--------------|
| 序..... | 特日根 (1) |
| 伪满时期哲里木盟概述..... | 舍冷那木吉拉 (4) |
| 伪满时期的科左中旗..... | 达木林 (22) |
| 伪满时期的奈曼旗..... | 李海晨 (28) |
| 伪满时期的东科后旗..... | 巴根那 (33) |
| 伪满时期的扎鲁特旗..... | 马尼加布 (36) |
| 伪满时期的库伦旗..... | 齐克奇 (39) |
| 伪满时期的开鲁县..... | 张万有 (14) |
| 伪满时期的通辽县..... | 孙甫 (19) |
| 兴安南警备军..... | 张维荣 (43) |
| 关东军五三部队..... | 高赵德宝 (48) |
| 内蒙古自治军的建立和解体..... | 色希浩 (53) |
| 伪满通辽县警务系统..... | 周超 (57) |
| 我所知道的兴安西省..... | 暴有山 (61) |
| 伪满开鲁县基层统治机构..... | 赵国恩 (66) |
| 伪满协和会..... | 关朝格珠 (68) |
| 伪满兴农合作社..... | 白广义 (73) |
| 满洲国的“新学制”..... | 王魁 (77) |
| 伪满时期扎鲁特旗的集屯并户..... | 张戒三 (79) |
| 科左后旗的喇嘛学校..... | 特木勒巴拉 (81) |
| 吉尔嘎朗国民优级学校..... | 特木勒巴拉 (83) |
| 平岗公司..... | 王凤翥 (91) |

| | |
|------------------------|-------------|
| 高文彬义勇军的抗日活动..... | 王欣(94) |
| 周荣九与“八仙筒事件”..... | 张斌(105) |
| 科左中旗的抗日义勇军..... | 赵道冷阿(111) |
| 东大营新兵暴动..... | 魏连云(115) |
| 马鸣鸾和他的《天书》..... | 刘琛 曹国卿(117) |
| 达王府四校的一起学生罢课斗争..... | 李景唐(120) |
| 蒙旗师范学生参加东蒙自治运动的 | |
| 回忆片断..... | 白音布鲁格(124) |
| 忆开鲁“二高”..... | 高原 曹国卿(129) |
| | |
| 伪满的“勤劳奉仕”..... | 李万贵(135) |
| 田宝屯鼠疫追述..... | 陈铎 杨玉福(139) |
| 科左后旗出荷万头牛纪实..... | 达瓦敖斯尔(142) |
| 日本侵略者在开鲁实行的经济统治..... | 王广钧(145) |
| 吉尔嘎朗屠杀惨案..... | 白广誉(149) |
| 全家出劳工..... | 程恩英(153) |
| 三次出劳工..... | 张宏耀(158) |
| 劳工在异国..... | 宝勒朝鲁(163) |
| 伪满的“大烟组合”..... | 李志武 周义(169) |
| 十三年血泪史..... | 吕景清(173) |
| 我在开鲁兴农金库的遭遇..... | 张雪中(187) |
| 少年时的一段苦难经历..... | 张连学(193) |
| 通辽沦陷时期的国民党地下组织..... | 杨德田(198) |
| 共产国际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活动..... | 色希浩(208) |
| 钱家店农民道场..... | 魏连云(221) |
| | |
| 抗日爱国人士张林标..... | 曹国卿(225) |

| | |
|----------------------|----------|
| “九·一八”事变后的达尔罕亲王····· | 包静安(230) |
| 伪满见闻拾零····· | 贺佐(233) |
| 通辽电业史上的一幅悲壮画卷 | |
| ——忆伪满时期的通辽发电厂····· | 贺胜文(238) |
| 铁路装卸工人的一次罢工斗争····· | 雷明义(245) |
| 后记····· | (247) |

序

哲盟行政公署盟长 特日报

1991年9月18日，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值此，哲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血雨腥风十四年——哲里木盟伪满时期史料》一书。书中所收录的史料，大多是亲身经历过伪满时期的人们对十四年苦难生活的忆述。我读了之后，感到很熟悉，因为我本人曾耳闻目睹过当时的情景。与此同时，心里又感到一种难忍的痛楚，因为那是一段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亡国奴的历史。

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的历史。

哲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把有关资料及老人们撰写的亲闻、亲见、亲历的文稿编辑成书，正逢其时。它对于我们回顾历史，激励今天，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外侵略扩张，是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本质所决定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能够胆大妄为，以“九·一八”为开端，不脛三个月的功夫，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内蒙东部？这从中国历史来看，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从清朝末期开始的百多年里，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民无宁日，国力消耗殆尽，偌大的中国落后了。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加落后。从外部原因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益膨胀的日本帝国主义意欲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他们的侵略野心构想是：“欲占中国，必先满洲”（即东北三省和内蒙古

东部)，也就是说侵占东北是侵吞整个中国的前奏；果然，到了1937年，又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展开了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东北时，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出发，命令几十万东北军“绝对不许抵抗”而撤出东北，把东北三千万各族同胞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蒋介石却调兵遣将去江西围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日本侵略军侵占内蒙东部以后采取了他们惯用的反动伎俩：一方面赤裸裸地进行武装侵略；另一方面又笼络反动上层人物（包括蒙古王公在内）。同时也迷惑了许多天真的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说什么帮助他们搞“内蒙自治”，实际上是拉拢他们成为日寇侵华的帮凶，为其侵华政策效劳。

在侵华日军血腥统治哲盟十四年的过程中，我盟各族人民，包括部分进步的蒙族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同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发生于1935年的奈曼旗周荣九组织的“抗日救国军”袭击驻八仙筒的日军事件；发生于1936年的东大营新兵暴动事件等等。一曲曲抗日悲壮之歌，在这本书中历历可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自始至终坚持抗战，越战越勇，越战越强。1945年，随着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哲盟各族人民和东北同胞一起获得了解放。这时，早已放弃东北，跑到峨嵋山去的蒋介石，又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军东北和内蒙东部，摘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妄图恢复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哲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参加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建立了渴望已久的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伟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我们今天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哲里木的基石。继续进行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坚持搞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我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想使我们离开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

“九·一八”事变距今已经60周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本书中所记述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一辈在幼小时期经历过的人来说，记忆犹新，对于后生来说，也应有所了解。我们的国家，今天以独立自主的雄姿屹立于世界东方，走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一代一代地热爱她、捍卫她、建设她。这本书应当成为向全盟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我愿意向全盟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青年学生推荐这本书。

作于庚午年九·一八

伪满时期哲里木盟概述

舍冷那木吉拉

(一)

内蒙古哲里木盟与祖国内地广大疆土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长期以来，蒙汉各族人民为开发和建设这片土地，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与此同时历代王朝在统治东蒙古的时候，亦曾在此设置过地方政权，标定行政区划。到了1636年，清朝政府在对蒙古各部首领、王公封官赐爵，在各地“查户口、编牛录”，划定旗界时，将科尔沁部划为四部十旗：一、科尔沁部：科尔沁右翼前、中、后三旗；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二、郭尔罗斯部：郭尔罗斯前、后二旗；三、扎赉特部：扎赉特旗；四、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旗。

遵清廷令，上述十旗札萨克（王）“会盟”于霍林河畔，成立一个盟，称谓“哲里木盟”^{*}，首任盟长系科尔沁右翼中旗（图什业吐）王巴达礼。在中国的版图上从此便出现了“哲里木盟”的行政区划。因十旗大部分游牧于嫩江流域，又称“嫩江十旗”。

* “会盟”（蒙古语：其古拉干）ᠮᠠᠭᠤᠯᠠᠭᠤᠯᠠ 据《清制实录》、《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年间，清廷曾令蒙古四十九旗札萨克举行会盟。“札萨克”（ᠵᠠᠰᠠᠬᠤ）蒙古语含：决定、决议、法典、法律等意。相传：开始使用这一词指旗首领（王）。嫩江十旗札萨克首次会盟的地址在今科右中旗西哲里木的霍林河畔。因河畔盛长一种牧草，当地人称“哲里木草”，又因嫩江十旗札萨克首次在这里会盟，故称哲里木。

清初，在蒙古各旗实行“封禁”政策，到清末才开始逐步“解禁招垦”，使哲里木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划出三府一州、三厅十二县；由于“移民实边”，大量开荒屯田，汉民流入，人口迁徙，民族分布形成了蒙汉等各民族杂居；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封建王、公的领地缩小。

到民国时期，嫩江十旗属蒙、汉分治，旗、县并存。各旗形式上是属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管辖，实际上则分别受地方将军及都统的监督、节制。其中，科尔沁六旗受盛京将军监督；郭尔罗斯前旗受吉林将军监督；郭尔罗斯后旗、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受黑龙江将军监督。境内设置的厅、府、县都由相应的将军管辖。

“九·一八”事变后，哲里木盟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哲里木盟全境（嫩江十旗）归伪满洲国统属。

满洲国政府国务院设立了管辖蒙古地方的行政机构——兴安局。同年8月3日兴安局改称兴安总署，后又改为蒙政部。原哲里木盟盟长齐默特色木丕勒任蒙政部部长。

1933年4月，伪满洲国国务院颁布《蒙政部官制》，设立了直隶于国务院的“特别行政区”兴安省，下设东、西、南、北四个分省。原哲里木盟管辖的科尔沁部六旗、扎赉特旗和通辽县、突泉县辖于兴安南分省。省会最初设在郑家屯，1935年9月迁至王爷庙（今乌兰浩特）。

当时，兴安南分省各旗、县公署所在地：科尔沁左翼前旗——西扎哈齐；科尔沁左翼后旗——吉尔嘎朗；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科尔沁右翼中旗——代钦塔拉；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哈达；科尔沁右翼后旗——察尔森；扎

賚特旗——巴彥哈喇。原哲里木盟所轄的郭爾羅斯前旗，此時劃入吉林省管轄；郭爾羅斯後旗劃入濱江省；杜爾伯特旗劃入龍江省管轄。

1934年10月1日，滿洲國政府令，取消了興安東、西、南、北分省的“分”字，正式成為省的建制。

興安南省除原管轄7個旗以外，將原奉天省管轄的通遼縣和熱河省管轄的庫倫旗劃入興安南省管轄。興安南省省會設於王爺廟，管轄科爾沁左翼前旗、科爾沁左翼後旗、科爾沁左翼中旗、科爾沁右翼前旗、科爾沁右翼後旗、科爾沁右翼中旗、扎賚特旗、庫倫旗、通遼縣。

興安南省總面積7.9萬餘平方公里，地勢南北狹長，北為大興安嶺山地，南部為平原沙丘；森林面積近110萬公頃；主要河流有洮兒河、歸流河、霍林河、新開河、西拉木倫河、老哈河等。總人口約72萬餘人，其中蒙古族為33萬多。耕地面積1萬2千多平方公里；主要農作物為高粱、大豆、谷子、玉米等。粗略統計牲畜頭數：牛11萬多头，馬4萬2千多匹、羊8萬只、豬10萬多头，還有驢、騾等家畜。

1943年10月，日偽撤銷了興安東、南、西三省建制，成立興安總省，省會設在王爺廟，只保留了興安北省建制，省會仍在海拉爾。現在屬於哲里木盟管轄的扎魯特旗、奈曼旗、開魯縣，日偽時期隸屬興安西省管轄。

扎魯特旗當時分左翼、右翼二旗。於康德二年（1935年）5月，偽滿洲國政府下令，將扎魯特左、右翼二旗合併為扎魯特旗。旗公署指定在魯北鎮。

奈曼旗境內，在民國年間，旗、縣並存，由綏東縣、奈曼旗札薩克分管，轄於熱河省。到偽滿時期於康德二年（1935年）滿洲國政府改革地方制度，將綏東縣與奈曼旗合

并，重建奈曼旗新的旗公署，划归兴安西省管辖。旗公署设于大沁他拉。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大举进攻我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所谓“避免军事冲突，用政治方法解决”，大批东北军撤向关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组织筹划伪满洲帝国，推清朝末帝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原东北军的爱国将领如张树森、高文彬等联合了部分蒙古王公及旗军统领（如达尔罕旗骑兵统领刘震玉、卓里克图王府统领李海山等）奋起抗日，有的组成了抗日义勇军。1931年9月在郑家屯南一棵树（即金宝屯一带）击毙日军梨原大尉以下十余人；1932年春开鲁曹家营子战役，义勇军抗击蒙奸韩舍旺率领的日伪军，打死日本顾问松井清助大佐及其下属多人。

“九·一八”事变初期，也有一部分爱国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他们在外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到内蒙进行抗日活动，其中到内蒙东部的有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包尼雅巴斯尔等。也有一部分在当时的奉天（沈阳）蒙旗师范学校学习的爱国学生如哈丰阿、秦国钧等人，相继回到科左中旗，掀起“内蒙古自治”的热潮。

日本帝国主义惯于使用软硬两手即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一方面用优势的兵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另一方面在内蒙古地区收买拢络上层王公及部分文人，对年青知识分子的天真幻想和民族热情给以迷惑利用。早年去日本留学的甘珠尔扎布（系巴布扎布将军的儿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串通拉拢地方上层人物，包括图什业吐（科右中旗）王业喜海顺、科左后旗统领额尔敦必力格（包善一）、科左中旗军务

梅林韩舍旺、莫力庙活佛阿旺吐布旦等人，进行“内蒙古独立”活动，组建“内蒙古自治军”。以科左后旗额尔敦必力格统领的骑兵为主体，组成第一军，额尔敦必力格任司令；科左中旗仁亲宁布（滕海山）统领的骑兵为主体，组成第二军，推举当时担任旗札萨克衙门军务梅林的韩舍旺为第二军司令，滕海山任第二军第一旅旅长。原在嘎达梅林部队当小头目的小喇嘛把嘎达梅林的残部整顿后组建了第二旅，小喇嘛任旅长。从苏联学习归来的特木尔巴根，当时在第二旅任参谋长。甘珠尔扎布会同莫力庙活佛阿旺吐布旦，招兵买马组建了第三军，甘珠尔扎布任司令。以上组建的三个军的兵力约万余人。

日本侵略军总司令本庄繁看到这支武器装备比较全的蒙古骑兵，马上派人来联系，表示全力“帮助”内蒙古自治，并以协助加强“自治军”兵力为名，供应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同时以协助筹划军务为名，派遣松井清助、盘井文雄、小泽一六八等日本军官到自治军内分别担任三个军的军事顾问。当时在第二军第二旅担任参谋长的特木尔巴根等青年学生，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当即向韩舍旺、包善一等自治军头目揭露日本人施展的阴险诡计，但未能奏效。

1931年冬，通辽县城由奉天骑兵第三旅驻防，日本军尚未攻占。本庄繁命令自治军配合日军进攻通辽。到进攻通辽那一天，韩舍旺的第二军在特木尔巴根等人的劝诫下，按兵未动；包善一也没有亲身参战，只派铁管带等五、六十名骑兵参战进攻；当时只有甘珠尔扎布率领第三军，听从日本人的指挥，进攻通辽。由于军心涣散，进攻不力，未能攻克。日本人对蒙古自治军韩舍旺、小喇嘛等人不听指挥又疑又恨，于1932年2月，以协商“内蒙古自治问题”为由，邀请

韩舍旺、小喇嘛等人到奉天开会，会后在归途中，将韩舍旺、小喇嘛二人杀害。

事后，日本军方为防备第二军哗变，便下达命令：让第二军全部人马到钱家店东大营，进行整顿、发军装。在第二军第二旅任参谋长的特木尔巴根识破了日本人的诡计，劝诫旅长仁亲宁布和他的卫队没有去钱家店。第二军由别人带队去钱家店。途中官兵得知韩舍旺、小喇嘛已被日本人杀害后，便纷纷离队他去。有的投奔了抗日义勇军。

包善一（额尔敦必力格）为首的第一军和甘珠尔扎布为首的第三军，归顺了日本军，集结到钱家店东大营，这时仁亲宁布（滕海山）为首的第二军已瓦解。日本人从“内蒙古自治军”攻打通辽失败中得到启示：蒙古部队的领导权必须由蒙古王、公领导。于是将集中到钱家店的“内蒙古自治军”全部改编为兴安警备军，任命巴特玛拉布坦少将（扎赉特旗王爷）为司令。

1931年开始，由日本人諏方、菊竹稻藏（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等人串通拉拢蒙古上层头面人物，以研究有关东蒙古问题为名，在泰赉、郑家屯等地开会。先后参加这两地会议的有：图什业吐胡硕亲王（科右中旗）业喜海顺、苏鄂公旗辅国公（科右后旗）寿明阿、呼伦贝尔公陵升以及博彦满都、玛尼巴达拉等。会议主要内容是东蒙古必须投靠日本，而日本要统治东蒙。

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哲里木盟人民实施殖民统治。首先，在各旗县成立了协和会旗本部，在各努图克成立分会，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开发资源，全力支援、巩固大东亚共荣圈……”其次，在各旗县和努图克设置了为数众多的警、宪、特机构，对各族人

民实行高压统治。在兴安总省省会王爷庙设置了特务机关和宪兵队，日本人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在东蒙古是超越一切的太上皇。其实施统治和镇压的触角，伸进各个角落，其拳养的一大批特务、密探、联络员、谍报员，在广大范围内实行监视。如发现反满抗日情绪的人，则立即告密，逮捕、屠杀，用恐怖手段进行高压统治。

第三、从1937年起伪满洲国在各地强行实施“并村计划”把分散居住的老百姓，一律搬迁集中为部落（村）。在集中的村、屯设甲长、排长管理。康德六年（1939年）在满洲国全国范围内进行“国势调查”，抓壮丁，派出出荷粮、出荷牛，抓劳工。警察署、所遍及各地，老百姓时时都在警察、甲长、排长的监视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第四、从1937年开始，伪满洲国政府推行“新学制”。在“新学制”的教育政策下，不论小学、中学、大学，都必须忠诚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灌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思想。

伪满洲国时期，在现在哲里木盟管辖范围内，除在旗、县所在地以及努图克（区）所在地先后建立了国民初级学校或国民优级学校外，还建立了一部分中学（即国民高等学校），如：巴彦塔拉实业中学第一国民高等学校、伊胡塔产业技术学校、通辽女子实业学校、开鲁女子国高、通辽师道学校等。这些学校除学习些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外，政治方向上都必须灌输忠于日本天皇的奴化教育思想。

在科左后旗广福寺、库伦旗兴源寺各建一所喇嘛学校，教小喇嘛识字学文化，主要学日语。

第五、1940年起实施《国兵法》，推行义务兵役制。其后不久又颁布实施《勤劳奉仕法》，这个法与国兵法联系起来，具有强制性质。凡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每年都要接受一次应征（国兵）身体检查。应征身体检查整个过程

全由日本人掌管。合格者第二年应征入伍，不合格者统一编为“勤劳奉仕队”，到指定地点强行服役三年。这和其他抓去的劳工不同点是：穿军装（不戴军章），学日语，做操练，实际上是半军事化性质的劳工队。

第六、从1938年起，推行“土地奉上”，废除了蒙古王、公的土地世袭制，并在蒙古各旗重新丈量土地，核定纳租纳税制，加深了对蒙汉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

第七、从1937年开始，伪满洲国政府为控制金融流通，在各地成立兴农合作社。兴农合作社的业务即全面垄断经济。农民秋后所收获的粮谷，全部送交兴农合作社，经过检质低价收购。私人买卖粮食，一律按经济犯论处。

在“大东亚战争”开始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为拯救其战场上的败局，在满洲搜刮资源，实行粮食配给制度。1943年又推行物资统制政策。凡棉布、棉线、食盐、火柴煤油、烟酒糖等生活必需品一律由兴农合作社发放或配给。广大农牧民终年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穿着更生布，糠菜半年粮”的饥寒交迫的日子。

第八、日本侵略者为毒害人民，实行其永久统治，种植鸦片，成立鸦片组合。到处设大烟馆，大肆毒害中国人民。

第九、伪满洲国统治的14年中，在东北各地鼠疫就象一个疯狂的恶魔，给广大人民造成了痛苦的灾难，夺去了无数的生命。哲盟境内曾发生多次大面积鼠疫，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政府不但没有去积极防治，相反大肆实行全村关闭，任其死亡，结果使众多百姓死于非命。仅1940年开鲁地区发生鼠疫，先后有106个村受到鼠疫传染，2389人死于鼠疫。

(三)

在满洲国统治14年里，哲里木盟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1931年1月，日本陆军省派到东北进行间谍活动的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途经余公府（今兴安盟科右前旗察尔森）时，被当时的屯垦军击毙。中村被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他们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

1936年3月20日，在通辽钱家店东大营兴安警备军勤务兵小喇嘛，目睹了家乡父老悲惨穷苦生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残酷统治极为不满，于是组织50多名士兵进行了武装暴动，打死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人的5名班长，打开大营的东北角的铁丝网，逃出军营，投奔了抗日义勇军。

1935年7月23日，奈曼旗青龙山镇周荣九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一千余人，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攻打八仙筒警察署，打死日本参事官山守荣治、指导官中根长一，活捉了日本警察署官佐佐木正太郎、警长金座和监务局长穆村等8人。当天召开群众控诉大会，会后，把三名日本人拉到南坨岗击毙，给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以有力打击，大长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志气。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驻王爷庙的机关、学校撤退时，当时的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的师生在葛根庙北山上起义，杀掉率队督战的日本军官数十名，投奔了苏联红军，表现了草原儿女英勇抗日精神。有一首科尔沁草原民歌唱得好：

我们丰美的草原，
惨遭魔爪的蹂躏，

幸福自由的生活，
被水深火热荡尽；
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
只有消灭敌寇才有出路。

1945年8月15日，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全境击溃日本帝国主义关东军，东北全境光复。傀儡皇帝溥仪在沈阳被俘，路经通辽押往苏联，被蹂躏14年的哲里木大地重见光明。

伪满时期的开鲁县

张万有

日军侵占开鲁后不久，将开鲁确定为兴安西省省会。开鲁县成了伪满洲国在内蒙古东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重镇之一。

一、开鲁的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开鲁已久。早在1927年就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名义，派寺田茂七、宫本岩寺、田茂七二等潜伏“经商”。寺田茂七与开鲁大资本家、房产主方彩臣订了租房契约，投资建筑，在开鲁开设了满铁出張所和“三泰兴”商号。寺田茂七等以经商为名，一方面收购土产品，把甘草大量运往日本国；一方面培植势力，网罗奴才，搜集驻军人数、编制、番号、气象资料和物产资源等情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相继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在其策划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后，曾从通辽、舍伯吐方向，两次对开鲁实行武装进犯，都未能得逞。激战中日军松井司令被击毙，日军伤亡惨重退回通辽。

日军两次武装进攻失败后，改变了策略。一面派飞机对开鲁轰炸扫射，以武力威胁；另一面不惜重金，收买、利诱开鲁的上层人物。1933年1月，日本特务通过开鲁普孚号经理、商务会会长姜明远从中撮合；开鲁驻军司令崔兴武派团长李守信赴通辽谈判出卖开鲁的条件。结果崔、李得到重金，很快率部从开鲁撤退。1933年2月24日，日军茂禾支队的一支骑兵，没动一枪一炮进入开鲁县城。从此，开鲁县归入伪

满洲国辖境。

二、设在开鲁的伪政权机构

1、省公署

1933年5月10日，伪满国务院以敕令33号决定将兴安西分省省会设在开鲁。兴安西分省隶属于伪满国务院兴安总署，辖6旗2县，即：东扎鲁特旗、西扎鲁特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开鲁县、林西县。辖区面积64,293平方公里，人口439,617人。1934年12月1日，根据伪满国务院164号敕令，兴安西分省改称兴安西省。所辖东西扎鲁特旗合并为扎鲁特旗，加上原热河省的奈曼旗，仍管辖6旗2县。总面积为74,744平方公里，人口581,790人。

先后出任省长的有：扎葛尔、诺拉嘎尔扎布；先后出任参事官（省次长）的有：中村撰一、除野康雄、都间观三、海村园次郎。

省公署内设厅，开始只设总务、民政两厅，后来增设了警务、时务、实业三个厅。1938年又将总务厅改称省长官房。日本侵略者对这些机构进行严格控制；有的厅为掩人耳目，让中国人当厅长，下设科，科长多由日本人担任；有的厅干脆明目张胆地直接任日本人为厅长。

2、开鲁县公署

据1937年统计，开鲁县面积3,575平方公里，人口69,955人，其中汉族占大多数，少数民族有蒙古、满、回，以及少量的朝鲜人和日本人。

日伪时期先后出任县长的有：姜明远、富察迁、林喜岳、王达善、王镇川。先后出任参事官的有：松勇虎之助、森松重三郎、大泉桂之助、松本忠一。1937年12月，参事官改称副县长。形式上，县长为尊，实则为傀儡。县长受参事官操

纵和监视。

县公署初建时，设内务、总务两科。随着强化统治的需要，增设了警务科、行政科、实业科。各科科长多由日本人担任。县公署的职能机构还有：警察署、地方法院、地方检察厅。

3、基层政权机构

1935年推行保甲制。全县除城区外，农村设8个保公所，村下设屯（甲）。1937年实行街村制。全县设1街9村，即：开鲁街公所，辖镇内崇仁、耀武、正义、宣威4区；金家店（今东风镇）村公所、道德营子村公所、富通镇（今麦新镇）村公所、三道湾子村公所、西扎兰营子（今大榆树镇）村公所、东扎兰营子村公所、坤都岭村公所、陶官堡村公所、双四台（今俊昌乡）村公所。各街村公所设街、村长1人，助理员、司计员各1人。街、村的行政统归县公署行政科街村股领导。街、村公所内设总务、动员、实业、财务、防疫、保健5个系。村公所下设屯（甲）公所，设屯（甲）长1人。一般是每村下设8个屯（甲）。屯以下每10至20户为1牌，牌设牌长。

三、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通过各级政权机构，以及军、宪、警、特和奴化教育等各种形式，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是最高统治者。他们为所欲为，收买、豢养了一批汉奸、蒙奸、特务，四处活动，搜捕镇压反满抗日爱国人士，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全县。他们经常制造黑名单，给一些人扣上“政治犯”、“嫌疑犯”、“思想犯”等罪名，逮捕、绑架，施以惨无人道的毒刑逼供，很多人无辜被迫害蹲监坐牢，致残致死。1942年宪兵队逮捕了参加国民

党组织的张林标、崔嘉祥之后，搜查“嫌疑犯”达到高峰，甚至在伪机关工作的职员也未能幸免。蒙文学会会刊《丙寅》被查封，其创办人卜和克什克，位居厅长也遭到怀疑迫害。双合兴村教师马鸣鸾先生用猜字法，写了一本揭露抨击日伪的《天书》，被刑讯逼供投入监狱，直到伪满垮台才重见天日。

扩充警察机构和队伍，强化治安。县警察署初建时，仅有署长1人，文书1人，巡官2人。为扩充警察队伍，培养供其驱使的马前卒，1935年在开鲁成立了警察学校，日本人盘井任校长。1936年推行警察控制法。县警察署增设了警务系、保安系、特务系。开鲁镇增设开鲁街警察署，镇内增设4个警察派出所，农村增设了道德营子、富通镇、西扎兰营子、陶官堡4个警察署，各村都设立了警察派出所。警察署和派出所的职责范围很大，是日本侵略者推行“以夷治夷”策略，统治中国人民，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

日伪时期，不断进行强制性奴化教育，灌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思想，对青少年和中国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精神上的愚弄和欺骗。在开鲁建立的“满洲帝国协和会开鲁本部”以及基层的“协和分会”，不但利用演戏、报刊、讲演等形式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和武士道精神；还设立青年训练所，组织所谓勤劳奉仕。城乡16至19岁的青年分批被轮流进行军训和奴役劳动。每期50名、20天。协和会还参与逼交“出荷粮”、“抓劳工”等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削弱民族文化还表现在推行殖民主义教育政策上。伪满时期，开鲁县城内建有3所中学、6所小学，即：开鲁县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蒙古族）、第二国民高等学校（汉族）、女子国高；

育英街国民优级学校、平安街女子国民优级学校、兴仁国民学校、安乐国民学校、鸡林小学(招收朝鲜族学生)、寻常小学(招收日本人学生)。这些学校均被日本人控制，原有教材大部分被废除，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也不准挂，不准看。日语被列为中、小学的主课。特别是1937年实行新学制后，教育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性情”。在这种教育政策下，不论中学、小学都必须虔诚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都必须赞颂“日满亲善”和“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都必须竭尽全力地拥护“大东亚圣战”，为战争出力，等等。学生每日晨起要背诵《国民训》和《回銮训民诏书》，并向东方遥拜。每餐前，要默念3分钟，以示感皇恩，颂德政。优级以上学校规定有日语会话日，师生见面都必须用日语相互问候。凡此种种，都贯彻、散布了殖民主义的教育思想。

伪满时期的通辽县

孙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通辽后，民国通辽县长董云卿仍然署理县政。

1932年农历三月，伪满洲国通辽县公署成立。董云卿任县长。日本人富田直次任参事官。1934年，华荣棕继任县长，日本人宫崎总平任副县长。1942年，于文英任县长，日本人小川宽任副县长。

伪满通辽县公署内设财务局、警务局、内务科、总务科和官产处。财务局，局长李文衡，内设征收股和理财股。警务局，局长孙良文，内设司法股、警务股、1个警察队和6个警察局。内务科，科长屠文楷，内设教育、实业、行政3个股。总务科，科长王作舟，下设会计、文书、庶务3个股。官产处办有教养工厂和屠宰场。

伪满期间，通辽县在1934年（伪康德三年）前隶属奉天省，之后隶属兴安南省。全县设6个区，一区设在通辽镇内，二区设在胡家园子，三区设在余粮堡，四区设在木里图，五区设在钱家店，六区设在玛力营子。每区设四、五个村。全县人口大约15万，土地面积大约1800平方公里。

伪满时期，通辽县公署除设立了众多的局、科、处外，在通辽镇内还设有税捐局、鸦片专卖局、盐务缉私局等机构和商务会、农务会、粮店组合公会等所谓公共团体组织。

通辽税捐局归省直属，局长郑金铭。局内设稽查课、经征课、总务课。稽查课课长徐秀岩，下设监视、稽查2个

股。经征课课长马长恩，下设2个股。总务课课长孙襄清，下设会计、文书2个股。税捐局每年征收营业、粮食、牲畜等各种税约20万元。

郑家屯专卖局通辽分署，管辖兴安西分省和兴安南分省的部分地区鸦片专卖。当时，通辽分署每月鸦片公开销售除专卖局公开销售的以外，每月私下买卖的还有2000多两。日伪统治者设鸦片专卖局在经济上盘剥中国人民，在体质上削弱中华民族的同时，还设有教养工厂。教养工厂名义上是为戒除嗜毒恶癖，教以劳动技能而设立的，实则为无偿剥削中国劳动力。教养工厂内设烧砖的砖窑科，制绳的绳麻科和印刷的印刷科。每个科有工人十余名，主要靠所收容的被教养者劳动。

通辽盐务缉私分局专司检查从营口运进的食盐。每年通辽的食盐消费量为33574担(每担100斤)，总价为268392元，其中盐税为201444元。

通辽县商会会长肖庆齐，副会长杨济武，内设会议、会计、文牍3个股。

通辽农务会会长才佐卿。各区设分会，一区分会长刘润亭，二区分会长胡振声，三区分会长刘亚沈，四区分会长丁甲辰，五区分会长高殿库，六区分会长李子华。

通辽县粮食组合公会由47家粮店共同协议组合而成。

日伪统治时期，通辽地区的经济遭破坏被掠夺就连1932年日伪官方搞的《调查报告书》也一再供认：“事变后（指九·一八）受匪贼之害甚多，又加上流行百斯笃，营业状态不好，有百余家倒闭”，“其中毛皮商受打击最大，倒闭的也有二十余家”，“由于发生百斯笃的结果，交通断绝，县内的交易不振，受匪贼之害，水灾使各地耕地荒废，谷物暴跌

显著疲惫”，“家畜及畜产品的交易逐渐衰落，事变后其交易数量年年在减少”，“农产品的上市量与事变前比较，事变后减少二成内外”，“民国十六七年通辽商业最繁荣时期，剧场有两户，此外有落子馆十一处，说书场六处，电影院一个……现在剧场、电影院没有了，落子馆剩三个，说书场剩二个，……此为与事变前相比可得知其衰落的大略”。就在这种困苦不堪的情形下，日本侵略者还利用通辽比较便利的交通条件，每年从通辽掠走大量的牲畜和粮食。据1933年，满铁事务所调查表载：由铁路从通辽运出牛11910头，马322头，羊240头，骡46头，驴39头。另据商务会税捐局调查表载：从通辽运出大豆79820石，高粱115232石，苞米15213石，小豆6532石，绿豆5230石，小麻籽22353石，大麻籽5132石，荞麦3850石，谷子25214石，瓜子4231石，黑豆18030石（每石250公斤）。

伪满时期的科左中旗

达木林

日伪时期，科尔沁左翼中旗归属于兴安南省管辖。

1934年8月，我由兴安南省会计科调到科左中旗公署会计科会计股当科员。从此，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10个春秋。

(一)

1932年，伪满科左中旗公署成立。首任旗长是温都尔亲王阳仓扎布。此人沉默寡言，上班晚来早走，不识字，公文一律由别人读，然后盖上旗长章。他一切听从参事官的指挥。第二任旗长是色拉哈旺珠尔。他也不识字，公文一律由人念给他听，然后盖上旗长章就算批阅。他对参事官逆来顺受，从不敢顶撞。第三任旗长是色旺道尔吉。他性情粗暴，盛气凌人，动辄打人骂人。他粗通蒙、汉文，愿出风头，对于日本人一向卑躬屈膝，十足的奴才相。第四任旗长是乌力图。他文化程度高，年富力强，知识面广，社会经验丰富，所以，他有别于前几位旗长。他在用人方面坚持文化程度、年轻和业务能力强的标准，另一方面对付日本人也有一套办法，既顺应时代，又能灵活从事。

科左中旗公署成立后，在我所了解的三个参事官中，田口义男比较稳重，善于利用王公来统治和奴役人民；绿川胜治性情温和，阴险毒辣，常常通过王公和上层人物施展他的阴谋；井手俊太郎则粗暴蛮横，不可一世。

科左中旗公署成立之初，下设总务科、内务科和行政科。总务科负责文书收发、重要文件起草、人事任免及其它有关

总务事项，科长色旺多尔济；总务科下设总务股、会计股。内务科负责行政业务、财政收入、土地及文化教育等事项，科长孝兴阿；警务科负责治安、社会秩序及特务活动，科长张洪涛。后来，旗公署又增设了文教、动员、产业三个科，人员也做了调整；总务科长孝兴阿；行政科长那木海扎布（韩凤岐）；警务科长仁亲宁布（滕海山），后由巴图巴雅尔、何博彦图任科长；文教科科长特木尔巴根，后由贺齐业勒图莫尔根（卓王）任科长，动员科长那孙孟和（富连举），产业科长为日本人。各科下设若干股，在此省略。

旗公署的基层行政机构为努图克（区），各努图克管辖若干嘎查（村）。开始时共设15个努图克，即巴彦塔拉、架玛吐、舍伯吐、庄头屯、乌兰花、烟登吐、乌奴克齐、卓里克图、敖古斯台、毛道吐、乌勒吉图、二龙索口、腰力毛都图布信、花胡硕努图克。

旗公署下设8个警察署，警察署又下设若干警察分所。这8个警察署分别是巴彦塔拉、架玛吐、舍伯吐、卓里克图衙门营子、庄头屯、乌奴克齐、腰力毛都警察署。

截止到1945年，科左中旗除巴彦塔拉中学（国民高等学校）外，仅有16所小学，即巴彦塔拉、架玛吐、乌兰花、舍伯吐、庄头屯、烟登吐、花胡硕、毛道吐、乌勒吉图，腰力毛都、敖古斯台、卓里克图、乌奴克齐、二龙索口、瓦房、瓜毛都小学。

为了便于通信联系和采购业务，在郑家屯福来地局原址设通信处，作为科左中旗驻郑家屯的办事机构，负责人为王玉、张广德。

为了加强旗内的通讯联系，架设了电话网，旗公署内安装了交换台，随时可以用电话与各努图克、警察署及学校联

系。交换台负责人为刘国忠，外有数名电话生。

(二)

1935年5月，伪皇帝溥仪访日归来后，颁布《回銮训民诏书》。

1940年，伪皇帝溥仪颁布《时局诏书》。

1942年，伪皇帝溥仪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

为此，伪满洲国把每月的八日定为“诏书奉戴日”。每逢八日，旗公署全体职员及中、小学生在广场集合，举行“诏书奉戴”。首先升日、满国旗，唱日、满国歌，并向日本天皇和满洲皇帝遥拜，然后由旗长奉读诏书。

伪满洲国规定每年3月1日为“建国纪念日”，举行仪式与上述同。

科左中旗公署规定，每天上班前全体职员必须到广场集合上早操。首先由各科科长用日语向旗长、参事官报告本科出缺勤人数，然后升日、满国旗，唱日、满国歌，并向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遥拜，九十度鞠躬，后由旗长讲话，最后做建国体操。

旗公署规定，每月15日（农历）请十几个喇嘛诵《太平经》，由旗长，参事官带头拜佛、烧香、磕头。还专设三间“佛堂”，由一个喇嘛每天烧香管理。

每逢“祭孔日”，由文教科主办隆重的祭孔典礼，全体职员参加，三拜九叩，供奉猪羊，朗读祭文。

若遇到干旱年景，由旗长、参事官率领全体职员祈雨。所有参加人员都赤脚，戴上柳条编的帽圈，步行去玛拉沁庙祈雨。旗长、参事官烧香、磕头，长时间跪拜。全体喇嘛在庙内诵经。

日伪时期，科左中旗公署的等级制度森严，分为特任官

（中央各部级、省级由皇帝任命）、简任官（司、局级、厅级由皇帝任命）、荐任官（旗县级、科级）、委任官、雇员、佣员等，属官由国务院任命。阴仓扎布、色哈拉旺珠尔、色旺道尔吉均为荐任官，乌力图是简任官。各科科长大部分是荐任官，尚有部分是委任官。各股股长及科员均为委任官。属官以上统由上级领导机关报请国务院任命。全旗没有一名妇女干部，仅有几名女打字员，其中也有日本女打字员。

工资待遇分为俸给、职务津贴、勤务地津贴、冬季津贴僻地津贴、语学津贴。凡日语经过考试合格者，均发给津贴，分为一、二、三等，以示鼓励学日语。

旗长、参事官专有“机密费”，其余人员每年有前、后两期奖予金。前期奖予金在6月末发给，后旗奖予金在12月末发给。每期奖予金的标准在基本工资的二倍到三倍之间。

公文分为训令、指令、呈文、公函、便函等。下级对上级请示、报告用呈文，上级对下级行文用训令、指令，对下级的批复用指令。平级之间用公函。做一般情况的联系用便函。

行文时，先由起草人盖章，然后分别送由主管科长及有关科长盖章后，送交参事官盖章，最后旗长盖章签发。如果参事官不盖章，旗长就不能盖章签发。

凡所任用的努图克达、警察署长和学校校长等要员，大部分是王公、权威绅士。其录用手续极为简单，由权威者推荐就可采用或任命。

（三）

1937年3月，我任科左中旗公署会计股长。会计股分出纳系、前度资金系和用度资金系。这个股十分庞大，全股近30人，均为青年。

会计股属总务科领导，凡全旗的财政开支，包括下属努图克、警察署、中小学的开支（薪水、办公费、基建费），统由会计股支付，是掌握全旗财政大权的机构。全旗每年财政的预决算，也由会计股负责。由于会计股的重要性，日本人极为重视。为了监督和控制，在会计股配备了由日本人担任的经理官。

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在旗公署的其它部门也逐渐配备了日本人（称之属官），在警务科更多些（30余人），甚至连司机、公医诊疗所也配备了日本人。

自1936年开始，日本侵略者为了疯狂掠夺物质财富，支援战争，实行粮谷出荷和配给制度。产业科每年按农民的土地面积，做出出荷的具体计划，秋收季节，由旗公署组成工作组，旗长、参事官亲自带队，到各努图克征收出荷粮。农民如果私藏或拒不交出荷粮，要遭受处罚。所谓配给制度，主要是棉布及其它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从而给全旗蒙汉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尤其是农村、牧区的蒙古族群众，因所得配给的布疋无几，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儿童有的裸体在外边玩耍，有的在屋内烤火盆，把肚皮烤出泡，有的甚至掉进火盆里被活活烧死，其惨状目不忍睹。成年人夏天没衣穿，就把皮袄反过来穿。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连裤子也没有，用高粱秸串上做围裙来遮体。全家数口人盖一床被子，几个妇女出外时轮流穿一条裤子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

同时，鼠疫流行也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难。旗公署虽然专设防疫队，但在疫区只是实行封锁，禁止出入，却不予治疗，疫区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从1938年起，实行《国兵法》。凡年满20岁至23岁的男青年，都有三年服兵役的义务。1939年，实行《勤劳奉公法》

凡年满20岁至23岁未能选入国兵的男青年，就被编入勤劳奉公队（分大队、中队、小队），在勤劳奉公局的统一指挥下，被派往各地从事挖掘沟渠、开垦水田、修筑道路、房屋；劳动强度大，物质生活极为恶劣。因此，适龄青年宁肯当国兵，也不愿成为“国兵漏子”（勤劳奉公队）。

1939年，实行的《劳动统制法》规定，25岁至55岁的男子都有服役（劳工）的义务。于是，每年成千上万的劳工在勤劳奉公局（后改为勤劳奉公部）统一调度下，被派往矿山工厂、森林和日军军事工地服役。他们在日寇铁棍、木棒的打骂下，在物质生活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着劳动强度极高、时间极长的牛马般的劳动，惨死者不计其数。

1940年开始成立了兴农合作社，这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和控制对农副产品的生产、收购、分配、价格的管理而设置的。兴农合作社在各个嘎查（村）设立兴农会。兴农合作社理事长由日本人担任，而兴农会会长则由各村知名人士担任。

但是，在粮谷出荷和劳役制度的实行过程中，旗公署部分腐败职员、努图克达、警察署长、村长及其它有关人员，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受贿等恶劣行为，十分严重，引起了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和愤恨。

在日伪时期，科左中旗没有工业，连手工作坊也没有。一切生产资料及生活用品，均由外地购进。在巴彦塔拉、架玛吐、舍伯吐等地，仅有几家商号、木匠铺和铁匠炉。

经过14年亡国奴生活的科左中旗各族人民，到1945年已经陷入了衣不蔽体、食无粒米的境地。“八·一五”光复后，科左中旗各族人民才摆脱了侵略者的奴役与摧残。但是，这14年的苦难是永世不能忘记的。

伪满时期的奈曼旗

李海晨

(一)

日本侵占之前，奈曼旗旗县并存。绥东县设于奈曼旗八仙筒，管辖奈曼旗和库伦旗，奈曼旗王府设在大沁他拉，由王爷署理旗政。

1933年3、4月间，日本侵占奈曼旗后，撤消了原绥东县县府，成立了绥东县公署，原绥东县县长何庆伦任代理县长，日本人山守荣治任参事官。绥东县公署名义上仍管辖奈曼、库伦二旗。县公署仍设在八仙筒。1935年3月24日，满洲国解散了绥东县公署，在八仙筒成立了奈曼旗公署。从此，奈曼旗隶属于兴安西省。

奈曼旗公署辖原奈曼旗的汉五区和蒙七区，东西130公里，南北150公里，总面积约10,651平方公里，人口为173,081人（1943年统计），其中蒙古族为49,497人，汉族123,47⁰人，回族55人，日本人59人。

伪奈曼旗公署成立后，将原来的12个区重新划为7个区，下设79牌、743村，设有区长、牌长和村长。这7个区是：一区包括八仙筒、浩沁苏木、扎苏台等，下辖18牌、158村；二区包括大段、赐福乐等，下辖8牌、62村；三区包括王府、海子庙等，下辖9牌、104村；四区包括兴隆地、娘娘庙等，下辖16牌、59村；五区包括沙力好来、瘸喇嘛庙等，下辖11牌、144村；六区包括鄂尔土板、西南沟等，下辖11牌、97村；七区包括那里林庙、旦达营子等，下辖6牌，

83村。

1936年，伪奈曼旗公署由八仙筒迁至大沁他拉。由于伪满洲国颁布了《暂行街村制度》，奈曼旗的行政区划由区变为村，共有扎苏台、五野达沁、东浩沁苏木、衙门营子、大段、公益和博尔梯庙七个村。村下设甲，甲下设牌。

1940年12月，日伪当局制定了《国民邻保组织确立纲要》，街、区居民组成班、组，农村居民组成屯、牌，实行连座制，把人民严格控制起来，以便于实行法西斯统治和收“出荷粮”、抓劳工、摊派捐税及“献纳储蓄”等。为此，奈曼旗的7个村又划为赐福乐、博尔梯、勿力牙苏、浩沁苏木、八仙筒、白音他拉、王府、扎苏台、章古台、大戴、沙力好来、哈拉盖、衙门营子、豪塔等14个村。同时，将零散户集中起来，小屯并大屯，修筑高一丈、基宽五尺的围墙，设东、西、南、北四个门。归屯并户后，每屯少则二、三十户，多则六、七十户。全旗共建108个部落，几个部落划为一甲。甲设甲长（嘎查达），部落设部落长（爱里达、屯长）。这种区划制度一直延续到伪满垮台。

（二）

奈曼旗公署成立后，设旗长、参事官及顾问。第一任旗长是苏达那木道尔济，参事官是山守荣治，名誉顾问是达力加卜、波镜，顾问为金宝、吴世藩。

旗公署下设总务科、内务科、警务科和财务科。总务科下设总务、经理2个股，科长山守荣治（兼），内务科下设行政、实业、教育3个股，科长哈斯宝，警务科下设保安（兼警务）、卫生（兼司法）2个股，科长刘崇勋（兼），指导官藤川郁郎、中根专一，财务科分征收、理财2个股，科长王宪中。此外，旗公署还设有承审、司法科员、检验

吏、录事各1人。监狱有监狱员、书记员、看守各1人。另有通译（翻译）2人，差役8人。旗公署人员共67人。

1935年，周荣九率“抗日救国军”攻占八仙筒以后，处死了参事官山守荣治等8名日本人。日本侵略者遂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一方面派大部队镇压抗日力量，另一方面将旗公署迁至大沁他拉，并派遣根本龙太郎为参事官。旗长苏达那木道尔济因涉嫌“八仙筒事件”而被罢免，由哈斯宝继任旗长，直至日伪垮台。从1936年至1945年，参事官多次更换，顺序是根本龙太郎、关口猛、小川宽、岩渊满雄、坤田章。

1939年以前，奈曼旗公署所设总务、内务、警务和财务4个科，各科科长分别是，总务科长卜和希力莫（后为陶特格奇）、内务科长苏达那木中乃、警务科长波林满都胡（指导官石田）、财务科长官布扎布。

1939年以后，随着全旗区划的变动，旗公署的内部机构也做了调整，除保留了原来的总务科（庶务科）和警务科外，取消了内务科和财务科，新设了行政科和劝业科。总务科长下设总务、经理、人事3个股，科长陶特格奇；行政科下设行政、动员、文教3个股，科长苏达那木中乃；劝业科下设实业股、财政股、畜产股，科长官布扎布；警务科下设保安（兼警务）股、卫生（兼司法）股、特务股，科长车格吉拉土（后为乌恩宝音）。旗公署人员总计100余人。

（三）

警察机构是伪满统治者镇压人民、奴役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工具。奈曼旗公署成立后，立即撤消了原警务局、自卫团，成立了警务科以及由警务科管辖的警察队。同时，警务科下设八仙筒、扎苏台、大段、海子庙、娘娘庙、沙力好来、鄂尔土板、那里林庙等8个警察署。八仙筒警察

署下辖浩沁苏木、华兴公司和吐苏拉其庙分驻所；海子庙警察署下辖奈曼营子分驻所；娘娘庙警察署下辖兴隆地分驻所；沙力好来警察署下辖喇嘛庙分驻所；鄂尔土板警察署下辖西南沟分驻所；那里林庙警察署下辖且达营子分驻所。全旗共有行政警察184名，负责社会治安及刑事案件。

警察队本部最初设在八仙筒，后迁至大沁他拉。本部下设大段、华兴公司、王府、沙力好来4个警察分队。全旗共有流动警察150人，主要任务就是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以及剿匪、维持地方治安。

“八仙筒事件”之后，为了统一管理和控制警察力量，全旗的警察组织又进一步作了调整，将过去的8个警察署集中为3个警察署，每个署设署长1人，巡官、警长、警士若干人；下辖分驻所，分驻所设所长、巡官、警长、警士若干人。三个警察署是，王府警察署，署长为德吉都、王恩、戴布木扎布等，下辖新庙、白音他拉、五间房、娘娘庙、沙力好来5个分驻所；八仙筒警察署，署长为史亚钧、陈殿甲、李阿力坦包力皋等，下辖大段、曼楚、波力合硕庙、浩沁苏木、扎苏台、和硕庙等6个分驻所；衙门营子警察署，署长为哈拉巴拉、洛不等、王承德，下辖大戴、大营子、那里林庙、土城子四个分驻所。

1936年以后，又成立了治安队（讨伐队），下辖2个连，王府、化吉营子各驻扎1个连，共300余人，后改编为五团，1940年调往兴安西省所在地开鲁。1944年成立了警备大队，配合警察活动，队长洛不等，共120多人。庞大的警察组织，专门由日本教官野口和武井负责训练。

日本略侵者通过旗公署和警察组织，控制了全旗的行政大权；通过协和会，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实行奴化教

育，通过兴农合作社，掌握了全旗的经济命脉，并进行经济掠夺。旗公署、协和会与兴农合作社成为三位一体的镇压人民、掠夺经济的配套机构。

伪满时期的东科后旗

巴根那

1932年8月，伪满东科后旗（今科尔沁左翼后旗）公署在博王府（吉尔嘎朗）成立。

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出任东科后旗公署首任旗长。1935年，包尼雅巴斯尔任第二任旗长；1941年，达瓦敖斯尔任第三任旗长；最后一任旗长是额尔赫莫。

东科后旗公署一成立，日本人就派驻了参事官。首任参事官是绪芳秀夫，第二任是牛仓进，第三任是松本幸一，第四任是高桥万五郎，第五任是佐滕正。

1933年7月5日，东科后旗公署成立了总务科、行政科和警务科。总务科下设总务股和会计股，科长济尔格琅；行政科下设行政股、财务股、文教股，科长崇阿；警务科下设警务股和卫生股，科长和希格。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科后旗公署的组织机构，有了较大的变动。除总务科、行政科、警务科以外，增设了文教科和产业科；同时，各科的内部机构也有所变化。总务科辖人事股、文书股、会计股；科长先后是济尔格琅、富珠隆阿、何兴格、色尔格楞，科副是板田满（日本人）。行政科辖努图克股、兵事股、财务股、土地股、卫生股、动员股、土木股；科长先后是白崇阿、何兴格、特格喜，科副是日本人宇喜多和松川寿夫。文教科辖视学、学务、礼教股；科长先后是毕玺勒图、吉儒木图。产业科辖殖产股、农林股、畜牧股、供应股；科长先后是池田繁（日本人）、坂野（日本

人)、毕玺勒图。警务科辖警务股、司法股、保安股、特务股，科长先后是扎那、和喜格、博彦图、巴图巴雅尔，指导官是成漱芳太郎(日本人)、佐滕(日本人)。

另外，旗公署还设立了参事官室，由日本人竹笠负责。弘报室，由日本人大塚负责。这两个机构都直属日本参事官领导。

据1940年统计，全旗总面积约7,800平方公里，总人口为111,329人，其中蒙古族77,207人、汉族33,899人、回族21人、朝鲜族160人，日本人42人。

日本侵占东科后旗后，在农村牧区建立了9个努图克下辖若干嘎查。它们是：希如德努图克，努图克达是莫日根特本，辖横坑、古淖尔、四爷屯、塔林布敦吐嘎查；哈拉图德努图克，努图克达是布仁达来，辖包尔很台、西新迫、图莫营子、梅林营子嘎查；柏尔德努图克，努图克达是古如扎木苏，辖吐如很斯布套、兴和巴彦忙哈、套布海嘎查；翁古德努图克，努图克达是巴雅尔，辖巴胡塔、吉如何、公营子、六家子嘎查；埃古尔德努图克，努图克达是孟和，辖乌苏白嘎其、门都来、吉力图、乌尔塔拉嘎查；阿嘎珠德努图克，努图克达是巴彦木仁，辖协尔苏套布、甘其卡、腰海路吐、黑五家子嘎查；玛如德努图克，努图克达是扎木苏，辖都楞、吐斯拉勤艾里、阿白营子、协日嘎嘎查；光兀尔德努图克，努图克达是色扎布，辖协日勒台，恩和代、查干淖尔、雅玛吐嘎查。

1938年，增设阿尔林塔拉努图克，努图克达是格日勒胡雅嘎，辖吉特贵窝堡、王老爷窝堡、黑坨子、邱君窝堡4个嘎查。

各努图克设努图克达一人，助理、司计、雇员若干人。1939年，努图克内设庶务、行政、财务3个股，由助理、司计兼股长

嘎查设嘎查达 1 人，不设办事机构。嘎查管辖若干自然屯。

从1939年到1945年，东科后旗的行政区划发生了较大变化，撤消了原来的 9 个努图克，建立了 15 个区，即吉尔嘎朗区，区长巴雅斯古楞、绍兴阿、乌力吉图；伊胡塔区，区长绰依扎木苏、满都呼；甘旗卡区、区长阿灵嘎拉；公营子区区长扎木苏、巴雅尔；海斯改区，区长格日勒胡雅嘎；新庙区，区长布仁达来、宝音代来；黑五家子区，区长巴音木仁巴音那木尔；公河来区，区长古如扎木苏；欧里区，区长舍拉喜、贺喜格都楞；巴彦宝图区，区长孟和；阿都沁区区长白乙拉、阿灵嘎拉；谢拉苏区，区长莫日根特本；哈敦哈拉根区，区长色丹诺力布、色喜雅拉图；金宝屯区，区长包旺舍；公司五家子区，区长巴图、敖斯尔、色楞道尔吉。

1932年，兴安警察局在东科后旗伊胡塔设一警察署，配武装警察50人，后增到60人，专事剿匪，并负责东科后旗、东科前旗的治安保卫任务。金昌任署长。1933年，该警察署迁至东科前旗的西扎哈尔齐屯。

1934年，兴安警察改编为地方警察，称为旗警。全旗共设 4 个警察署，归旗警务科领导。每个警察署下辖 8 个警察分所或分驻所。

吉尔嘎朗警察署，署长照日格图；公司五家子警察署，署长吉木言扎布；布敦哈日根警察署，署长刘志强（乌力吉图）；甘旗卡警察署，署长阿其拉图。

各警察署有警佐级署长 1 人，警尉 3—4 人，警尉补、警士若干人。

警察分所和分驻所，由警长任所长，警士若干人。当时警察除负责维持地方社会治安、秩序外，还负责实施各项行政事务。

伪满时期的扎鲁特旗

马尼加布

伪满洲国成立后，扎鲁特旗隶属于兴安西省。当时，扎鲁特旗分为扎鲁特左翼旗和扎鲁特右翼旗，左翼旗所在地为鲁北，旗长阿拉坦瓦其尔，右翼旗所在地为西王府（现属白音宝力稿苏木），旗长是勒旺端儒布（西王府王爷）。

1934年，兴安西省为便于统治，将扎鲁特左、右翼二旗合并为扎鲁特旗，任命阿拉坦瓦其尔为旗长，勒旺端儒布被调任兴安西省公署劝业科科长。1941年，勒旺端儒布被任命为扎鲁特旗旗长，而阿拉坦瓦其尔被调任兴安西省公署劝业科长。这样，伪满扎鲁特旗第一任旗长是阿拉坦瓦其尔，第二任为勒旺端儒布。

日伪时期，旗县公署实行参事官制，参事官均由日本人担任。实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旗长仅是一个傀儡。在扎鲁特旗的参事官先后有：后藤、铃木末男、绪利则重、松尾等。参事官负责人先后是高桥等三、四人代替参事官处理事务。

旗公署下设4大科，管辖6个努图克（6个区）。

一、总务科，第一任科长是关其格扎布，第二任科长是孝兴嘎。科内设有总务股，股长是日本人，叫太田。二、行政科，科长是旺济勒色登。科下设动员股、经济股、殖产股、行政股、畜产股、教育股、保健股等7个股。畜产股下设1个牧场，保健股下设1个管烟所。三、会计科，科长是沙格德尔扎布。下设财务股、会计股。四、警务科，科长是洪富升阁。下设警务股、特务股、保安股、无线电室等。在全旗

设3个警察署和8个警察分驻所。3个警察署是：鲁北警察署、梅林庙警察署和巨里黑警监署。8个警察分驻所是：桃儿山警察分驻所、恩克敖包警察分驻所、敖都木警察分驻所、白音他拉警察分驻所、依森毛都警察分驻所、好老宝警察分驻所、义和他拉警察分驻所、忙汗那拉警察分驻所。

旗公署辖管6个努图克是：

第一努图克公所设在西王府。努图克达第一任是洮同阿第二任是端如布。管辖部落是：敖都木、新艾里、和格土、查干敖包、好吉艾里、板子庙、他拉艾里、公营子（忙哈吐）、东萨拉（白音温都）、迟家堡（大山屯）、乙旦架拉嘎。

第二努图克公所设在查干额力格，努图克达是元旦扎木苏管辖部落是嘎查艾里、查干额力格、哈达艾里、波尔勒吉庙。

第三努图克公所设在白音他拉，努图克达（区长）是陈义。管辖部落是白音他拉、太平山、乃木格根、德福屯、西沙拉、新安屯、五道井子、哈布吐海、白音宝力稿。

第四努图克公所设在巨里黑，努图克达（区长）为刘福田。管辖部落是老道沟（胜利屯）、唐家窑（兴隆地）、太平川、治兴村、必喜、双四台、双山子、三益庄、巨里黑、保安屯、安乐屯、架拉嘎、中心屯、窟窿山、富裕屯、王家堡（工农村）、刘家堡（道德村）、小烧锅（平安地）、陆家窑（广新堡）、鸽子山、中村堡。

第五努图克公所设在东王子庙，努图克达是古儒。管辖部落是马拉嘎、东王府（乌力根他拉）、东王子庙、宝冷、荷业哈达、稻子把、公爷仓（宝力稿）、阿木斯尔、哈日宝冷、小黑山、嘎达苏庙、爱林、忙汗那拉、昆都勒庙、查干

套力改庙。

第六努图克公所设在梅林庙，努图克达是业力珠。管辖部落是：北乌呼锦、中乌呼锦、南乌呼锦、公庙、牙尔乃敖仓（白音图门）、查干敖尔、宝力稿、哈日毛都、满都呼、新艾里、义和他拉庙、义和他拉艾里、西拉花、阿木其嘎、陶家堡。另外，旗公署附设检查署、审判署及一所监狱。

伪满时期的库伦旗

齐克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出兵进犯热河的一股日军曾经取道库伦，但不曾在库伦停留。在这段时间，日本帝国主义无暇顾及偏于一隅的小小库伦，只是于1933年春，在奈曼八仙筒拼凑了一个伪绥东县公署，仿照民国旧例，绥东县仍管辖库伦、奈曼二旗。这时在库伦只设了一个所谓治安维持会，暂时代行旗公署的职能。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热河战事又开始，库伦旗同南京政府的联系已经被迫中断。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魔爪还未直接伸到库伦来，正是在其鞭长莫及的空隙，库伦旗悄然无声地度过了暂短的三个年头。1933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对热河地区的武装占领，转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1934年12月1日将原属热河省管辖的库伦旗划归伪兴安南省，并将原属昭乌达盟的喀尔喀左翼旗和属卓索图盟的唐古特喀尔喀旗一并并入库伦旗。接着于1935年3月，明令撤销绥东县建制。同年4月，以伪热河省吉川参事官为首的一行十来人从奈曼旗率到库伦旗。在此之前，两个喀尔喀旗的札萨克王先后跑到沈阳、长春等地请愿，请求保留这两个旗的建制，但都遭到伪政权的拒绝。吉川参事官来库伦后，匆忙把这三个旗合而为一，于1935年5月1日成立了伦旗公署，原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达喇嘛，前不久还俗并改任旗萨布克的罗布桑林沁出任伪旗长，日本人岩满三七男任参事官。旗公署设总务、内务（后改为行政）和警务三个科。罗布桑

林沁属下二名官员和前喀尔喀左翼旗管旗章京出任上述三个科的科长。科设指导官（后改称科附），由日系官吏担任。1942年，旗公署又增设劝业科和审判署及检察署，旗长兼任审判署审判长，警务指导官兼任检察署检察官。

旗公署成立后，沿用原来三个旗的行政区划，把全旗划分为七个努图克（区），即：第一努图克，驻地布敦喇嘛；第二努图克，驻地西喇嘛苏鲁克；第三努图克，驻地吉力图；第四努图克，驻地库伦街；第五努图克，驻地胡拉苏台（即今苇子沟）；第七努图克，驻地敖彦好若（即今树林子）。原喀尔喀左翼旗札萨克王鲁勒木色楞，及唐古特喀尔喀札萨克王（曾兼任卓索图盟盟长职务）达克丹彭苏克二人被强令退休，不再参政。

1938年，日本人把上述七个努图克重新加以调整，全旗划分为五个努图克，第一、五努图克合并，驻地迁至揣尔吉称揣尔吉努图克；第二、三努图克合并，驻地迁至下养畜牧称养畜牧努图克；第四努图克改称库伦街努图克；第六努图克驻地迁至厚很（即今扣河子），称厚很努图克；第七努图克改称敖彦好若努图克。努图克设努图克公所，努图克达（区长）一人，下设行政、户籍和财务三个署，分管努图克行政事务。调整后的五个努图克，又划分为52个艾里（行政村），分别归各努图克管辖。艾里设艾里达（村长）一人，下辖若干个自然屯，自然屯设牌，约十户为一牌，牌设牌长一人。

在库伦旗公署成立之前，奈曼旗南部和库伦旗相接壤的山区发生了西洼屯卜昭鑫闹皇帝事件。之后，奈曼旗八仙筒曾经发生过周荣九抗日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派来守备队，还派出飞机镇压，这次日本守备队在库伦旗扣河子屯屠杀了无辜

群众四人。与此同时库伦又发生了出任伪旗长的罗布桑林沁不甘心受日系官吏的操纵、控制，暗中策动原旗保安队士兵实行哗变的事件。为此，日本人从钱家店调来伪警备军一个连进驻库伦街。同时，把库伦旗西南部和奈曼旗南部山区接壤地区划为“治安不良”地区，派出伪军一个排驻扎。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库伦旗后，即加强了其警察统治，旗公署警务科下设警务、保安、司法和特务四个署。警务科管辖驻守旗公署南北大门的警备大队。电话局做为要害部位归警务科管理。起初，在旗以下各努图克实行警政合一制，各努图克公所即为警务分局，努图克达兼任分局长，授警尉衔这样，把全旗各努图克置于警务科监督指挥之下。到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强化警察统治，进行所谓警察机构改革，在警务科下设警察署两处，即库伦街警察署和火石岭警察署（后迁至厚很）。警察署之下设立若干警察分驻所由努图克公所分离出来，努图克达不再兼任警察职务。当时全旗设有警察分驻所七处。到1944年，在库伦街又成立直辖所一处。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警务科特务股，这特务股确实特殊，特务股长必须由日本人担任，业务上直接和参事官发生联系，警务科长无权过问，当时做为—旗之长的罗布桑林沁，其亲信做为行政科科长赵宝善均被秘密地列入所谓“要视查户”的名册内，受特务重点监视。原喀尔喀左翼王鲁勒木色楞，唐古特喀尔喀王达克丹彭苏克都被列入所谓“要注意户”的名册内，受监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库伦的法西斯高压统治进一步强化，撤换了对日本表现不忠、效命不力的伪旗长罗布桑林沁，又相继设立了协和会、兴农合作社等组织。

全旗数万各族人民从思想言论到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受到日伪统治者的严密控制。

日本帝国主义在不断强化其法西斯高压统治的同时，也利用喇嘛教进一步从思想上、精神上加以统治。库伦旗原本是个喇嘛旗，旗内占居多数的蒙古族人民都信奉喇嘛教。就此，日本人为了欺骗人民，使人民归顺，采取了保护寺院，声称日本和蒙古同种同族，并实行了对喇嘛宽容的政策。曾派出日本喇嘛来库伦，先后到兴源寺和寿因寺朝拜，又把寿因寺迈达里活佛带到科右前旗葛根庙，出任伪满洲国喇嘛教宗团副团长，后晋升为宗团长。1941年农历七月，兴源寺举行吗呢法会，吗呢法会每隔三年举行一次，是库伦旗兴源寺最隆重的法会。在这次吗呢法会上，特务股长大赖做出一付虔诚的信徒面孔，动用一大笔特务经费，筹办了这次法会的膳食。在此之前，兴源寺山门前的用松木制的旗杆被大风刮折了。对此，特务股长大赖表现非常关心，不久即从外地运来八节五六寸粗的无缝钢管，给兴源寺重新竖起了旗杆。

兴安南警备军

张维荣

我于1936年7月到通辽兴安南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工作，任陆军属官，1945年5月间退职，在参谋处工作将近四年。在职期间，我做了一些公开的文件收发和翻译工作。参谋处居司令部八大处之首，有很多重要机秘文件均由日本人处理和保管，一般人是见不到的。关于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和兵力分配以及改组第九军管区的情况，此事距今已四十多年，有的已被遗忘，仅就能够记忆的概述如下。

一、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的组织机构

司令部有司令官一人，中将，名巴特玛拉布坦。参谋长一人，上校，名那钦双和尔，苏鲁克旗人。参谋长室设有军事教官二人，均是日本退役军官，一个是中野中佐，另一个少佐，名字记不清了。表面上是协助参谋长工作，实际是监督参谋长和司令官的行动，听命于顾问部金川耕作。金川耕作大佐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代理人，掌握兴安南警备军的一切大权。司令部内设八个处，即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军械处、军医处、兽医处、通讯处。

（一）参谋处

处长王海峰中校，以下有参谋和属官十余人，除王处长和我是蒙古人外，其余都是日本人。参谋按编制规定，必须是上尉以上军官、具备一定学历和有实战经验者，方能担任。参谋在领章上有交叉的竹标志“X”，以表示运筹帷幄、胸

有成竹之意。参谋处的具体分工：

作战组：组长，松本中校。他是首席参谋，组员有奥山上尉、山中上尉、小谷属官、长谷川属官，主管作战、颁布命令、兵力分配与调动等。

警备组：组长，河和少校。组员有烟上尉、冈本属官，冈本属官和我（张维荣）主管军事训练、警械、兵马编制等。

情报组：组长，上原少校。组员有大石属官、大冢属官、永田属官，主管情报、谍报、兵要地图的绘制和保管等。他们和通讯处的无线电台有密切联系，另外有无其他下设组织不详。记得在1938年春季，有一次来了二、三十名喇嘛，蒙古话说得非常流利，大多数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从外表各方面看，大家都认为是蒙古人，实际他们都是日本人，到参谋处后和情报组人员在密室会谈，一切保密，外人不得而知，事后听说这帮喇嘛是从乌珠穆沁和贝子庙一带来的。据说他们多数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潜入蒙古各地混入喇嘛庙里进行特务工作。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行动，是有充分准备的。

（二）副官处

处长中村少校，以下有随从副官三人，即包玉昆上尉、包喜中尉、铃木中尉（日本人）。翻译官有张铁志和朴译官（朝鲜人）。大泽属官主管发布命令（各处每日都有命令由副官处汇总印发）、整顿军风军纪、管理人事和礼节仪式以及对外联络等。

（三）军需处

处长王化兴少校，以下有军需官二人，属官一人，雇员三人。主管粮草、军饷、经费收支、被服及其他军需物资等。

（四）军法处

处长白宝音图中校，以下有军法官三人，书记官一人为朱辑武，看守所长为张鸿志，有士兵十余人，主管军事审判，军人违法乱纪等一切有关军法事项；下设看守所（监狱）一处，在军法处院内。

（五）军械处

处长罗拉玛扎布少校，有军官二人（均为日本人），士兵五人，主管军械及枪、炮、子弹等的发放和保管。

（六）军医处

处长山本少校兼陆军病院院长。军医处有军医官数人，经常在病院从事医疗工作，主管军队卫生保健、疫病防治和参加征兵体检等工作。

陆军病院（军医处附属病院）院长山本少校，以下有军医官五人，都是军医学校毕业生，设有内科、外科、口鼻咽喉科和其他病科，有看护妇及调剂员等二十多名妇女。

（七）兽医处

处长黑田少校，以下有兽医官二人，士兵数人，主管军马疫病防治和药物保管，购买军马等事务。

（八）通讯处

处长渡边技正（荐任官，相当于校官），以下有技佐（荐任官）一人，技士数人，设有无线电台和军用通讯鸽训练所，主管通讯联络，与参谋处作战组有密切联系。

二、巴司令官的生活

巴司令官，名叫巴特玛拉布坦，原是扎赉特旗的王爷。他中等身材，身体肥胖，浓眉大眼，说话声音洪亮，平时不苟言笑，不吸烟。除宴会时喝点酒，平常未见他喝过。很少外出，有时在公馆院内散散步。他的态度很威严，令人望而生畏。但是，我却从未见过他发脾气，有时因事到他公馆去

的人，他都和气有礼貌地接待。他不经常去司令部里上班，也许三、五天或十来天去一次。那时司令部里只有一台小汽车，为司令官专用。司令官到司令部来之前，随从副官在公馆用电话通知，然后副官处派小汽车去接。司令官到司令部时，副官处全体人员和卫队列队迎接。由副官处长指挥敬礼并奏军号两遍（按陆军礼节，少将吹奏军号一遍，中将二遍，上将三遍）。回去时，也同样列队奏军号送行。1939年兴安军机构变动，撤销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成立第九军管区（按满洲国顺序编制的），他任第九军管区第一任司令官。不久他晋升上将，调任新京兴安局总裁（原蒙政部大臣），继任第九管区司令官的是甘珠尔扎布（中将）。

三、兴安南警备军所辖地区和兵力分布情况

（一）管辖区域

兴安南警备军所管辖区域是两个省，即兴安南省和兴安西省全境各旗县。

（二）兵力分布情况

兴安南警备军的主要兵力在钱家店东大营。据我所知，有骑兵第五团（团长是秦焕章中校），骑兵第六团（团长是洪景祥中校）。团的编制有三个连和一个机枪排（配备轻重机枪，人数相当一个连），没有营，官兵共约四百余人（骑兵人员少，因有军马在编制以内）。至于钱家店东大营里除此之外是否有其他兵力，它的内部组织机构如何，我因未去过，所以不清楚。在通辽驻扎的军队有骑兵第十一团（团长是胡凤翔中校），及骑兵独立山炮营（营长是呢吗少校）。山炮营兵力与编制和骑兵团差不多，该营归司令部直辖，后改为山炮团。驻扎在兴安西省的军队有骑兵第三团，团主

力在林东，林西驻有一个连。另外在没有驻扎军队的各旗县，设有治安队一个连，属地方部队，指挥权归司令部掌握，由司令部派一名上尉军官为指导官，指挥该连队，担任所在旗县境内的保安工作。连队的编制、服装与装备相类似，唯在连长和士兵的领章上有铜制圆形“治”字，以示区别。

四、兴安警备军的变动

1939年春，满洲军政部为了增强边防的兵力，扩大兴安军的编制，命令撤消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成立第九军管区司令部。第九军管区司令部的内部机构与人员，按原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的编制，没有变动，只是司令官换了，任命陆军中将甘珠尔扎布继任巴司令官为第九军管区司令官。所管辖区域和兵力分布情况与原来一样，没有变动。所不同的，就是在第九军管区成立后不久，在钱家店东大营增设了一个步兵第二师（第一步兵师在海拉尔归第十军管区），师长是正珠尔扎布少将（甘珠尔扎布的弟弟），听说兵力相当庞大，编制保密，组织机构不详。在通辽又增设了一个第九宪兵团，团长是棍布扎布少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内部组织机构保密，不得而知，主要任务是监督和管理军人一切违法乱纪等行为和地方保安工作。

关东军五三部队

高赵德宝

日伪统治时期，我曾在日本关东军“五十三部队”（简称五三部队）服过二年零八个月的兵役。

这里所记述的史实只是我所知道的五三部队的一些侧面或片断，一些人物、事件、时间和地点也仅限于个人的记忆。由于事隔多年，尽管是亲身经历，但史实也难免有误，诚望知情者斧正。

一、历史背景

日本关东军五三部队的前身是八六八部队，曾驻防在今辽宁省昌图县的红顶山，后于1943年3月迁往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北的塔斯里海。这支部队从它的设置位置、武器装备、部队编制以及军需服装等在当时来说都是一流的，所以，俗称“铁杆部队”。这支部队的性质是以“谋略、侦探、密报”为主，进行疯狂地反共、反苏活动，在整个东北沦陷的14年中所干的罪恶勾当是罄竹难书的。

二、应征前后

1943年，正是日本侵华战争吃紧的时候，这一年的一月份，我从科左中旗舍伯吐国民优级学校毕业。当时正赶上五三部队派包俊峰（该人曾任五三部队教官，是伪满少尉）去征兵，所以，经过学校初检后，将我们应征的120多名学生由包俊峰、毕老师带队经郑家屯辗转来到了今辽宁省昌图县的红顶山（原五三部队大营）。经过几天的体检（主要检查了

五官、内脏、血压等)和考试(主要考了日语和数学)后,在应征的120多名学生中,有70名被检查合格,发给了每人日本式黄呢子军装一套。

体检合格后,部队又从我们70名新兵中选拔了24名日语比较好、五官端正、考试成绩优胜者送到了“干部后补生队”进行培训,意为培养部队新生的干部队伍,为其长远的侵华战争服务。到了“干部后补生队”以后,每天的军事训练都是既严格又刻苦的。除了正常训练科目外,还要进行文化学习,有时也搞野外军事演习。记得当时的教官是包俊峰(该人以后曾在内蒙人事厅任职)。两年以后,大约在1944年的10月,部队又从我们24名学员中择优选拔出13名送到了王爷庙(今乌兰浩特)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其余的11名学员被分配到各中队当“见习”班长。

我当时被分配到三中队,和我一起去的还有韩塔木、宝音贺喜格。三中队的队长是个日本中尉,叫鸠宝,副中队长野中,还有一个内务班长也是日本人,教官是包俊峰。我当时的军衔是少士,主要任务是分管服装仓库,韩塔木在三分队主管内务,宝音贺喜格后来被调到团部军需库当管理员。

三、武器装备

关东军五三部队的武器装备情况是:

重机枪二挺、速射炮一门、平射炮一门。

战士们所使用的枪支,有的是“四四式”马枪,“捷克式”步枪,也有“三八”大盖。另外,需要提及的是,除小队长以上干部以外,凡属机枪中队的战士每人都有一只日本造手枪。

重型日本军用卡车10辆。

四、部队编制

整个“五三部队”的兵员约500人，一色的骑兵。编制团部下设三部一队：后勤部、卫生部、兽医部、汽车小队。下辖四个中队、11个小队、33个分队。

现将1944年8月整编后的兵员编制情况列举如下：

团部（约15人）：部队长：松田（中校）；部队副：日本人（少校）；副官2名：日本人（中尉）；作战研究室：5人。

后勤部（约10人）：部长：日本人（少校）；副部长：色音巨日河（中尉蒙古族）；会计：日本人（少尉）、保管：（上士蒙族）。

卫生部（约15人）：医官：（中尉蒙族）；卫生兵：（约10名日本人）。

兽医部（约12人）：马医官：日本人（中尉）；兽医员：（约10人）。

汽车小队（约30人）：队长：日本人（中尉）；司机：（约20人）。

一中队：中队长：双宝（上尉，蒙族）；副中队长：拉喜德瓦（上尉蒙族）；小队长：小泽（中尉）、小队长：日本人（中尉），下辖9个分队。

二中队：中队长：胡日格顺（上尉蒙族）；副中队长：额日春（上尉达翰尔族）；小队长：一藤（中尉）、小队长陈时雨（中尉）、小队长包俊峰（中尉，蒙族），下辖9个分队。

三中队：中队长：鸠宝（中尉）；副中队长：野中（中尉），三个小队队长全部为日本人（少尉），下辖9个分队。

机关枪中队：中队长：日本人（中尉）；副中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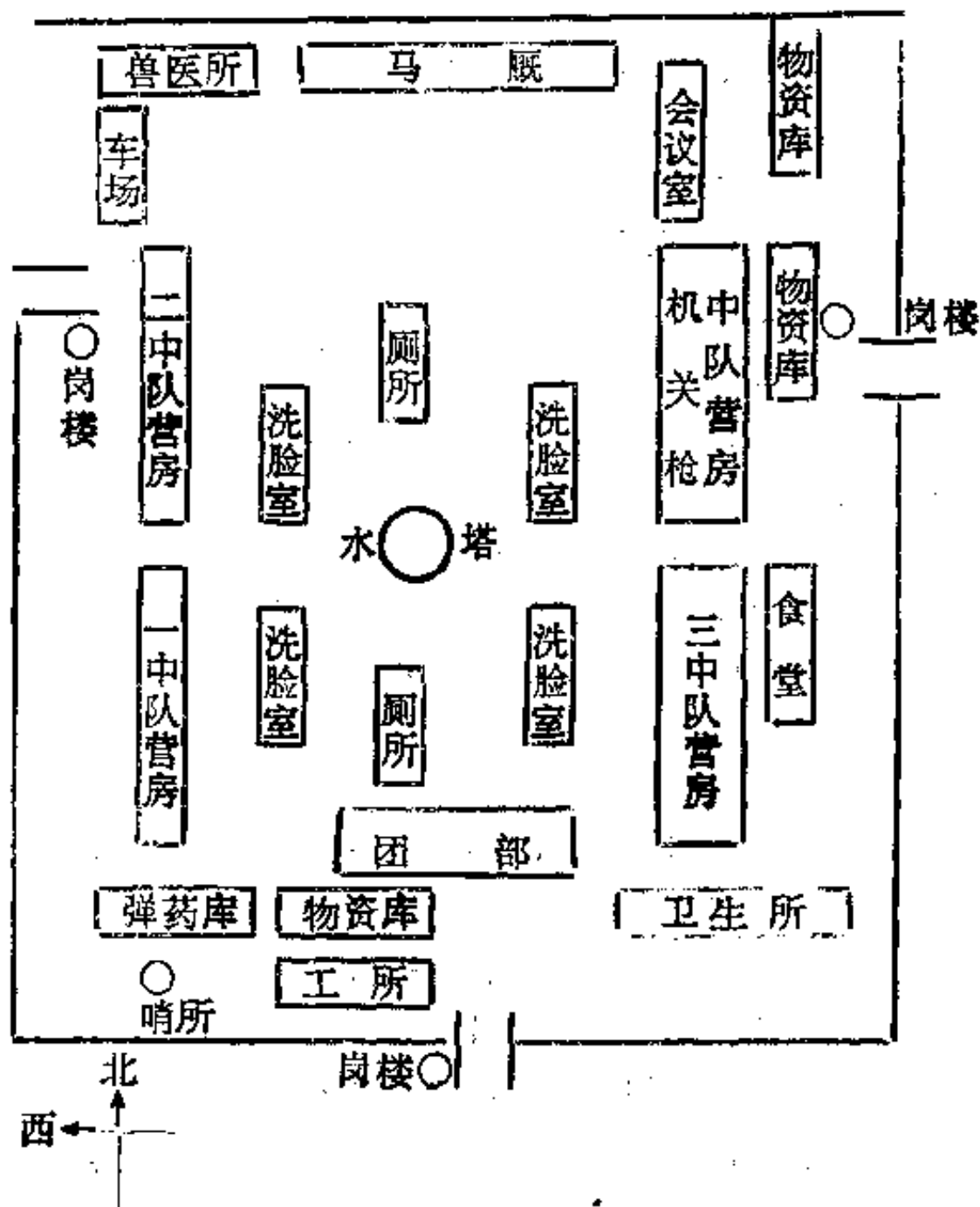
日本人（中尉），小队长均为日本人（少尉），下辖9个分队。

五、仓惶出逃

1945年8月8日，我们正在靶场演习，突然中队部下达命令，由一名叫石元的日本中尉和一个叫吉田的日本中士班长带领一行人去哈尔滨执行公务。记得除我以外，还有包山（科左中旗敖宝苏木人）、金宝音、贺喜格（锡盟人）、包宝玉（呼市人）和两名新兵。接受命令后，我们于8月9日从乌兰浩特坐火车急赴哈尔滨。出发前我们不知道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因为这是军事秘密，走漏风声是要杀头的，所以我们谁也不敢发问。直至到达哈尔滨才知道，原来是让我们去日本人办的兵器工厂取枪。当下，我们领了6挺轻机枪，于8月10日返回。当我们路经郑家屯时，就听说了苏联红军已攻下了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战机紧迫。这时，日本中尉吉下便给中队部打电话询问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战争告急，火速返回。于是我们便立即乘车赶到了白城子。可到白城子一看，形势可就大不一样了，整个西北上空硝烟弥漫，火光烧红了半边天，手榴弹的爆炸声、大炮的轰鸣声不时地传来。铁路中断，公路炸毁，三五成群的伤员纷纷向南逃窜。那些昔日虎视眈眈、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早已失去了威严，携妻带女，仓惶出逃。有的化了妆，抢了当地农牧民的破烂衣帽，一路呼天喊地，狼狈已极。看到这些，我们一打听，才知道“大营”已被苏军强烈的炮火摧毁。于是我们便随着逃散人群又返回到郑家屯。两天以后，形势更加紧迫，苏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步步向南逼近，这时已是8月12日。后来，我看到一些日本官兵抢了老百姓的马车和驴车，连夜冒雨向科科左后旗的吉尔嘎朗方向逃去。从此，中国人民结束了14年

沦陷的奴役生活。

附：五三部队兵营主体建筑及布局示意图



说明：五三部队大营建筑于1942年。整个面积为长1000米，宽500米。主体结构是砖木结合，外部红砖，内部镶有一寸厚的木板。大营周围以排壕代围墙，设有三处岗楼，昼夜24小时设哨，并有巡哨巡逻，荷枪实弹，戒备森严。

(王福生 整理)

内蒙古自治军的建立和解体

色希浩

二十年代末期，内蒙古有三十余名青年，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苏联留学。1929年7月他们毕业后，联名上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表示决心搞革命工作，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帮助。经苏方联系，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介绍，这些学生被送到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这些学生本人的志愿及革命工作的需要，对他们进行了安置，多数分配到中小学任教，有一部分被分配到宣传部门工作。

1930年，这些学生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分批陆续回到内蒙古搞革命运动，其中包括特木尔巴根。

特木尔巴根（在苏联留学时叫张志远，回国后化名扎木苏）是喀喇沁右旗人，此次回来时，组织上安排他的落脚点是科左中旗瓜毛都哈丰阿的父亲、科左中旗骑兵统领滕海山家。大概哈丰阿曾受郭道甫的委托，事先已和父亲联系过，当特木尔巴根到达之后，滕海山不仅亲切地接待他，还很快把他安排到骑兵统领部担任了笔贴式（书记员）。不久，滕海山又保举特木尔巴根经扎萨克衙门批准，担任了骑兵副统领。特木尔巴根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广泛进行“内蒙要自治”、“自己民族的事自己要当家作主”的宣传。和特木尔巴根一批回来的还有包尼亚巴萨尔、朋斯克（化名陈色冷），他们都先后落脚于科尔沁左翼各旗进行了上述宣传。

由于特木尔巴根等人的大力宣传，唤醒了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被东北军阀残酷扑灭的民族反抗烈火重新燃烧起来。

1931年夏秋之际，科尔沁草原上掀起了“内蒙古自治”的怒潮，并组织了数万人的“内蒙古自治军”。以科左后旗包善一统领的骑兵为主体，组成第一军，包善一任司令。以科左中旗统领滕海山领导的骑兵为主体，组成第二军，各个头目共同推举当时担任札萨克衙门军事梅伦的韩色旺为第二军司令。滕海山为第二军第一旅旅长，特木尔巴根为该旅参谋长。滕海山的侄子——原在嘎达梅林部下当头目的小喇嘛，把嘎达梅林的残部重新整顿起来，组成第二军的第二旅，小喇嘛任旅长。哈丰阿、秦国钧等科尔沁各旗在东北蒙旗师范读书的学生，也赶回来组成学生队，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当时，形势发展得很顺利。

就在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张学良的部队一部分遵照蒋介石的“避免军事冲突，用政治的方法解决”这一旨意，根本没有抵抗日军便向锦州退却了。以张海鹏、于芷山、于深澂为首的一部分人，死心踏地投靠了日本，改编为蒙边陆军。这样，日本侵略者轻易地取得了南满。从明治维新以来，一心想吞并满蒙的日本侵略者，看到张学良的几十万正规部队有的落荒而逃，有的接受改编时，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为了征服装备齐全、数以万计的内蒙古骑兵，进而吞并满蒙，日本侵略者又一次伸出了魔爪。他们表示全力“帮助”内蒙古自治运动，并派在日本军校豢养多年的蒙奸甘珠尔扎布会同莫力庙活佛阿旺图布旦拼凑了第三军。还派曾在日本留学的德古来等人加入学生队。因为甘珠尔扎布是巴布扎布将军的儿子，包善一、韩色旺等很多人对他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愿意同心协力共同完成内蒙古的自治。不久，甘珠尔

扎布转交了日本侵略军总司令本庄繁的信。信的大意是：日本帝国为帮助内蒙古取得自主权，愿意合作，并协助扩充和加强自治军的战斗力量。决定第一批支援步枪3000支，弹药60万发及小炮、机枪若干，于10月下旬，由四平北郭家屯车站交付，请届时领取。同时，为了帮助筹划军务，皇军决定派遣军事专家松井清助、盘井文雄和陆军大佐小泽一六八，分别担任三个军的顾问。

包善一、韩色旺等自治军领导人，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诱饵当作了真诚的帮助，未采纳特木尔巴根的劝诫，在十月上旬接到运来武器的通知后，便派武装部队和运输车辆把武器弹药领回来。然后按人数的比例分配给各军，其中第二军按人数分到的最多。日本准备派来的军事顾问，由于受到韩色旺、小喇嘛的当场拒绝，未敢前来。

本庄繁通过武装“支委”，满以为自治军就可以听从他的摆布了。于是，在1931年冬，便以作战命令的形式，下令自治军配合日军攻打通辽。可是除包善一、甘珠尔扎布的部队听其指挥而外，韩色旺的第二军借口防御来自西边开鲁和东北白城子方面的敌对势力的侵袭，根本就没有听从日军的指挥。

本庄繁对自治军第二军司令韩色旺和该军第二旅旅长小喇嘛接受武器而公开拒绝委派日军顾问、不听指挥，非常不满，怀疑他二人是赤党分子，遂决定拔掉这两颗眼中钉。于1932年2月间，以协商“内蒙古自治”为名，指名邀请包善一、韩色旺、甘珠尔扎布等人到奉天开会。开了五天会，在归途中的四平旅店里，韩色旺和小喇嘛被日军重重包围。双方展开激烈搏斗，韩色旺、小喇嘛以及二十来名护卫人员因寡不敌众而全部战死。

事后日军方一方面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唯恐第二军哗变，便下令调到钱家店大营进行整顿、发军衣、续军衔。特木尔巴根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劝阻滕海山和他的卫队没去，第二军由别人带往钱家店。

在去钱家店途中，小喇嘛的部下获悉小喇嘛、韩色旺被杀害的消息之后，纷纷带领自己的部下五十、八十、一百、二百人数不等地各奔他乡了。为了避免家属亲朋受到株连，这些大小头目都起了绰号，如大东山、小东山、大北山、小北山等等。这些人后来被说成“蒙匪”。其实，这些人抗击日本侵略者一直坚持到了1936年。后来，由于日军“清乡”、“围剿”无处躲藏，才分散解体。

日本侵略者把集中到钱家店的全部自治军改编为兴安警备军，任命扎赉特旗年青的王爷巴特玛拉布坦为司令。至此，内蒙古自治军，以包善一为首的第一军归顺了日军，以滕海山为首的第二军被吃掉，以甘珠尔扎布为首的第三军本来就是日寇所豢养。一场轰轰烈烈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诱骗扼杀在襁褓之中。

伪满通辽县警务系统

周 超

伪满时期，通辽县公署设立了警务科，警务科下辖警察署，署内分系，外设派出所或分驻所。全县有五个警察署，即通辽警察署、余粮堡警察署、胡家围子警察署、大林警察署和敖力布高警察署。我曾在伪满通辽县警察署任过职，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 通辽警察署

署 长：先后有中间阳去（日本人）、杨裕福、项文范、陈国治四任，是警正衔、荐任官。

署 副：先后有大久保、柳喜久司、伊藤正勇（都是日本人）三任，是警佐衔、委任官。

通辽警察署下设机构：

（一）司法系

主任：先后有顾广忠、马松林、宋元哲、大谷（日本人）四任，是警佐。

司法系主管刑事案件，有组员七、八名，分内外勤，分管拘留所。看守人员四名。

（二）保安系

主任：先后有高级三、张兴镇、结城乐次（朝鲜人）三任，是警佐。

保安系主管各商店开业与废业之许可，及一切卫生等事务，有组员七、八名。

(三) 警务系

主任：先后有李学友、张仲禹、谢××三人，是警尉。
警务系主管警察局务、人事调动、武器与服装的保管等，有组员四、五名。

(四) 经济系

主任：先后有西原市三、岩佐、大水、山川（都是日本人）四任，是警尉衔。

经济系主管统制经济事务，对违反经济法令者进行处理，有组员九名，分内外勤。外勤便衣三名，调查违反经济法令者；内勤六名，办理各商店物价，呈报各种经济文件，经济案件处理手续等业务。

(五) 外勤系

主任：先后有吴多运、乔华栋两任，是警尉衔。

(六) 派出所与分驻所

东门派出所：所长是林福民（警尉补），所员有警长、警士约六、七名，担任管理户口及治安维持工作等；

西门派出所：所长是赵玉昆（警长），所员四、五名；

北门派出所：所长是张仁（警尉补），所员六、七名；

东北门派出所：所长是郜新（警尉补），所员五名；

小街基派出所：所长是赵凤城（警尉补），所员五、六名；

东南门派出所：所长是宁守文，所员六、七名；

南门派出所：所长是刘善治，所员六、七名；

交通门派出所：所长是曾宪武（监督警尉），所员七、八名；

中央派出所：所长先后是李荫范和卢长绥，所员七、八名；

城外有五个分驻所，即五家子分驻所、大德号分驻所、曾家窝堡分驻所、孔家窝堡分驻所和魏家窝堡分驻所，分所长都是警尉补，各个分驻所有所员四、五名。

全署有警察120余名。

二 余粮堡警察署

署长：先任是李学文警佐，后是马光华警佐。

署内分三个系：

（一）警务系

主任：监督警尉佟万生，组员二名，主管人事调动、武器、服装管理等；

（二）司法系

主任：监督警尉周连发（即本文作者），组员三名，主管刑事案件；

（三）保安系

主任：周连发，组员二名，主管商业许可、卫生、物价等业务。

外设六个分驻所：

（1）直属分所，所长警尉补冯文涛，所员六名；

（2）锦隆镇分所，所长警尉补苑生玉，所员五名；

（3）木里图分所，所长警尉补唐万华，所员六名；

（4）大何家窝堡分所，所长警尉补孙国璋，所员五名；

（5）太平庄分所，所长警尉补张锡廉，所员五名；

（6）瓦房分所，所长警尉补白凤鸣（蒙族），所员五名。

全署有警察约40多人，管辖自然屯100余个。

三 胡家围子警察署

署长：先后有王善源警佐、朱清涛警佐两任。

署内有监督警尉刘玉阶等人任系主任职，下设福安屯分所、义庆和分所、张举围子分所和胡家围子分所，各分所除分所长外，有所员五至六名。

全署有警察30多人，管辖近60个自然屯。

四 大林警察署

署长：先后有李学友警佐和张仲禹警佐。

署内有监督警尉杨精一、李洪勋、李永久等任系主任职，下设大林分所、大罕分所、一棵树分所、公济号分所等四个分所，各分所除所长外，有所员五至六名。

全署官警30多人，管辖55个自然屯。

五 敖力布高警察署

敖力布高警察署下辖四个分驻所，敖力布高分所、立德堂分所、腰那力嘎分所和东佳木斯分所。

全署有警察30多人，管辖近60个自然屯。

当时全县有警察250余名，平均800左右人口配备警察一名。在农村，每个警察管理二至三个自然屯，人口在五百至八百之间。

我所知道的兴安西省

暴有山

日伪统治时期，我曾在兴安西分省、兴安西省当过职员。现将我所知道的兴安西省前后的一些情况，穿缀成篇，忆述如下。

一、组织沿革

兴安西省的建置，比兴安北、东、南三个省较晚。日本侵略军占领承德后开始建立，1934年3月以前叫兴安西分省，以后叫兴安西省。1943年10月成立兴安总省时被取消。原兴安西省所辖境内设两个行署，一个在通辽县，一个在林西县。

兴安西分省隶属于兴安总署，当时的机构有总务科、地方科、文教科、劝业科、检查室（不久取消）。上述四科一室之外还有一个警备大队（后来改为警察局）。总务科下设庶务股、文书股、会计股、需用股；地方科下设行政股、财会股、警务股；文教科下设教育股、宗教股；劝业科下设农矿股、畜产股、工商股。职员人数68名左右，多数为蒙古族，还有少数汉族和几名日本人。

兴安西分省省会设在开鲁，所辖旗县为扎鲁特左右两旗（不久合并为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右两旗、克什克腾旗、奈曼旗、开鲁县、林西县、翁牛特旗（不久划归热河省）。

兴安西分省升格为兴安西省后，其组织机构不断扩大，

科股名称变动频繁，约略如下：

总务厅：下设总务科、会计科、经理科、人事科。总务厅后改称省长官房，设秘书室。

民政厅：下设行政科、文教科、劝业科、烟政科、建设科。

警务厅：下设警务科、特务科、保安科、指纹管理室、特务分室（管辖归警务厅，工作归特务机关）。

二、人事情况

省长：第一任扎嘎尔，第二任诺拉嘎尔扎布，第三任旺沁帕尔来。

次长（一度称参与官）：第一任中村，其后有除野、海村等人。

厅长：各厅长均系蒙古族。警务厅长最初为敬文泰，不久更换为日本人当麻。民政厅长首任萨嘎拉扎布，继任旺沁帕尔来（后任省长）。总务厅长第一任敬文泰，后由萨嘎拉扎布改任。实业厅长由原文教科长布和克什克升任。总务科长为萨嘎拉扎布，地方科长为哈丰阿，文教科长为布和克什克，劝业科长为米吉道尔吉。后来继任科长的有锡力德格都、勒旺端鲁布、郭漠北、那孙孟和等人。最初只有警务科、特务科由日本人任科长。后来任科长的日本人逐渐增多，如绪方、义道、寺田茂土、浅野良三、上屋款次等。至于股长更多。1942年末，日本男女职员竟占省公署全部职员的半数左右。来往公文几乎全是日文，汉文多属附件，蒙文偶见一、二。

三、主要大事

兴安西省管辖的六旗二县长达10年，所做之事举其大致如下：

(一) 建省不久，把扎鲁特左翼旗和扎鲁特右翼旗合并为一旗，称扎鲁特旗。

(二) 在劝业科主管下，在开鲁县小街基一带及扎鲁特作过移民土地调查，计划先迁来少数朝鲜人，再迁日本人，实际上只迁来少数朝鲜人。在各旗县建立了兴农合作社，向农牧民强征“出荷粮”、“出荷畜”。在日用品方面，以消费组合作为供应机构，一般商店成立“小卖联盟”。物价实行限制，规定商品必须贴标签。标签分为“公”，即公定价格；“停”，即自发布告后不得再行提价；“自”，即自行定价。重要物资实行配给制。

(三) 在警务厅主持下，日本军、“满洲国”蒙古军五团、警察合力镇压奈曼旗八仙筒事件。1935年7月23日拂晓时分，周荣九领导的抗日武装攻打八仙筒，在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仅用4个小时的时间攻陷八仙筒镇，打死日本参事官山守荣治和指导官中根长一，活捉日本警察署长佐佐木正太郎，警长田金座和警务局长木村等8人，逃出的只有一个名叫须藤的日本人。1936年末，又发生处理“归还兵”事件（在诺门汗战争中逃回的蒙古军队）。日伪当时虽然采取了安抚政策，未敢采取严惩态度，但在各地也杀了不少逃回的蒙古兵。

(四) 在总务科主管下，设置了弘报股，专门宣传“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日满亲善”等等。

(五) 在开鲁县开设了兴安西省地方职员训练所，对各旗县的下级职员进行亲日思想及施政、业务诸方面的教育，以加强其殖民统治。

(六) 强征不合格的国兵（即所谓国兵漏子）服劳役，强化军事设施。

(七) 强迫贫民赴黑龙江省垦荒。1944年我从林西回家时，正遇上去黑龙江垦荒的一批移民。从林西到天山的不到600华里的路途中，我就看到冻死后扔在路旁的迁民尸体五具。其凄惨状况目不忍睹。

(八) 1941年，兴安西省警务厅下属特务分室协助日本特务机关审理乌瑞廷、玛尼拉（女，化名吴淑珍）地下工作组案。

(九) 在文教科主持下，曾选派青年喇嘛赴日本留学。阿鲁科尔沁旗罕庙的青年喇嘛斯楞拉布坦曾在日本和歌山佛教学校学习。伪满兴安西省成立初期，在文教科长布和克什克的西厢房成立蒙文学会，不分蒙汉民族均可参加学习。省公署职员阿木古郎、福令阿等充任义务教师。伪兴安学院学生额尔敦陶格陶、昂如布、德力格尔、玛尼扎布、额尔敦特古斯等热血青年们经常为学会写稿。蒙文学会在宣布解散前曾出版《蒙古秘史》《一层楼》等有历史价值的书籍。文教科出面交涉，在开鲁成立两所国民高等学校。第一国民高等学校专收蒙古族学生，第二国民高等学校专收汉族学生。

四、人口状况

兴安西省辖6旗2县，据满洲国1941年的政府公报披露，总人口为753,701人，占满洲国总人口的1.8%，在全满洲国1个特别市、19个省中，位列第14，如果同当时的日本内地人口比较，比后川县多6000人。在兴安西省的6旗2县中，人口最多的是奈曼旗，共有174,486人。其次是开鲁县、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人口最少是鄂林右旗，只有62,978人。全省人口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10.3人。在全满洲国列第17位。总人口中男性428,018人，女性335,583人。男女比例是128:100，比全满洲国的男女比例123:100略高。

五、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派人主政

在满洲国的各级各类机关，上至国务院总理，下一个旗的旗长以及一个小学的校长，正职都是中国人，副职都是日本人。从表面上看满洲国的一切权力都在中国人手中，实际恰恰相反，一切权力都操在任副职的日本人手中。日本当局在满洲国，不仅制定严密的政策、制度来控制中国官员，而且派人参政进行直接监督。在伪满时代，旗有参事官，省有次长或参与官，中央国务院有总务厅长官，各部有次长，军队有顾问。皇帝跟前还有“满洲国皇室御用挂”。这就是日本侵略者所实行的殖民统治的重要特征——派人主政。

伪满开鲁县基层统治机构

赵国恩

193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开鲁县后，为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采取了“以夷治夷”的策略，迅速建立了伪满政权机构。

首先组建了开鲁县公署，翌年，在开鲁城乡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全县共设“一街九村”。开鲁城镇为开鲁街公所，辖崇仁、耀武、正义、宣武四个区。农村以旧中国时的东西南北四个乡划分，共设九个村公所。东乡两个村：金家店村（现东风镇）、道德营子村；西乡两个村：富通镇村（现麦新镇）、三道湾子村；南乡两个村：西扎兰营子村（现大榆树镇）、东扎兰营子村；北乡三个村：坤都岭村，陶官堡村、双四台村（现俊昌乡）

各街、村公所设街、村长一人（由当时的大粮户或有钱有势者充任），助理员（副村长）一人、司计一人。街、村的行政领导统归县公署的行政科街村股领导。各街、村公所内设五个系：总务系，主管村公所一切杂事项、收发文件、办公人员病事假登记、房屋维修、职员福利以及向报纸提供稿件等；动员系（兵事民簿系），主管征兵，调遣勤劳奉侍仕队，派劳工修河坝、道路，户口迁出迁入，调查特贫困户为迁民做准备等；实业系，主管统销物资上调，生活必需品（食盐、火柴、布匹）的分配，主要农牧产品（线麻、蓖麻籽、肉类）上缴，皮毛收购以及分配日造所谓新式农具等；财务

系，主管门户费、土地费及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防疫保健系，主管传染病防治和报告、宣传清洁卫生知识，带领防疫人员巡回预防注射等。各系设主任一名，办事员四至六名不等。

街、村公所内还有附设机构三个：“协和分会”，会长由村长兼任，主要任务是搞以“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为内容的反动宣传。“青年训练所”，主要是对青年灌输对日本天皇的崇敬、对伪满皇帝的爱戴和天地君亲师五大精神以及学习日语等奴化教育。“兴农办事处”主管出荷粮和统购农产品的督促送交等。

各村还派有特派防风林监视员一名。

为了便于统治，日本侵略者还推行了归屯并户（强制稀疏的居户搬到指定的屯子居住）和保甲制度。在村公所以下又设屯公所（甲）。一般每村下设八个屯，每屯设屯长（甲长）一人、管帐（书记）一人、屯丁一人。屯以下每十户至二十户为一牌，设有牌长。

村公所的一切费用和人员薪水，上级一概不发，统由村所辖百姓按土地面积和户数人口分摊。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强化“治安”，日本侵略者在建立伪县公署的同时成立了开鲁县警察署，刚建立时仅有署长一人，文书一人，巡官二人。为补充人员和培训汉奸，1935年在开鲁又成立了警察学校，为日本侵略者镇压人民训练了一批忠实的走狗。1936年日本侵略者推行了警察控制法，扩大了警察机构，在县警察署内增设了警务系、保安和特务系。在开鲁街和农村增设了五个警察署：开鲁街警察署、道德营子警察署、富通镇警察署、西扎兰营子警察署、陶官堡警察署。开鲁街四门各设有警察派出所，各村也都分别设有派出所。当时，警察署与派出所的职责范围很大，警察充当了日本侵略者“以夷治夷”的急先锋。

伪满协和会

关朝格珠

1941年12月1日，我从兴安学院毕业后，经由兴安总省公署人事科分配，到协和会兴安总省本部当雇员，后又调到东科后旗协合会本部工作。在此期间，我逐步了解了有关协和会的工作性质、组织系统和行动纲领。

一、组织系统

在新京(长春市)与政府并列设有满洲帝国协和会中央本部，部长由原关东军参谋三宅光治担任。本部内设有总监部和统监部。后来在各省市设有协和会省市本部，部长由各省市长兼任。然而，实际工作由事务长负责进行。当时，在各旗县设有旗县本部，在各行政区和努图克设置分会，由区长和努图克达任分会长。每个分会设专职书记一、二名，分会会员是图村长(艾里达)。因为，发展会员时首先考虑这些人，然后才能逐步发展所谓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绅士和有势力者)。各级本部对会员都发给会员证，其作用也无非是证明你是某某分会的会员、应遵守哪些章程、每月交纳多少会费之类罢了。

会员主要协助协和会完成各项任务，如向上级汇报农村情况，尤其注意流言蜚语，社会动态。这就是当会员的义务。

二、行动纲领

(一)发扬建国精神。根据满洲帝国执政宣言表明：“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别，国际之争，皇道乐土，当可见诸实施。”这就是满洲帝国的建国精神。

(二)实现民族协和。就是说,在满洲帝国范围内的各民族不论强弱,没有尊卑,一视平等,努力协作,开发资源全力支援大东亚圣战,以期巩固大东亚共荣圈的完成。

(三)实现皇道乐土。国防方面在日军的保护下,各民族都要一心一意地开发资源,支援战争,做到自给自足,实现幸福生活。

(四)彻底宣德达情。要大力宣传建立满洲帝国的理想和实施各项政策的目的,并协调民心,做到上下通气。

(五)完成国民动员,要认真组织各阶层的力量,一旦爆发战争,全体国民都能动员起来为打胜仗出力。

三、协和会东科后旗本部的创立

协和会东科后旗本部于1942年10月1日宣告成立。部长由旗长达瓦敖斯尔担任。代事务长中内脩(日本人)负责本部全面工作。雇员有关朝格珠、小必力格和获原敏雄(日本人)本部下设三个班,处理日常工作。

(一)指导班班长小必力格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二)庶务班长代班长关朝格珠负责事务财会工作。

(三)青少年班班长获原敏雄负责青少年的组织训练工作兼青年训练所主事。

在本部下设三个班中,青少年班的具体工作较广泛,其作用尤其很重要。协和会的大部分工作通过青年训练所去完成。由于协和会旗本部成立时,青年训练所创立已三年之久,所以已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当时,吉尔嘎朗青年训练所助教叫长野稔(日本人),翻译叫巴图孟贺,助手有扎木斯楞和敖力布。此外在各区都设有青年工作员一至二名,由每期正式学校毕业的优秀青年选拔担任。

青年训练所每年办一次为期三个月的优秀青年训练班。

班額限制在50名左右。學員必須具備一定文化，身強力壯等條件。訓練班從春播開始到鋤完二遍地便結束。學員都在地裏邊干活邊進行些軍事訓練活動。因為訓練所裏有一部分耕地，到秋季由農村再召集各區青年工作員進行一次一個月的集訓，在這當中把莊稼就收割完了。

此外，各區的工作員在農村還辦一些輪訓班，開展有益於各村屯適齡青年的其它活動。內容也和訓練所布置的訓練內容大致一樣，只是形式多樣些。這些活動由工作員巡回各村屯來完成。如果在農村一旦發現異常現象，如有損於國家政策的言論、流言蜚語等等，都當作情報向青年訓練所匯報。除此之外工作人員每月還必須到訓練所去匯報一次，並接受任務。

1943年和1944年的兩期訓練生，由於鬧傳染性痢疾或吃不飽飯而都未完滿結束。

1945年春，由旗本部決定派我到青年訓練所負責完成東科後旗訓練任務。這時候原主事荻原敏雄和長野稔已調到旗本部工作了。這期的軍事教官是額爾敦烏拉（黑五家子人，第九軍管區中尉）。當時，每期訓練班都由第九軍管區派遣軍官（中尉級）擔任軍訓課。

四、工作活動情況

東科後旗本部於1942年10月1日成立不久，在全旗努圖克達會議上宣告成立了努圖克分會。宣傳的宗旨是，協和會是群眾組織，是替老百姓說話，給老百姓辦事的機構，所以，對此項工作各努圖克都表示歡迎。努圖克達兼分會會長，分會還設專職書記一名，由分會會長物色適當人選報請協和會本部批准。

東科後旗第一個努圖克分會於年末在吉爾嘎朗成立，

努图克达乌力吉吐兼分会长，专职书记由王文楼担任。会员有吉尔嘎郎街商号德增隆、东盛和和济泰昌的掌柜吴志国、杨旭东和刘鸿勋以及各艾里达等。会员的工作主要是为协和分会和政府的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如春耕、夏锄、秋收、打场、送出荷粮、出荷牲畜、出劳工、出国兵等等。会员还有义务完成情报的上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向旗本部用书面汇报。

1943年春，中内脩应征入伍。所以，从海拉尔法院调早坂勘次郎来后旗本部当事务长。从此，在全旗范围内相继成立了协和会各努图克分会。

五、关于联合协议会

从中央到地方分会每年召开一次联合协议会。其形式是协商研究，其内容即协和会工作行动纲领中的第四项宣德达情。通过这种会议大肆宣扬满洲帝国的德政方针，并通过协商研究了解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同时，以提案形式层层报请上一级联议会研究接受解决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宣德达情”的实施形式。

1943年在联合协议会上，由地方协议员提出提案：今年东科后旗不应出勤劳奉侍队给科左中旗挖河，而应在本旗公司五家子和新庙的海虎苏挖河顺水，兴修水利，为多打粮食创造有利条件。这件提案上报批准后，1944年后旗勤劳奉侍队百十来人由旗行政科动员股长宝东皋率领，在旗内挖河修渠。当时所谓“勤劳奉仕队”一般由适龄青年检查国兵未合格者也叫“国兵漏子”组成。

六、关于情报工作

日本人最敏感的是情报工作，收集情报是协和会非常重要的任务。中央本部每月向各旗县发送一份带有“秘”字通

报。一般介绍协和会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还有发生在各地的有关所谓“敌情”。

当时，锦州省兴城县本部的青少年团的活动特别突出，谁家从何处来客，说些什么，住了几天，去向何方等等，都了如指掌，被树为典型。

当时，建平县一带已发现有八路军地下活动的踪迹。从那以后，东科后旗也很注重这方面的情报，本部组织人员经常走访几个边缘地区掌握情况。甘旗卡火车站的商会会长魏国瑞家，经常从黑山方面来人的情况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反映给日本人的。从1944年起在铁路沿线如伊胡塔、欧里、金宝屯等车站也被列入掌握情报重点区。吉尔嘎朗街的商号掌柜汤旭东、刘鸿勋、吴志国，当过旗长的包尼雅巴斯尔赵寿田(色冷道尔吉)和兴农合作社的王家三等，头面人物都被列入需要经常留意考查的人物。被怀疑的无非是家里多，言论自由，平时接触人多等罢了。

伪满兴农合作社

白广义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北农村经济进行统治和掠夺，从1933年（大同2年）起先后在东北各省、市、县成立几种合作社。同年，在东科后旗公署所在地吉尔嘎朗成立了金融合作社，开始控制金融流通。1937年（康德4年）又建立了农事合作社，控制农业经济。1940年（康德7年）金融农事两社合并，改为东科后旗兴农合作社。这个经济掠夺机构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中央会，设在新京（今长春市），兴安南省设有联社，旗县设兴农合作社，基层以村屯为单位成立兴农会，强迫农户加入。

兴农合作社所标榜的宗旨是：“增进农民福利，是以农民协同精神为基调的社会团体。改良和发展农业，发展国家经济，以资顺利完成农业国策。”“农村组织化”、“农民组织化”是兴农合作社的口号。但其实质是为日本侵略者全面控制和掠夺农牧民财富的机构。举凡日伪反动政府在农村推行的一切政策和采取的所有措施，诸如：征兵、逼“出荷”、配给、摊派、抓劳工等等无不有兴农合作社参与其间。我作为当事人，对东科后旗兴农合作社耳闻目睹一些情况，现追述于后。

后旗兴农合作社设有社长、理事长、理事、监事、参事等官员。社长由旗长，兼理事长高松喜代（日本人），理事先后有花村

秋夫（日本人）、中尾义夫（日本人）、主托菊池（日本人）。下设三个系：总务系、实业系、信用系。经营项目繁多，有贩卖事业、信用事业、仓库事业、利用事业、购买事业和家畜交易事业等，并在基层金宝屯、吉尔嘎朗、伊胡塔三处设置交易场，作为兴农合作社的派出贸易单位，以搜刮农牧民财物。1942年（康德9年）兴农合作社调整扩大机构，全社系统有职员五十余人。其中日本人占百分之二十多。

理事长室下设三个系和三个部：

1、企业系、庶务系，经理系。

2、农事部，有农事系和两个办事处（即吉尔嘎朗、郑家屯办事处）；

3、购买贩卖部，有购买系、贩卖系、交易系；

4、信用部，有贷付系、贮金系。

农事部下设的两个办事处的官职分系长、主事、理事、司事、司事补、职员（雇员）。

日本侵略者对东科后旗的经济掠夺，首先是通过兴农合作社的各项事业垄断全旗经济。为了实现其最大限度的掠夺，在农产品购销方面实行两种残酷政策，即“粮谷出荷”和“粮谷配给”。1938年公布粮谷管理法和成立“满洲粮谷股份公司”，从此，以稻米为主的粮谷购销均由满洲政府控制，并由满洲粮谷贸易公司进行。甘旗卡地区粮谷统一由东亚公司收购上交兴农合作社。私人买卖粮谷一律按经济犯论处。

1939年（康德6年）颁布主要特产专卖法，建立特产专卖公司，从而垄断了大豆、苏子、蓖麻子、小麻子等油料作物，进行廉价搜刮。粮谷油料由原来的控制变为强迫收购，即推行了粮谷特产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售粮。

1941年（康德8年）又以极微的预付，每百斤一元钱（伪币）与农民签订出荷粮契约，其实是强制摊派。日本侵略者以大东亚战争的绝对需要为名，由满洲中央逐级摊派到地方，由地方再摊派到农民头上，一律强迫缴纳。到1942年（康德9年），日本总务长官在旗县长会议上叫嚣，“要以武力强迫出荷”。每年秋收时，伪满政府便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和协和会官员以及兴农合作社官吏到处逼迫农民粮谷出荷。到农民家翻箱倒柜，寻找藏粮打骂农民，对缴不上出荷粮者则灌煤油、灌凉水，逼得农民年产粮大半或全部出荷。一般年景尚且如此，遇有荒年逼得农民四处高价购粮缴纳“出荷”。出荷粮结束后，如果农民手中有粮，一经发现，不但非法没收，而且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藏粮者加以严惩。后旗蒙汉各族群众由此而饱受了无法言喻的苦难。

“大东亚战争”开始之际，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末日临近之时。为了拯救其败局，实行粮谷配给，以原粮为标准，城镇一般居民成人每月供给18斤，小孩14斤，农村较城镇更为苛刻，大人每月配给13斤，小孩12到13斤。

日本侵略者为掠夺百姓的劳动成果除公开压榨以外，还采用虚假的欺骗手段，通过兴农合作社以“增进农民福利”为名，采取联保形式，以农民土地多寡为据借给贷款，秋后收获的粮食全部送交兴农合作社。经过轮番检质低价收购，扣回贷款，放回余额所剩微乎其微。其结果农民不但没有解决困难，全年劳动被掠夺一空。

1943年（康德10年）又推行物资统制政策，对人民实行生活用品“配给”，把人民生活降到极低限度。通过兴农合作社发放配给品：棉布、棉线、棉絮、食油（豆油）、食盐、火柴、煤油、鞋袜、毛巾乃至烟酒糖茶等等。数量极微，次

数很少。配给物品又是层层下发，层层克扣，到老百姓手里已寥寥无几或者根本得不到。较好物品，官吏从中掠夺，农牧民得到的只有“更生布”之类的东西。

对牲畜和畜产品的掠夺则与“出荷粮”相似，肉牛出荷，是以牧民占有牲畜多少强迫交出荷牛。畜产品强行收购。每年举行一次或几次牲畜评选会，由畜产部门评定优势，选中者给“奖”收购。军用畜则强制低价收购或无偿摊派。对皮毛也实行统制，禁止私人买卖。在日本侵略的14年中东科后旗被以低价收买和摊派白拿的牲畜数量难以计数。

由此不难看出，兴农合作社在加强对牧农民的控制和掠夺上，是不无作用的，对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是毫无助益的。

满洲国的“新学制”

王 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国东北（包括内蒙东四盟）的教育事业已在日本的控制之下。1937年，日本侵略者开始推行所谓的“新学制”。首先是在各类学校废除原有的教材，甚至连一张地图也不准挂，然后组织力量编写、出版了新教材。日语被列为小学、中学、大学的主课。原有的中国传统的民族教育，几乎被摧残殆尽。这个“新学制”，在小学教育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前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初级学校”，后二年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教育阶段把中国原有的六年制缩短为四年制，称之为“国民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废除了一般中国教育的四年制，改为3年制。全部学程13年，据说这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整整5年。

这套“新学制”的根本特点，就是殖民奴化教育。在这种奴化教育政策下，不论小学、中学、大学，都必须“虔诚”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都必须称赞“日满亲善”和“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都必须竭尽心意拥护“大东亚圣战”。至于伪满皇帝所发布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等，都强迫学生背诵烂熟。我们在校期间，每日“早礼”都必须向皇帝“遥拜”，早自习第一项就是背诵《国民训》。

在课程设置和教材方面，小学设有一门“国民科”的课

程，几乎占去全部课程的二分之一。它是把日本殖民主义的政治和语文混在一起，并用日语讲一半课。因此能用“协和语”（中日语混杂）讲课的老师更被日本人重视了。1942年，小学又增设一门“建国精神”课，并取消了地理、历史课。所谓“建国精神”，讲的不外乎是“日满一德一心”，“日华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内容。中学课程以“国民道德”作为主课，后来改为“建国精神”课。1944年我考入奉天（现沈阳）铁路学院，该学院分二部生和一部生，我是一部生，即国民优级毕业考入的，属于中专，除了专业课之外，就是以日语讲授的“建国精神”。其内容有驯服中国人的《中坚国民》、《学生之本分》等，还有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指溥仪登台）、以及宣扬民族协和的《日满一德一心》等等。“建国精神”课，集中宣扬“天照大神”。同时，在语文课中，更是大力宣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为其侵略战争涂脂抹粉。

“新学制”中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占据突出地位。为了促进日语成为“国语”，实行了日语的“检定制度”，经考试可以取得特等、一等、二等、三等的资格。学生升学或就业，都要看日语，日语不好的就遭冷遇。我们进入奉天铁路学院念书时有一条规定，在校院内要互相监督，谁如果说一句中国话就罚谁一角钱，投入“国防献金箱”内，以强迫师生说日语。后来，在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乃至理科课本中，对外国人名、地名和技术专用词，都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在报纸、杂志、书籍中，也常常夹进这种古怪的拼音文字，以及汉语与日语、蒙语与日语混杂的所谓“协和语”。

伪满时期扎鲁特旗的集屯并户

张戒三

1937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法西斯专制，在扎旗施行集屯并户。所谓集屯并户，就是测定一个四面不靠山、交通方便的地方，做为大型并户定点。限令30天内把散居在山沟里的屯户，全部搬到指定地点，住在棚里打墙盖房，否则，轻骂重打，拆旧房扒老墙。由于时间短的关系，搬迁户旧房已被拆掉，新房又没盖上，只好委屈将就，以棚代房。

居民点的规模大小不一样，四、五个，五、六个小屯合并成一个大部落，设“部落达”，几个部落组成一个嘎查，委任“嘎查达”。部落下委任“阿日本达”，少者几个，多者十几个。这“三达”就是百家长、村长和十家长。

当时，扎旗全旗只有2000多户，人口不足一万，可是却设有120个多武装警察。在这些警察中，旗警务科仅留20名，其余人员均分派在各警察署、所。根据扎旗的户数和地域情况，在鲁北、梅林庙、巨里黑设有三个警察署。每个署下设两个分驻所，署和所里的人员又分为内勤和外勤。外勤在各个部落中进行特务活动，主要是搜查抗日联军和爱国人士的反满活动……

在并户的同时，强令民间的所有枪支弹药全部上缴，只允许王公本人留枪一支。而王公留的枪，必须通过旗公署、警务科打印发照，否则，以国事犯论处…… 1943年，又缴回了王公的枪。

1938年，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制定了全国户口调查办法。

1939年，开始进行国势调查建立民记簿，发放随身带的国民手册，以证实个人身份。其主要目的是，防御共产党入境活动。此项工作，由旗公署行政科民籍股主管。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前夕，日本侵略者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法西斯措施。警务科改为扎旗国境警察队，警察署改为区队，分驻所改为小队。又加强了警察的武器装备。同年秋，道尔吉又组织了“退役军警特设队”，约50余人，在一、二区巡回搜查。

集屯并户给老百姓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四区天佐屯为例。该屯原名“老道沟”，并户后叫“天佐屯”。这个屯在并户时迁了6个自然屯，85户，每户的新旧房屋按三间计算，合款900元，再加上四个宅院4800元，总耗资额81300元。

四区有700多户，共有自然屯42个，其中被拆迁的屯27个，户数400多。这些个屯、户合并成16个大部落。拆迁费以天佐屯为例，全区耗资量432,000元。

扎旗共有5个区，按四区拆迁费用的50%计算，全旗的经济损失达1080万元。

集屯并户对扎旗各族人民是一场灾难。据我所知，巨里黑、天佐屯被拆迁的人口382人中，打瞎眼的有2人，男女各1人，产期母子双亡的有3户，6个人。据统计，被迁的老百姓多日住在棚里，受了风、寒、暑、湿的侵袭，患腰腿痛和抽疯的人占总人口的50%，患病身亡者甚多。

科左后旗的喇嘛学校

特木勒巴拉

伪满时期，广大蒙民几乎都信喇嘛教。根据1937年的统计，东科后旗（今科尔沁左翼后旗）喇嘛庙有32所，喇嘛1,728人，每百名男子中有5.3名喇嘛。日本帝国主义把发展喇嘛教视为搞政治渗透、笼络人心、强化统治的灵丹妙药。所以，他们在统治机构中设置了礼教股和喇嘛委员会，专门管理喇嘛教，还成立一所喇嘛学校。

1939年，派赴日本京都市智恩院留学的双福寺的道日本（喇嘛职称）喇嘛仁忠归国。伪旗公署就派他任喇嘛学校校长，让他着手筹备喇嘛学校的建校工作。不久又来一名叫吉田三郎的日本喇嘛，名义上协助仁忠办学，实际上掌握了学校大权。他经常到参事官室汇报学校情况，接受指示。同年4月1日，喇嘛学校开学。校址在广福寺西北200米处的育成寺（这是吉尔嘎朗国民优级学校旧址）。喇嘛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对喇嘛灌输‘建国’精神，发展喇嘛教，提高喇嘛素质”。学校经费的来源情况：从全旗各庙征集500元，伪旗公署补助1,100元，全旗各努图克补助1,100元，化募拾善收入200元，每年总计2,900余元。学生原定从旗内各庙招收7—15岁的小喇嘛100名，双福寺和广福寺两个大庙各20名，余者由其它各庙保送，但实际报到的小喇嘛共80多人。学校分为甲、乙、丙三个班。初期的教师有仁忠、吉田三郎、赛音毕力格、洛布僧四人，1944年又新增仁吉德、葛朝格等五

人。教学科目有诵经、蒙古语、日语、美术、体操、图画、音乐、劳作。学校使用的教材是当时伪满小学的课本。

东科后旗喇嘛学校建校后，日本喇嘛在早会上经常对学生训话，其内容是“日满亲善”，“天皇陛下的圣恩”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又新添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学生完全听不懂的一套东西。学生在平日生活上的礼节如早安、午安、晚安、再见等全得用日语。每天吃饭时全体先合掌，然后念一段经。吃完饭也要一同用日语说：“领过了，谢谢！”。教学方法采取法西斯那套，学生不守纪律就遭体罚。日本教师常常将不听话的学生踢倒在地。有的喇嘛学生不说日语，也要遭到日本人的打骂。

1944年，学校又派一名教师同青年训练所的一名教官赴新京（今长春）军事部学习军事训练约一周。回来后在学生中开展了军事训练。

喇嘛学校的教师有的是从本校年龄大、成绩好的学生中选拨的，如大宝音吐、小宝音吐、嘎吉德、仁吉德、葛朝格等人都曾保送到开鲁临时教员养成所学习二年后任文化课教员。其中有的再派到日本深造，称为喇嘛留学生。喇嘛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被推荐到日本留学的先后有数期，共8人。他们留学在和歌山、高野山、京都市的智恩院和比睿山等僧院；个别人也有入佛教专门学校的。东科后旗喇嘛学校原定学制为4年，直至1945年8月并未培养出满学制的毕业生。

吉尔嘎郎国民优级学校

特木勒巴拉

1932年8月，日伪在博王府（后改为吉尔嘎郎图塔拉）建立东科后旗公署后，从第二年开始办了一批小学。自1938年日伪实行“新学制”后，把原来的私塾有的改为国民学校有的称为国民义塾。这里开办最早的是在1932年11月成立的博王府旗立第一小学。该校成立当年学生只有50名，是由伪旗公署向旗内8个努图克分配名额强行招来的。第一任校长是温都苏（包喜文），原籍康平县马围子村人。初期，学生伙食费全是公给。每个学生每年还发一套学生服，校址在广福寺大庙西约200米处，校舍利用育成寺东西偏殿和附近几所砖平房，设备极为简陋。到1934年，原校长因反对当时的伪旗长额尔德尼毕力格被罢免。由李树彬（额木格喜）继任校长。这时学生数已达150名，4个年级并为2个年级，一个复试班共3个班教学。教学科目有蒙文、汉文、算术、体操、音乐、图画等。教员除校长外共6人，其中二人是奉天兴安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一人是由伪旗公署分配，有一名女教师为奉天第四女中毕业，还有2名蒙文教师是旧札萨克时期的笔贴式，年已花甲。从1937年开始因有了高一年级生，校名改为东科后旗旗立第一两级小学校。高年级每周二节日语，由中国教师教日本字母。建校后虽然增设日语课，而且伪旗公署也有令学日语，但学校只挂教日语的牌子，搞形式。教了一年，学生普遍没学到什么日语。教师的主要精力放在五

语文和算术上，未把教日语当做一回事。同年，旗立公司五家子第二两级小学校迁到博王府，合并到第一小学校内，学生和教师都增加一倍。而后由伪旗公署拨款，在离居民数华里远的南甸子新盖了校舍。第二年全校师生迁入新舍上课。这时，由于吉尔嘎郎街的汉族人口增加，也招收了汉族学生，开始成为蒙汉合校。

1938年5月1日，伪满实行“新学制”，校名改为东科后旗公立吉尔嘎郎图塔拉国民优级学校。国民学校四年制，毕业后升入两年制的优级学校。学校从春季始业：自2月14日至7月20日为上学期；8月9日至翌年1月3日为下学期寒假20天，暑假40天。“新学制”在课程设置上，突出表现是日语每周增加五至六节，还加了实务课，将汉语改称“满语”。这时学校的班数：优级班4个，国民班8个，学生611名，教师12名。同年萨楞阿（张天惠）任校长，伪旗公署派一名日本职员叫栗山清利的搞庶务，不久任主事。据说，他是在日本办过多年小学教育的人。学校经费年支出2万3千元。本学年终，有两班优级毕业生，是建校以来第一期毕业生。当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的当晚发生一桩有趣的事。其经过是：当时学校除了伪满规定的节假日放假外，每遇广福寺大庙的经会也要放假。农历4月7日是广福寺大庙的玛义经会的例会，学生都去逛庙看看热闹。当天，日本参事官的翻译官和一名警察因人群拥挤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并打了一名学生。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由于学生的家多在农村，他们对警察在农村借口检查卫生或查户口勒索打骂老百姓早已愤愤不平，所以，就议妥等到毕业那天定要痛打一顿日本翻译官和那个警察，出出气。那警察叫拉喜，平日同日本翻译形影不离，经常到道北的协

盛东商店吸毒过烟瘾。1939年（伪康德六年）1月3日，吉尔嘎郎国民优级学校举行第一期毕业生典礼的当晚，学生们先探知翻译官和警察拉喜正躺在协盛东商店的后屋炕上吸鸦片。学生们就按原定计划号召四年以上学生300多人全出动，并商定年龄小的同学只限呐喊助威，年龄大的同学直接与警察交手（当时，学生年龄都很大，优级生多数在十七、八岁有的已经结婚）。届时由毕业生和优级一年生胡森巴吐和保家、古儒扎布、陈刚等人把同学们安排好后，在商店以他们卖的梨不好为借口同掌柜争吵起来。掌柜仗着拉喜警察、翻译官的势力，首先打了一名学生一耳光。这时屋里学生一声呐喊，外面的学生一拥而进，将商店全砸了。在后屋吸鸦片的警察拉喜和翻译官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责骂学生。未等他说完，学生们群起围上去，一阵拳打脚踢警察拉喜急忙把指挥刀抽出来，被学生夺过来扔到地上，采得稀巴烂。屋里正在吵喊撕打，外边几百名小学生在暗处一个劲地喊“警察打人啦！警察打人啦！”这时早已惊动了日本参事官，气笛长鸣，把几十名警察全部召集起来，到现场制止了学生的行动。第二天，日本参事官松本幸一把几名肇事的学生和主事栗山清利找去，将学生训了一顿。从那以后栗山清利经常受到参事官室的训斥。不久栗山清利被调离这个学校。学生打警察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1939年1月，吉尔嘎郎国民优级学校被伪兴安南省指定为全省实验初等学校。到1941年，该校学生增加到700多人，14个班，教师19名。原校长萨楞阿去日本留学，由色楞道尔吉（崔宪明）继任校长。栗山清利走后，伪旗公署又派一名日本人叫丸田正弘的任主事。丸田正弘是日本农业学校毕业生，身体短粗，长方脸，高鼻梁，大眼睛。他一见

学生做了他不顺眼的事。张口就大喊“喇达！库拉！”或者厉声地骂“巴嘎！”是一个粗暴之徒。1942年又派来一名日本教员叫森崎。他是日本寻常高等大学毕业，来东北后，在伪中央师道训练所受训一年。学校的其他教员多半是当时师道学校特修科毕业生（类似普通师范），有几名是师道学校本科或兴安学院五年毕业生，个别的也有在日本师范毕业的。其中女教师有五、六人，一般都是女子国高毕业。这些人都是受过日伪教育的青年教师，他们对当时的各种报刊、新闻都不感兴趣，成堆的报纸平时没有一人去看。有的人心直口快，脱口就说：“这些报纸不是吹牛就是撒谎”。他们对日本主事和教师极端不满。日本主事和教师，狂妄自大，态度蛮横，语言污秽。有时教师也和日本主事及教师顶撞，但最后教师总是败下阵来。由于丸田的跋扈专横，学校忽视文化课，偏重体育训练和军事训练。同时又出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仪式和礼节，其中突出的是让学生参加额外的体力劳动，名为“劳作训练”，尤其强调日语训练，学校的体育口令全用日语，高年级学生有事进出教员室打招呼都用日语。学生早或晚见到教师都用日语说：“倭哈吹咕杂一马斯，昆尼气洼，昆帮洼”等等。日本教员吩咐学生做一件事，走时还要让学生用日语复述一遍。学校对学生的军事和体育训练有两种：一种是早会训练，每天的早操往往以军事训练代替，班主任带领本班学生走步，跑步，进行无休止的训练；一种叫所谓“爱国训练”，每星期六全校学生齐集操场，先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军事操练，然后以分列式进行统一阅兵，受校长或主事的检阅，不得有半点马虎，最后由主事训话，内容多半是学生听不懂，教师听惯了而又不愿听的一些什么“日满一德一心”，“大东亚圣战”“当忠良的满洲国

民”“为天皇陛下尽忠”等等。每逢节日举行典礼，有一项目叫恭读《回銮训民诏书》。这个所谓的“诏书”是1935年5月2日溥仪拜访日本天皇裕仁归来后向所谓“全体满洲国民”发出的。在读诏书时，师生全体低头，读完后才准许抬头。至于向东方给溥仪和裕仁遥拜是最普通的事，不仅节日就是每天早操前也要先来一次九十度敬礼，名为“东方遥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将每年12月8日定为“升国旗日”，名为“大东亚圣战胜利纪念日”。届时举行仪式向所谓阵亡将士默祷，向“天皇”和“皇帝”遥拜。不久伪满洲国公布“国民训”。全校学生在每天上第一节课前齐读“国民训”，高年级用日语齐读。

1943年春季，学校里又发生一起一般教师和日本教员之间的纠纷。丸田正弘外出了，校长去伪中央师道训练所受训，森崎从日本人特有的优越感出发，代行主事职权。星期日、森崎让全校四年以上学生上山打柴，规定清晨出发，回来后才吃早饭。这时，有三、四名青年班主任教师没按他规定的时间去做。通知学生吃完早饭9时上山。等到9时各班学生正要出发，森崎带领一班学生每人背着一捆柴禾疲倦地从山上走回来。这天虽然按森崎的主张打了柴禾，但时间上有了出入。为此，森崎在当天下午以粗野的态度和这几名教师争论起来，他强调统一行动，自称是代理主事。可是这几名教师却说，学生不吃饭上山会饿坏肚子的，而且星期日就是9时上山也不影响打柴。最后森崎强硬地提出让每人写一份“悔过书”（日语称始末书），等丸田回来处理。几名教师虽然写了悔过书，但都写了自己的正确主张，根本没写有什么错误。过两天丸田回来也没有怎么样。后来，学生们偷看森崎的日记时发现，写有“赛音温都拉虎、

特木巴拉，朝格珠门斯采等是危险人物”的字样。几位青年教师听了后都非常气愤。师生们私下议论：关心学生健康是对的，反倒被列为“危险人物”，真是岂有此理！

这一年七月，有一天在劳动课时间，优级一年乙班学生由班主任带领在校田里拔草。由于天气炎热，学生个个满头冒汗，有的边劳动边哼着一支小调。这时，森崎倒背手，赤着脚紧步走过来。他摆出一副蛮横的架式，声色俱厉地下令学生停止唱歌。班主任也尴尬起来，但也只好忍气吞声。下午，森崎把这班学生中的男生都找来，让他们在办公室门前集合。先不知讲了一些什么，随后就从排头开始，每个学生都狠狠打了一记耳光。到排尾时，又把几名年龄小的学生踢倒在地上。他又回来站在学生前讲话。这时站在排头名叫白乙拉的学生，从排里猛然跳出来；他个子很高、身体也健壮，趁森崎不防给森崎两记大耳光。森崎一下子低下头去用双手抚摩被打的两个面颊，颓丧地站在那里。这时全班学生都激发起来，要上前继续打森崎。班主任老师正在办公室，目睹这情景怕事态扩大，忙着走出来制止学生的行动。森崎这时一声不吭，灰溜溜地回到宿舍去了。过了两天，丸田正弘从外边回校。他就向全校学生宣布将白乙拉、古哲等6名学生以不守校规为由开除学籍。班主任教师在这6名生离校前暗中以私人关系分别给学生家乡的新庙、公河来国民优级学校的校长写了信。这些学生分别把这两封信带到这两个学校被顺利收留，编入同年级。以后，他们都照例升上中等学校。

1943年，前往伪中央师道训练所受训的校长色楞道尔吉归校，不几天调到文教科。由刚嘎木仁继任校长。这时日本

主事丸田弘在沈阳病死。森崎应征去当炮灰，临走以前，他蓬头垢面地从宿舍来到办公室，向教师们吞吞吐吐地说：

“我要上前线去了……”往日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早已从他的脸上消失。看来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走后学校没有日本人了但伪警察还在暗中监视本校教师。1944年夏季有一天，一名警察来找四年级班主任乌英阿，他说乌老师打了他的孩子，因此，双方吵起嘴来。然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找到校长室。年轻的校长刚嘎木仁更不听邪，二话没说，立即将那警察的帽子、肩牌、指挥棍一齐掳下来。然后向伪警务科打电话报告了那位警察的无理行为。后来听说伪警务科已处分了那个警察。

1945年春，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伪满洲国即将垮台。这时，吉尔嘎朗国民优级学校师生的思想也进一步发生变化。学生做完早操回教室，有些进步的青年教师就对部分高年级学生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

“八·一五”后，吉尔嘎朗国民优级学校出身的青年学生很快走向革命道路，与此不无有关。

吉尔嘎朗国民优级学校于1945年7月放暑假。未等开学，伪满洲国垮台的迹象处处可见，因而，学校就从此停办。

1938年到1944年期间，该校共毕业7期学生，近500人。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考入当时的各类中等学校。少数人又由中学升入各类高等学校。这些学生虽然接受了日伪教育，但在祖国解放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觉悟迅速提高，他们高举民族解放的革命旗帜，走向了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的正确之路。

注：本文据本旗档案馆保存资料和政协委员白广普同志以及笔者本身的回

忆撰写,1945年初的情况参考了1983年呼市老干部座谈会上部分老干部的发言。笔者从1935年至1937年就学习于东科后旗立第一两级小学校。1939年在扎兰屯师道学校特修科毕业后,在本旗公营子小学任教。1941年8月调到吉尔嘎朗国民优级学校当教员至1944年末。

平 岗 公 司

王凤翥

伪满康德7年（1940年）那时我27岁，被日本人平岗滕平雇去，当了他们公司的会计。从康德7年始，到康德9年初，我在平岗公司干了两年多，对平岗公司的建立与发展，略知一、二。

1940年，日本关东军派现役军人平岗滕平（据说是一位营长）带领屯垦队。到清河牧场（现名）一带去垦荒。这个垦荒队就以平岗的姓氏，命名为平岗公司。

平岗公司的地址、范围，就是现在清河牧场之所在。它东起七棵树，西至稻子把，南与水平实业公司交界，北抵北清河。当时七棵树的东边，设有日本人田拜开的田拜公司；稻子把是朝鲜人利用乌力吉沐沦河的河水种稻的地方，地点就在现在扎鲁特旗红旗渔场的北边；水平实业公司是日本人设立的农场牧。整个平岗公司方圆三十多华里。这里是一片水草丰盛，土质肥沃，适于农牧林业发展的天然场地。当年这里长的蒲苇、蒿、草，足有一房多高。在大苇塘里，山鸡、野兔、狐狸、灰狼有的是。一到冬天，公司的移民们，可以打山鸡、野兔，有时还能打到狼和狐狸。

平岗公司共有7名职员，他们是：总经理平岗滕平；经理何文宝（奈曼旗人、蒙古族）；会计王凤翥（开鲁人、汉族）；伙夫陈师傅（开鲁县人、汉族）；3名马倌（兼车夫）其中有一个马倌叫包金山（蒙古族）、另两名，一个姓

王，一个姓李。

平岗滕平，当时40岁左右，粗通汉语。但每次出门他都带一名翻译。翻译姓刘，都叫他刘翻译，他原是开鲁街上开浆洗房的，因他粗通日语，所以被平岗聘任为翻译。平岗家居住在开鲁街内，有时骑马或坐胶车与翻译一同到公司来检查工作，有时到平岗还深入到各户去看看，了解租粮上交情况。

平岗公司的职员，每月都由公司发给薪水。经理何文宝的月薪是伪满洲国币50元，我的月薪是20元，马夫是10元。公司的移民各户不发工资，以种植、生产作为经济收入。

平岗公司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安置日、满退伍军人的。它属于实业开拓公司。一方面将日、满退伍军人，安置到公司里，另一方面将退伍军人安置在北部边防，以备战事。

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7日）爆发后，前线日军兵力不足，老头、少年尚须到前方打仗，哪里还有退伍军人呢？于是平岗公司就只好招收开鲁和奈曼等地的贫困移民了。

平岗公司开始建立，招来20多户人家，公司付给少量的安家费（只帮助盖上火房），吃粮第一年先借给，秋天打下新粮时付还。

移民和公司的关系是雇佣关系。移民按公司指定的地块，进行开垦。主要是扣（种）打瓜，其次种些粮食作物，以解决自己的用粮。

来这里从事农业的移民，秋收后按大、小犁杖向公司交纳粮食。一户移民，根据自己的力量确定，可拴几付犁杖，每付小犁杖（套两头牛的为小犁杖）一年交给公司两石粮（1000斤）；大犁杖（套四头牛的为大犁杖）一年给公司四石粮（2000斤）。如交纳瓜籽和现款，以粮食折价。

公司就是通过移民控的犁杖数，收取地租。后来，平岗公司发展到100多户，人口达四、五百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开拓公司了。

康德9年初（1942年），平岗滕平因病（已退伍）不能常到公司去了，公司失去了后盾。当时关东军开拓公司（简称东公司）势力强大，接收了平岗公司。于是平岗公司的职员及全部移民，统统归关东军开拓公司管辖了。

（高原 整理）

高文彬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王 欣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辽、吉、黑三省及科尔沁草原广大地区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但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东北各阶层人士及爱国军民，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纷纷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同年10月，具有爱国思想的将领高文彬组织起一支4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在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相连地带的科尔沁草原上，与日伪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31年10月到1932年末，据不完全统计，高文彬部共打死打伤日伪军2654人，缴获枪支700余支，各种火炮4门，子弹3万余发，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高文彬是原东北军军事训练委员会步兵组少将组长。

“九·一八”事变后，被张学良任命为辽北蒙边宣抚专员。第五军团成立后，兼任“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五军司令部总指挥，总部设在通辽，辖辽北蒙边义勇军共9个梯队、10个支队和3个独立团、1个卫生营。

一、“辽北蒙边”抗日宣抚公署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侵占我科尔沁草原广大地区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制造民族分裂，加紧推行其“满蒙政策”，以期实现他们“以华治华”的阴谋。于是，他们与甘珠尔扎布相勾结，密谋策划“蒙古独立”。“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六天，甘珠尔扎布便急匆匆地赶到沈阳，

目的是凭借日本人的帮助来组建军队。日方发给他步枪3000支，子弹20万发。当时，甘珠尔扎布自封为蒙古独立军司令，并聘请和田劲（后为松井清助）、盘井文雄和小泽一六八等日本人为顾问。

甘珠尔扎布返回通辽地区，为了组建军队，一面拉拢东科后旗（科左后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和东科中旗（科左中旗）韩舍旺，一面又与盘踞在通辽一带的土匪天红、高山等痞子取得联系，诱使他们入伙。因甘珠尔扎布无力与包善一、韩舍旺二人抗衡，被迫将“蒙古独立军”改名为“蒙古自治军”，委任包善一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委任韩舍旺为第二军司令；库伦旗的包殿卿（那钦双合尔）为联队长；甘珠尔扎布自封为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

1931年10月30日，日军铁甲车复至通辽，在该处留下官兵35名。同日，甘珠尔扎布亲自率领他的第三军（实际是土匪高山的队伍）500人，进攻通辽城。次日，包善一也率众500余人，侵袭通辽。当时守卫通辽城的东北军三旅与日伪军展开激战，日军又派6架飞机轰炸，炸死居民14人，致使通辽半数居民弃家逃难。

1931年10月，高文彬针对当时情况，赶至北平（北京）向张学良献策：宣抚包善一、韩舍旺、李海山、刘震玉四人，团结蒙汉两族人民共同抗日。张学良同意他的主张，并当即电邀李海山、刘震玉赴京与其会面。李、刘接电后，乃急驰到平，候授机宜，计议抗日。会面后，李、刘二人对张学良表示：愿联合包善一、韩舍旺一致行动，赤诚救国。张学良听罢，遂即决定组织“辽北蒙边宣抚专员公署”，指定高文彬为专员，并派王云汉、李树凯、张子振、王化南、高秀芳、成长奎、赵龙涛、舒崇武、白梦梅等二十余人协助工

作。委任李海山、刘震玉分别为辽北蒙边第一、二路骑兵司令，归专署指挥。同时，东北边防司令部长官公署，通令法库、康平、昌图、犁树、怀德、双山、辽源、彰武、通辽、开鲁等县全力协助。1931年10月下旬，高文彬率行署人员到达通辽，在通辽正式成立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办事处。

二、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区的成立

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成立后，高文彬专员分别派王子印（系包善一的亲戚）、张香阁（早于包相识）去说服包善一；同时派关翼青（与韩舍旺交往甚厚）去说服韩舍旺，并邀韩、包二人到距通辽五十里的黑坨子会面。包善一到来后，高文彬与其共商抗日救国之道，并转告包善一：张学良副总司令对此事“属望甚殷”。经交谈，包善一表示接受高文彬指挥，共同抗日。韩舍旺也来到黑坨子，高文彬和关翼青向韩讲清道理，动以利害，指明前途。最后，韩表示愿听行署改编和指挥。于是高文彬委任韩舍旺为辽北蒙边骑兵副总司令。韩舍旺被收编不久，又被日伪军所收买。据此，高专员亲自携同关翼青到韩的驻所莫力庙，与韩会面。经努力争取，韩表示：我想过来了，这是日本侵略军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对蒙古人决没有什么好处。即使蒙、汉两族有过阂墙之争，也应外御其侮。我是读书人，尚知大义，绝不做历史上的罪人，还要给蒙古人留下一点青名。至此，他拒绝了日伪的引诱，继续参加抗日活动。

李海山、刘震玉二人在北平接受任务后，当即星夜返回。李将所部蒙兵及旗属壮丁，与素有学识之士，组织起一支五千余人的抗日武装，编为中前后左右五路，每路设统领一员，由蒙古人中颇懂军事者充之；帮统一员，由政府或专员所派之人员充之。同年10月15日，组编完毕，继而投入了

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刘震玉自北平受任返回后，即整顿队伍除将原有蒙古骑兵1200名加以整顿外，还将精强蒙兵及久处蒙边枪马齐备的汉人，扩充入队伍，共有兵万余人。

1931年末，李海山、刘震玉、包善一、韩舍旺四部接受高文彬专员令：一面整训，一面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当时，在他们的影响下，科尔沁草原上蒙、汉各族人民的抗日活动亦不断涌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得悉包善一、韩舍旺二部被高文彬收编，遂即采取武力进攻。辽北蒙边宣抚行署针对此情况，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及今后工作安排，决定如下：

- 1、守城无益，令刘震玉、李海山两路部队向敌后转移，展开游击战争，至开鲁待机行动。

- 2、宣抚工作告一段落，今后工作方针和一切补给问题，由高文彬去北平请示，顺路到包、韩二处面授机宜。

- 3、行署迁至开鲁，由参谋长王云汉暂代行署指挥职务。

高文彬专员离开通辽后，赶至包善一的住所大蒿屯，指示包与韩舍旺今后如何行动，继而奔赴北平向张学良副总司令报告。正当高专员在京汇报时，突接辽北蒙边行署电文：我军战抬头营子、王家油坊两次对日作战获捷。张学良听后，甚为嘉许，遂作指示如下：

- 1、加强和张海鹏的联系，继续策动他反正，令他向黑龙江方向移动。

- 2、加强蒙汉团结，大量收容蒙汉武装。

- 3、伺机打击日寇，在敌后扰乱，保存我军实力。

张学良副总司令为了鼓励李、刘、韩、包四人的抗日行动，特向他们赠奖章一枚，托高文彬转交，并亲笔写信给张海鹏。

高文彬自北平返回后，1932年初，化装从洮南到双辽（郑家屯）视察，发动民众抗日。当时双辽地区的民团、商团和警察队，纷纷要求抗日。高文彬将该地的抗日武装组织起来，改编为三个独立支队，任于海川、田兴涛、张子斌为支队长，指示他们在本地区待命，待机收复双辽。

1932年5月，由失庆澜组织起了辽、吉、黑三省“民众后援会”，并在开鲁开始组建分会。当时，高文彬前往参加，分会委员长何清明传达了总会的命令：将辽、吉、黑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划为五个军区。原辽北蒙边高文彬部被改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区”，高文彬任司令。继而，高文彬传达张学良副总司令指示，为了对日寇展开游击战争，向敌战区推动抗日工作，决定改编包善一、韩舍旺、李海山、刘震玉所属各部，编为一、二、三、四个梯队，分别任命他们为梯队司令。

当时，在开鲁一带活动的热河军某营营长解玉忱，看到东北各地抗日之形势，亦参加了高文彬部，坚持抗日。

同时，在沈阳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刘海泉部，因其在新民地区活动的一个团被张海鹏缴械了300余支枪，刘托高文彬要回，因此，刘带全队六千余人，由沈阳赶到开鲁参加高部，被编为第六梯队，刘任司令。

1932年9月，高文彬部进攻康平，贾秉彝、刘叙五二人率所部投高，高将其编为七、八两个梯队，贾、刘任司令。高文彬攻占了康平县城，当时在康平县境内活动的薛羽鑫、李梅五、王聘儒、杨某、高荫堂、奚介珍、谭惠风等人率所部前来归附。

此外，还有三个独立团和一个卫队营，第一独立团团团长白梦梅；第二独立团团团长刘子恒，第三独立团团团长王子印；

卫队营营长张伯寒。

至此，科尔沁草原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三、义勇军的主要战绩

高文彬领导的“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是一支由蒙汉两族为主的武装抗日力量。他们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日伪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大小战役三、四十次，其中著名的战役有：

（一）萧河敖包、舍伯吐之战

1931年12月末，松井顾问亲自率领日伪军由通辽北边的萧河敖包、舍伯吐一带向通辽方面进犯。当时，驻守在通辽一带的辽北蒙边第一路骑兵司令员李海山闻讯后，立刻率全部人马前往狙击。1932年1月1日，在萧河敖包附近，与日、伪军展开四昼夜之激战。李海山亲自指挥，命其右路统领关荫周，后路统领王云升，由侧方夜袭，将日伪军迅速包围，左右夹攻。日伪军不支，即向舍伯吐溃退。

同月4日，据侦察员报告，逃入舍伯吐之敌，密谋筹划，以舍伯吐为根据地，再次进犯通辽。李海山闻讯后，火速与辽北蒙边二路骑兵司令刘震玉取得联系，于6日，两路骑兵同时向舍伯吐之敌发起进攻，李海山率本部由西面进攻，刘震玉率所部从东、北两面夹击，与日伪军血战三昼夜，占领了舍伯吐，日伪军顾问松井率所部逃往通辽城东的钱家店。

（二）收复余粮堡，袭击莫力庙

辽北蒙边第一、二路骑兵取得舍伯吐之战胜利后，高文彬即召集所属各部来通辽讨论进攻钱家店之具体计划。

当时，溃逃在钱家店之敌，在日军军官松井的指挥下，在坦克、铁甲车及飞机配合下，于1931年1月15日，大举进

犯通辽。是日早6时，高文彬亲自坐阵指挥所属各部反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为数甚多，通辽城不少无辜百姓惨遭流弹飞机轰炸而死。高专员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退至余粮堡，随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各路首领公推高文彬化装返北平，向政府请求军火服装及日后援助接济办法等事宜。

1月28日，日军羽山联队勾结莫力庙小佛爷白起，率4500余人，突袭余粮堡。驻防在余粮堡地区的李海山部，奋力反击，血战一昼夜，双方伤亡惨重。因弹药缺乏，在中路统领吴宝山掩护下，李海山所部安全转移到开鲁县境内的南树筒地带待命。

1932年2月13日，辽北蒙边骑兵司令李海山联合第二路司令刘震玉，研究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余粮堡、莫力庙等地。是月21日早5时许，一、二路汇合于余粮堡西五里之余龙湾角，遂分两路向目的地余粮堡进攻。激战一日，敌势不支，相继败溃，向莫力庙仓惶逃命。

是日晚7时，李海山、刘震玉商定实行“分路进攻”的方法。当即选出“敢死队”300余名乘胜追击。追至莫力庙，敢死队员们乘黑夜之际跳入莫力庙内，鸣枪为号，内外夹攻，敌渐不支，我方遂于次日（即17日）晨7时许将庙之西半部分占领。这时正逢驻防开鲁县境的热河陆军骑兵九旅崔兴武部前来援助，日伪军受三面夹攻，伤亡甚多。

（三）保卫开鲁城，攻战舍伯吐

从莫力庙失败后逃到舍伯吐之敌，不甘心失败，企图以武力通过道德营子、曹家营子经哈拉毛都（今开鲁小街基乡）迁回占领开鲁县城。1932年2月25日早8时许，我侦察人员报告：日伪军已开军事会议，议定由道德营子、曹家营子两路进攻开鲁；攻下开鲁向西以武力威胁内蒙古西四盟，

而热河全省亦不钱即得等情。高文彬部闻讯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堵击，以阻敌西进。次日，松井顾问率日伪军5000余人向开鲁方向进犯，辽北蒙边第二路骑兵司令刘震玉侦悉日寇行动后，即派员转报开鲁驻军九旅崔兴武部，要求其与之配合作战，痛剿入侵之敌。随即刘震玉率所部600余人潜伏在开鲁东的道德营子附近。27日凌晨8时许，当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内，刘震玉、李海山二部从东南两面发起突然袭击。驻军九旅崔兴武部在哈拉毛都、老哈河两岸参加了战斗。到2⁹日下午1时许，刘震玉、李海山二部官兵作战英勇，接连打胜仗，获得了道德营子、曹家营子、哈拉毛都等战斗之胜利。是役，俘虏了日军司令松井（并当场枪决），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开鲁保卫战胜利后，日伪军又向舍伯吐方向逃窜。李海山会同二路及九旅跟踪追击，至舍伯吐时，因有城墙，况且是日军大本营，所有周围土城，均设有炮台、战壕等工事，故未一鼓而进。义勇军为收复舍伯吐重镇，除命令所属各部分头堵击外，当即召集各路首领召开紧急会议，议定：第一路李海山司令率所部由该城西面进攻；第二路刘震玉司令率所部由城南及东南面进攻；驻军九旅崔兴武部由城北及东北面进攻。并由李海山部选出200名官兵，组成“敢死队”，由该部后路一营营长邱兴武为队长。官兵均持手枪于3月2日晚11点钟，趁夜黑，命“敢死队”向土城爬入，以鸣枪为号里外夹攻。夜12时半，城内忽然响起枪声，于是，隐蔽待命的三路大军向城内猛攻。盘踞在城内的日伪军，因毫无准备而伤亡惨重。日伪军见事不妙，弃城卸甲，由东门窜出，向通辽方向逃命。

（四）三战通辽，转战辽源

1932年1月17日，通辽被日军占领后，高文彬部转战于西辽河两岸，越战越强，特别是开鲁保卫战、舍伯吐攻坚战接连击退日军的进犯，声势日益壮大。1932年7月，高文彬专员由北平到达开鲁，经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与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协商，高文彬部被编为第五军区，高任司令，继而，后援会对所属各官兵予以慰劳，各路发给弹药和服装给养。并决定将原专员行署由通辽迁至余粮堡，后援会设在开鲁。同年8月，高文彬根据辽吉黑后援会的指示，决定收复通辽。8月30日，高文彬从李海山部、刘震玉部、谢玉忱部抽调一部分人员组成约有五个团兵力的大刀队，于31日早3点半钟发起总进攻。通辽城周围设置电网及工事，防守很严，但高文彬司令亲率800余人一路，从通辽城西门进行攻击，李海山率所属部由北门向南门进攻；刘震玉、谢玉忱率200余人从东门进攻。义勇军行动神速，使守城日军恐惧不安。激战到下午3时许，日军开始向城内退却。一部分退到城内炮楼固守，一路逃窜到四洮路知办马龙潭住宅中负隅顽抗。因宅院墙高，易守难攻。谢玉忱部大刀队200余人，在敌人枪林弹雨中搭起人梯翻墙而入。他们手持大刀，奋不顾身向敌人猛杀猛砍。激战到晚9时许，由于弹药不足，且日军又从钱家店调来伪军2000名，高司令下令撤回余粮堡。

9月5日，高文彬部转移到余粮堡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高司令带领三个团前往康平联络地方民团，以图大举反攻双辽。高文彬率所部赶到大蒿子（科左后旗金宝屯附近）与包善一、韩色旺等部会合，向康平推进。守在康平县内的日军，闻讯后便弃城而逃。高文彬部在抗日武装红枪会的支持下，收复了康平城，并收编了红枪会的薛司令、刘叙五、李梅五、高炳南等部，高文彬的队伍从此更加壮大。

高文彬率所部离开余粮堡后，同年10月1日，与李海山和刘震玉商定第二次攻取通辽。同月4日晨4时许，刘、李二部兵分二路进攻通辽，与日伪军血战一昼夜，至次日5时许将通辽小街基占领。到下午1时，日军调动钱家店伪军一千余名，在装甲车队的掩护下，由小街基后面向李海山刘震玉阵地猛攻多次。李、刘二部奋力抵抗，使日伪军终未突破。激战至晚9时许，刘震玉、李海山因子弹缺乏，遂宣令向通辽西官银号转移。

同月6日，开鲁后援会送子弹5万发，李海山、刘震玉当即兵分两路，并于是日晚10时又向盘踞通辽城之日军，发起第三次进攻。此时的通辽城，戒备森严，日军装甲车、坦克车已出动。于通辽城各巷口，以机枪扫射，空中飞机扔炸弹；刘、李二部以步枪、手榴弹攻击，激战至次日4时许，退出通辽城。此战未占领通辽，但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致使日伪军不敢轻易出通辽城门。

同月14日，高文彬率所部收复康平后，令李海山、刘震玉二部，开往康平集合待命，以便取法库、辽源等地。李、刘二部于同月19日到达康平，22日转攻法库。26日进攻辽源（郑家屯）。适时有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田兴涛、于海川刘子恒派人前来报信，“且情愿作为应，并作各巷口引导”。于是，高文彬等人同前来报信的人议定，次月早2时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1点时，日军由四洮路以铁甲车运送日伪军1000余名，又从四平运来日军五百余名前来援助，从南、北两面炮轰义勇军。下午2时，日军又出动飞机20余架，向义勇军阵地狂轰滥炸。战斗坚持到下午4时，因日军南北两面会集，使高文彬被迫传令各部转移至大蒿子。

高文彬部转移到大蒿子后，当即召开各部会议，决定次

日（即10月28日）早4时全部由大葛子回康平固守，以做永远根据地。

1933年1月22日，日军十六旅团长川原劲与彰武、法库康平的伪军，共约六、七千人，兵分三路，向康平大举进犯。23日早5时许，高文彬率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决战。激战三昼夜，至27日早7时，高文彬身先士卒，亲自指挥各路反攻，共击毙日伪军三百余名。战至五天五夜时，日军在飞机装甲车、坦克的掩护下，进入康平县城附近。此时，高文彬仍一面督队猛打；另一方面决定向开鲁转移。令白梦梅部为前锋，高率其余所部一面抵抗，一面转移。当高文彬转移到康平东南二里的杜家窝棚村时，被敌人包围，旋而被俘。高文彬被日军扣押后，其组织内部发生分化，除李海山、刘震玉、谢玉忱、贾秉彝、于海川、李梅五、谭惠风等部继续率所部，从事抗日活动外，其余各部有的自散，有的叛变。高文彬组织领导这次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在日伪联合镇压下而失败了，但他们举兵抗日这一行动给科尔沁草原人民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要参考书目：

《九·一八周年痛史》、《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伪满洲国史》、《文史资料选辑》（辽宁政协第二辑）、《新蒙古》（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史》、《内蒙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吉林党史资料》（85年4期）、《李守信自述》等。

周荣九与“八仙筒事件”

张 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疯狂向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三个月后，我国东北的锦绣河山便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1932年春，日本侵略军入侵内蒙古东部的奈曼旗，占领了当时绥东县公署所在地八仙筒镇。日本官吏佐佐木正太郎一伙，为了达到奴役奈曼人民的目的，强化所谓治安，对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在政治上搞“以华治华”，保留了原公署的体制，利用县长何序武、保安队长李春荣，残酷镇压蒙汉各族人民，到处抓思想犯、经济犯，到处搜索武器弹药，强迫人民学日文、服苦役。经济上，丈量土地，高额征收农民的税赋，吞噬人民的血汗。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贫苦农牧民和拥有大量土地、牲畜的地主、王公贵族，对日本侵略者都充满了无比的仇恨，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周荣九等人代表着奈曼旗蒙汉各族人民的意愿，拉开了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

周荣九，原名周荣，1894年生于奈曼旗青龙山镇河南杖子屯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十几岁开始，他就给地主扛活。从二十岁起，他赶着驴驮子跑阜新清河门，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在长期的浪迹生涯中，他染上了一些坏习气，曾跑

到承德地区当过几个月的土匪。他体壮力大，加之双手使枪，枪法过人，为众匪所折服，拥为司令。后来，他被东北军接纳，历任排长、连长。部队改编后，他任阜新县地方保安队大队长。日本侵占东北后，他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拒绝上级调他进关的命令，毅然离开东北军，弃甲还乡。

1933年夏，他被绥东县县长何序武请到县公署，任保安队大队长。在他担任大队长期间，目睹日本侵略军欺压百姓、残无人道的罪行，常常愤怒不平。日本侵略军觉察到他心怀不满，不肯忠诚效劳，就于1934年4月的一天，借宴请之机，缴了他的械。周荣见日本人居心叵测，为保全性命，连夜带上几个亲信，逃出县公署，再次回到老家。

回到家后，周荣抑郁寡欢，气愤难消，抗日情绪愈加强烈。一天，他正在南山放马，平房村张志新的孩子前来报信，说有三个日本人正在他家翻抄抢劫。他闻讯勃然大怒，立即持枪前往，直接到鄂尔吐板街。此时，三个日本人正在“益成兴”铺店行凶作恶。一个日本人发现周荣，见势不妙，拔腿逃窜，当即被周荣一枪击毙。另外两个日本人被周荣当场活捉，处死在河南杖子村南的山沟里。百姓听说此事，无不拍手称快。

此事之后，周荣的抗日救国之心更加坚定，决意要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不枉自己英雄一世。他期盼着时机的到来。

1935年5月的一天，奈曼旗南部山区大地主卜相臣的儿子卜昭鑫闹“老黄”（黄鼠狼），过后，在他家大门的门栓上发现了一张柬贴，上写：“宋太宗重新出世，投胎于你家大儿子和二儿子的身上，是当今的皇帝。为保一方太平，速调拨人马攻打东京。如违天意，两人性命难保”。落款写着

“黄石公”三个字。

卜昭鑫看毕，大吃一惊，慌忙把柬贴送给父亲看。卜相臣看后犹疑不决，心想：我家虽然是大户，但未必能出皇帝，如果真有这份福气，也必须有人保驾才行。他半信半疑地把一封回书投进炉子里烧了，以告天神。没过几天，卜家门上又出现了一张柬贴，上写：“有黄石公和‘三九’能够保朝，请不必多虑。”卜相臣知道黄石公是天上的神仙，但不知‘三九’为何许人也。正当他迷惑不解之时，只见周荣风尘仆仆闯进门来。卜相臣向周荣言及此事，不料周荣却说：

“我已知晓，‘三九’是三个人，有刘荣九、徐向九……”周荣说到此，停了停。卜相臣急切地问道：“那一‘九’呢？”周荣指着自已说：“那一‘九’不是别人，就是我。”

从此，周荣的名字便成了周荣九。

卜相臣听周荣九这么一说，心中的疑雾顿时消散了。他想：徐向九在热河当过副官，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确是保朝的文官；刘荣九、周荣九都是带兵打仗之人，现在有枪有人，确是保驾之武将。卜相臣遂信以为真。

周荣九见卜相臣不再怀疑，知其中计，心中暗喜，当即把此事张扬出去，很快就众所周知了。

周荣九打着保驾皇帝的旗号，拉起了抗日队伍。人们听说老卜家出了皇帝，要打日本鬼子，就纷纷响应，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仅几天的时间，队伍就发展到一百多人。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周荣九又与马老排取得了秘密联系。马老排原名马全宝，在王爷府任保安队长，是个私官两相很有势力的人物。日本入侵后，随着王府的垮台和保安队的解体，他也变得徒有虚名，出于民族仇恨，他对周荣九的举动非常支持，表示“对日本侵略军要狠狠地整，整他个你死我

活！”当即派自己的亲信部下小敖力布等带领七十多人马投奔周荣九。

在马老排的指点下，周荣九又联络活动在黑城子一带的裴玉卿、兰天林等人，公开打出了“抗日救国军”的旗号。他还规定，不许打骂百姓，不许调戏妇女，不许抢夺民财等项纪律，并做出了攻打八仙筒的战斗部署和向开鲁、通辽等地进军的计划。大计已定，周荣九便护拥着卜家的两个儿子，率领着“抗日救国军”向八仙筒进发。

1935年7月23日清晨，“抗日救国军”将八仙筒小镇团团围住。他们各有分工，部署严密，一声令下，枪声骤起，镇内爱国的蒙汉各族人民群众紧密配合“抗日救国军”，挖墙窟窿，切断电话线。八仙筒镇的多数伪军因受抗日救国思想的感召，放弃了还击，实际上只有那几个日军和极少数顽固不化的伪军负隅顽抗着。这样，外攻内应，“抗日救国军”仅用四个小时就攻克了八仙筒镇。打死了日本参事官山守荣治和指导官中根长一，活捉了罪大恶极的日本署官佐佐木正太郎、警长田金座和监务局长木村等八人；只有一个名叫须藤的日本人逃掉了。伪公署卫队和警察除被击毙和逃跑者而外，余下全部投降。

战斗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周荣九下令将活捉的三名日本人悬吊在十字街西南院，召开群众控诉大会。会后，把三名日本人拉到街外南沙坑枪毙。为了维护战后秩序，“抗日救国军”立即张贴安民告示：百姓不必惊慌，农民安心种田，店铺自管营业。一些乘机抢劫的歹徒，当即被“抗日救国军”处死。不到两天，“广升和”等商号都照常开业了。周荣九还下令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日军关押的全部无辜百姓。

战斗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草原各地。深受日军

残酷奴役和统治的蒙汉各族人民，大解心头之恨；奈曼邻县的日军闻风丧胆，如惊弓之鸟。

“抗日救国军”在八仙筒休整期间，队伍内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周荣九的部下信守原定纪律，安分守己，不抢不夺；而裴玉卿手下的一些人则掠夺民财，调戏妇女，肆意横行。居民对此十分不满，纷纷找周荣九申诉。周荣九向裴玉卿提出警告，终未奏效。一天，裴玉卿的部下双红和杨青山到东门外老百姓家翻箱倒柜，强奸妇女，被周荣九发现后，当即拉出去枪毙了。此事触怒了裴玉卿，使他和周荣九的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周荣九权衡利弊，放弃原攻打开鲁和通过的作战计划，把自己的队伍拉出了八仙筒，向南奔向黑山一带。

周荣九的队伍撤出八仙筒不久，日本侵略者又疯狂地反扑回来。八仙筒再度沦陷，奈曼蒙汉各族人民便饱受了日军的血腥镇压。在县公署任财务科长和副官的王宪中、王允中兄弟二人被怀疑为内应无辜被杀；王宪中的二叔王景和也被怀疑，闻讯后跑了。于是，哈沙巴村的一个与王景和同名者被抓，当即被杀害。在此期间被乱枪打伤、乱捕者甚多。这就是闻名满洲的“八仙筒事件”。

周荣九率领“抗日救国军”在黑山一带，以游击作战的方式，不断袭击日本侵略军，打击着日军的嚣张气焰。“抗日救国军”也随之不断壮大，最后达到1500多人。

1936年9月，周荣九把卜家的两个儿子安排好，率队向羊羔子店一带撤退，途中被日军围在一片高粱地里。日军动用了飞机、大炮向救国军疯狂轰炸、扫射。在敌人强大的火力面前，周荣九率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将士战死在高粱地里。

周荣九带领少部分人马左突右冲闯出了包围圈，准备奔乌鲁木齐山，途经向阳所时，被人发现告密。于是，化吉营子治安队长金宝山领着一伙人追到乌鲁木齐山，周荣九等人被包围。最后，由于弹尽粮绝，精疲力尽，周荣九自刎而死，时年42岁。从此，这支“抗日救国军”在奈曼大地永远消失了。

周荣九死后，日军割下他的首级，悬挂在鄂尔吐板街的树上，示众七天。当人们看到嘴里有几颗金牙的周荣九确实死了时，百姓心中都充满了悲愤，更加激起了奈曼蒙汉各族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科左中旗的抗日义勇军

赵道冷阿

我叫赵道冷阿，汉名赵连才，原在科左中旗温都尔王府二贝子爷舍勒旺珠尔手下当警卫。后经二贝子介绍，曾任吴大帅（即吴俊升）警卫团上尉连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除加紧对东北各地武装侵略外，又在哲盟科尔沁左翼中、后旗扶植成立内蒙古自治军。

1932年（大同元年）正月，我在架马吐挣脱蒙古自治军韩色旺部小喇嘛团长的绑架后，率四名警卫员到开鲁，经东北军张学良部下保安第九独立旅旅长崔兴武介绍，结识了热河李守信（此人后来降日）。当时在开鲁组建了左中反满抗日义勇军，我被委任第三团上校团副之职，正团长陈国清是我的表兄。全团五百余人，大部分都是从科左中旗招收来的蒙族人。我的胞兄茫沙，这时在北山（今扎鲁特旗境内）揭竿而起，率二百余人也加入了这支义军队伍，负责后勤供应工作。我们这支义军，人人臂戴黑字红袖标，口号是：“宁做站着鬼，不为亡国奴，救国救民义勇军”。除衣服是张学良部资助外，其余枪支弹药和马匹等均是自备，军需物资大部分都是向当地的牧（地）主索取。义军旗帜鲜明，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部队有简单而严格的规定：一、谁打死一个日本人，谁就官升一级，并另有奖赏（以首级为凭，活抓亦

可)。二、不准伤害中国人。义军以此宗旨，诏告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

正月下旬，我们这支义军骑兵队伍出开鲁，浩浩荡荡地向家乡科左中旗进发，从此拉开了向日寇与亲日派开战的序幕。正月25日，义军在舍伯吐西北的曹格营子一带，与蒙古自治军第二军韩舍旺部相遇，一场鏖战，配合友军活捉了临阵指挥的日本军官松井清助，首战告捷。接着，义军移师鲁北、高力板等地。农历8月中旬，进驻瞻榆县城。时值日寇继续北犯，各地治安极其混乱，农村牧区胡匪峰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义军纪律很严，人们听说是打日本人的队伍，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农牧民的热烈欢迎。义军长驱直入瞻榆县城之后，司令部设在城西南角一个姓张的家里。我率三团驻守城外，担任警戒任务。半夜时分，由于特务告密，从郑家屯偷偷起飞两架日本轰炸机。在地面电台指挥下，突然对准司令部狂轰滥炸，顿时，张家成为一片火海，张家一个小孩当场被炸死。

翌日凌晨，义军得到可靠情报，说开通镇已驻进了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为了阻遏日军北进，把日本人赶出开通，义军决定趁其尚未站稳脚跟的机会进攻开通。遂命我三团为先行，直向开通奔袭。在开通镇西三十里处的一个沙坨上，突然遭到降日的开通唐司令部队的阻击。唐部据守有利地形，用密集的火力封锁我三团前进的道路，几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战斗异常激烈。我连续派出二个骑兵营迂回夹击，奈于武器低劣，又是从开阔地发动进攻，虽双方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我方始终没能前行一步。看到眼前牺牲的兄弟，听到受伤兄弟的呻吟，我真急红了眼，发疯似地一跃而起，飞身上马，率所部三个骑兵营，在义军唯一的一门小炮和其它

火力掩护下，强行直捣敌人阵地，遂很快占领了对面200米远的无名高地。义军大部队随之风驰般地掩杀过去，迫使唐部扔下30多具尸体逃进开通镇。我义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正准备拿下开通镇时，忽然城里的日军接应了唐部溃军。敌人凭借着四面高厚的围墙，龟缩在坚固的碉堡和炮楼里，使大炮、水压机枪抵抗义军的进攻。义军几次攻城都未攻下，伤亡很大，不得不退了下來。当晚，召开军事会议。为了争取时间，在敌人增援前拿下开通，消灭城内日寇，决定速战速决。

翌日拂晓，义军兵分三路，从西、南、北三个方向组织进攻。战斗一打响，便十分激烈，人喊马嘶，枪炮声震天作响，整个开通镇陷入炮火纷飞的硝烟弥漫之中。尽管城中守敌顽固死守，日本人武器精良，又有唐部配合顽抗，然而镇池已岌岌可危。就在我团眼看就要冲入西镇门决口的关键时刻，不幸我的坐骑被炮弹炸死，我也负了轻伤。直至掌灯时分，在双方伤亡都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义军由于弹药缺乏，停止了进攻。当晚，派出快骑密令北山茫沙部带足子弹，万分火急赶来增援，以与日寇决一死战。

至第三天半夜三点许，日军大部队坐火车从郑家屯驰援而来，日本兵在空中飞机和陆地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立刻向我义军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一直持续翌日近晌午时分。义军援军未到，弹药严重缺乏，完全丧失了战局的主动权，伤亡十分惨重。我表哥三团团长陈国清阵亡，我右臂负伤、左腿中弹，士兵们用门板把我从战场上抬了下来。义军处于全军覆灭的危机之中。为了保存实力，义军被迫撤出阵地，退却到开通镇西北20里处的刘喇嘛窑。当时由于伤亡惨重，军心涣散，弹药无处补充，军需物资没有供给，三天后

决定义军至此解散了。

此后，有一小部分军士兵化整为零，仍活动在边昭、双岗、红星一带的铁路沿线上，破坏交通，炸毁桥梁，继续与日寇周旋。北山茫沙部，不断地给韩色旺以沉重的打击。诺门汗战争后，李守信降日投靠了蒙疆德王，韩色旺见大势已去，几欲走北山逃往外蒙，都被茫沙部阻击回来，使其外逃外蒙的阴谋未能得逞。日本侵略者对我们义军恨之入骨，直至康德4年（1937年），日本人唯恐这股力量东山再起，曾多次以重金悬赏稽拿这支义军连以上头目，到处张贴布告，派密探四处寻查，迫使我和其他活着的义军头目，多年一直离乡背井，避居西藏、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

这支活动在科尔沁草原上的反满抗日义勇军，名噪一时坚持八个月之久。它是同日寇进行武装斗争的自发性地方武装，因队伍内部成份复杂，组织不纯，行动盲目，缺乏策略与正确指导，又属孤军作战，武器粗劣，最终为日寇所败。但这种顽强而正义的反帝精神和抗暴斗志，以及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壮烈斗争，是可歌可泣的，并将为后人所铭记。

（李弘元 整理）

东大营新兵暴动

魏连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兴安南警备军进驻了通辽东的钱家店东大营，开始了对这一带的人民的政治统治和军事镇压，也掀开了日、伪在钱家店一带的罪恶历史。这里驻扎一个师，辖两个骑兵团，每个团都有四个连，其中三个骑兵连，一个机关枪连和迫击炮连；每个连又有三个排，每个排下属四个班；此外还有山炮连、汽车连、警卫连等三个直属连。师长是正珠尔扎布少将（甘珠尔扎布的第几）。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日本顾问，他控制这里的一切。

1936年，东大营又招收了一批新兵，组成了一个新兵连，这个连共有120人，被编成八个班，连长由日本人矢岛金城担任。矢岛金城对新兵十分苛刻，每天操练达八小时之久，同时对士兵还横加剥削、勒索。因此引起新兵们的强烈不满，在新兵中悄悄酝酿着一场暴动。

矢岛金城的勤务员小拉玛，天天起早贪黑为矢岛服务。早晨把他从家中接来，晚上还得把他送回家去，事事都得谨慎从事，弄不好还要挨训斥、受体罚。小拉玛3月20日下午下班后，很不情愿地照例把矢岛送回家，无意间发现矢岛开子弹库的钥匙，就偷偷地藏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匆匆忙忙回到了新兵连的驻地。他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王金海，又通过王金海找了平时最恨矢岛的新兵，五个人商计好对付日本兵的

办法，并拟定当晚11点就动手，还设计了起事时要走的路线。

吃过晚饭，小拉玛、王金海等人细心地观察了新兵连驻地的动静。他们看到连长的几个心腹——八个班长赌钱的赌钱，玩乐的玩乐，办私事的办私事，心中暗自叫好，定约等到熄灯号吹响以后，就开始行动。11点左右，小拉玛等5人悄悄地进入了子弹库，每人拿了一袋子子弹，每袋200发，身上枪支也都做了调换，上好子弹。尔后，他们又悄悄地回到了兵舍，按照他们已经掌握好的位置，分别打死了5个平时甘心情愿为日本人卖命的班长。枪声过后，全屋的士兵都被惊醒。王金海和小拉玛向新兵们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宣布了他们的行动打算，并向新兵们说：“愿意走的跟我们几个来！”于是50多名士兵站到了他们一边，并纷纷到弹药库背好了子弹，然后又到马厩备好马，砍开了大营东北角的铁丝网，逃出了这个虎狼窝。

日本司令官得知此情后十分恼火，大叫“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并派两个连的兵力围剿了一个半月，最后只抓住了王金海，在钱家店南边的靶场上把他枪毙了。

（郝桂林 整理）

马鸣鸾和他的《天书》

刘 琛 曹国卿

1944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灭亡的前夜，他们加紧了对东北人民的疯狂剥夺和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种种罪行激起了不甘屈辱的各民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马鸣鸾先生以“天书”的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曾在科尔沁草原以及东北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马鸣鸾，1891年出生在山东临邑县徐平镇小杨家庄一个回族家庭里。读过三年私塾，读书时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对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签定卖国条约极为愤恨。当时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邑，德国人设有“育英堂”，以慈善之名残害中国儿童。目睹外国“慈善家”的罪行，马鸣鸾心中燃起愤怒的火焰。他伙同几个同学，打了下乡来买儿童的“慈善家”。这下可闯了大祸。为了逃避官府的通缉捉拿，他背井离乡逃到黑龙江，为一家商船大户当搬运工，混饭谋生；后因忍受不了老板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又逃至本溪煤矿当矿工。一次，因埋葬工友和工头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打了工头，从此又丢了饭碗。最后逃到开鲁县双合兴镇福合泉村（今麦新镇双合兴村）落户，以教书为生。他常给学生讲授《四书》《五经》和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借以激发学生爱国图强、还我河山的民族精神。在课堂上，他拒绝用日语讲

授，汉奸官吏们说他思想赤化，学校于1943年被县教育股勒令遣散。那时他已年过半百失去劳动能力，从此过着饥寒交迫、朝不饱夕的穷苦生活。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深感愤怒，想起历代被压迫者多借用天意、神旨唤起民众，推翻反动统治者。于是，他用猜字法，编写了一本约5000字的《天书》，欲以此唤起人民消灭日本侵略者。时值1944年农历4月18日庙会前夕，他将此书用黄布包好，投在村头庙里。书中指出《天书》到民间乃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又云：“谁看书之后要照抄一份送出去，否则天意难容”。就这样《天书》在人民中广为传播。

马鸣鸾先生的《天书》是一部反满抗日的小册子，用猜字、暗笔、会意等方法编成，晦涩难懂，故称之《天书》。书的开头四句是：“一人扛横杆，衰字表不全，时刻化去寺，木字一中穿”。解曰：“天亡日本”又曰：“甲乙岛洋水边眠，魁星抛斗压中原，丝色米量衰口大，千门万户串心连”。解曰：“东洋鬼来中国有绝粮断衣之患”。书中还对日本抓劳工、要国兵、勤劳奉仕、出荷粮等，皆用猜字法逐一予以揭露抨击咒骂。书的结尾最后四句是：“十八二人悬，日上三人盘，更边一人站，女戴紫金冠”。解曰：“来春便安”（指1945年）。他断言日本侵略者快完蛋了。书尾署名：“山东冯二去”。解曰：“山东马”（因马原籍是山东人）。这本《天书》在当地传开，群众背地纷纷议论，出天书了，日本人快完蛋了。不久《天书》传到开鲁双合兴镇警察署肖恩警尉手中，他如获至宝，就送交县警务科。日本人得到这本《天书》，解有“天亡日本”之言，大发雷霆下令追查到马鸣鸾名下。他并没有隐讳挺身承认，警察官当即把马鸣鸾先生五花大绑逮捕投入了监狱。日本警官大井审理了

他。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答：“我知道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可惜我没有见过”。问：“这《天书》是哪个人叫你写的？”答：“钟馗，有个打鬼的法师，哪有鬼都打，一个不留，都打下地狱……。没等说完，日本警官大井暴跳如雷，只骂“巴嘎”顺手拿起茶杯照马鸣鸾打去。马鸣鸾怒火涌上心头随手抄起身旁的炉盖子，照大井打去。大井一闪身，把身后的穿衣镜打得粉碎。马鸣鸾先生在敌人法庭上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回击了敌人，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祖国光复了，开鲁来了苏联红军和八路军，人民掌握了政权。囚禁一年零三个月的反满抗日爱国人士马鸣鸾先生，得到了自由，幸福地与家人团聚了。当年秋，党安排马鸣鸾到富通镇学校任校长。他边教书边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师生排练演出革命戏剧，亲自编演了《土地还家》《参军光荣》等剧目，密切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推动生产的发展，深受群众欢迎。

达王府四校的一起学生罢课斗争

李景唐

1937年秋，在科左中旗达王府第四校爆发了一起轰动全旗的学生罢课事件。这次罢课，震惊了旗警务科、教育科，也震惊了伪满政府的特务机关。对日伪统治者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在旗学运史上，堪称光辉的一页，一直为人民所称颂。

1936年前，科左中旗达王府第四校校长张扎木苏（即特木尔巴根）在任职期间，爱护体贴学生，经常通过修身课等形式，给学生讲述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事迹，以此激发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并废除了教员对学生进行体罚的制度。他爱护学生如子弟，经常深入宿舍照看学生，还组织学生开讲演会，通过讲故事、说笑话来培养学生的讲演能力。在生活上，他主张由学生代表参加伙食管理。因此，学生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感情非常深厚。

张校长的这些表现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和关注。1936年3月的一天，日本特务机关来人把张校长带走，后来免去其校长职务。旗教育股又给四校派了一名校长，此人叫邵巴图（汉名邵醒悟）对待学生极其苛刻，不但停办了讲演会，恢复了体罚制度，还以清仓查库为由，查封了品种粮，致使学生伙食明显下降。对此，学生对邵校长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1937年5、6月间，在通辽召开了一次旗县级运动会。四校选拔了3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按规定每个运动员每天要有三角钱伙食补助，可邵校长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负担。这样，一些家庭较富裕的学生尚可对付，而家庭生活困难的就难以维持。于是，运动员朱塔兴阿找到校长邵巴图，要求按规定发给运动员应得的伙食补助费。争执之下，邵校长不但不给，还把朱塔兴阿训斥一顿。没办法，朱塔兴阿只好向同学们借钱维持生活。在运动会结束回校那天早晨，邵巴图没供学生吃饭，说让学生自己买东西垫补点，等到三家子打间时再好好吃一顿。可是中午到三家子时，只给学生吃了一顿波菜疙瘩面汤。对此，运动员们气愤已极，回到学校朱塔兴阿再次找邵校长要求补发伙食补助费，而邵巴图不但不给，反而耍赖说：“你们在运动会上都落后了，还有脸来要补助费，下次运动会再说吧！”。就这样把朱塔兴阿撵了出来。

与此同时，邵巴图为了下一次运动会能够争到名次，调走原体育教员，从通辽调来一个外号叫胶皮人的长跑运动员徐洪勤当体育教员。徐洪勤对学生十分狠毒，经常用教鞭毒打学生，使学生们吃尽了苦头。

邵巴图克扣学生伙食补助费的行为和徐洪勤对学生的残暴体罚，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同学们决意展开一场斗争，于是一场筹划罢课斗争开始了。首先由张国栋、朱塔兴阿、色音巴雅尔、贺喜格都楞、扎木舍冷、赵德山等13名同学，以桃园结义的形式拜了把兄弟，形成了领导核心。在一个星期六，同学们聚集在达王府的树林子里，由张国栋主持开会，研究布署了斗争策略。会议决定先给邵巴图写个蒙文“独贵龙”（组）书，提出“要张扎木苏校长不要邵巴图校长，调

剂好全校学生伙食，补发伙食费；废除体罚制度，不要体育教员徐洪勤”等四项条件。对此，邵巴图不但不给答复，还暗访带头的学生，准备下毒手，这样更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愤慨。当时，因为正要放暑假，所以筹划罢课的斗争只好停下来。

同年秋开学后的第一天晚上，参加“独贵龙”书签名的30多名学生再次集会，详细研究了罢课事宜，同时对罢课时间和每个人的任务都做了具体部署。第二天清早一场轰动全旗的罢课斗争开始了。全校120名学生统统打起行李，聚在一个大屋里，坐在炕上，气氛十分严肃。当邵校长得知学生们没去上课时，便火冒三丈。一边让各班任到宿舍去找，一边亲自来到宿舍。当时一名叫吴宝玉的同学一见邵校长走进宿舍就大喊一声：“你给我滚出去！”邵巴图见此情景，害怕吃亏，就溜出了宿舍去警察署找来了巡官王梦梅，并带了四个警察闯进学生宿舍。王梦梅一进屋就命令警察捆绑带头罢课的朱塔兴阿。警察刚要动手，阿拉坦仓同学便大声喝道：“为什么单绑他一人，绑就绑我们大家吧！”于是全体同学蜂拥而上，护住了朱塔兴阿，包围了警察。这时，邵巴图还以为有警察撑腰，便狐假虎威地喊叫：“干什么？你们要造反哪！”随即举手打了阿拉坦仓同学。同学们见邵巴图动手打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揪住要打。一个警察见势不妙，便偷偷拉了拉王梦梅和邵巴图，悄悄溜走了。回到警察署后，他们密谋策划，决定开除朱塔兴阿、吴宝玉、查干巴拉、扎木舍冷以及邵巴图认为罢课斗争的幕后策划者贺喜格都楞，并在校内贴出布告，勒令这五名学生立即离开学校。于是朱塔兴阿等背起行李，按照原来的计划去找当时办校的董事会董事长仁钦宁卜和旗长包舍旺。当其他同学也背起行

李要与朱塔兴阿等一起走时，均被徐洪勤和另一名青年教员拦在校门用藤鞭打了回去。

五名学生的出走，惊动了旗警务科和教育股。于是命令王梦梅立即采取措施，稳住学生，平息事态。同时对出走的五名同学也采取了拦截劝阻等手段，以平事端。所以，五名同学刚接近舍伯吐时，早有警察等在那里，又是接行李，又是问寒暖，软磨硬缠地把他们留在了舍伯吐派出所，还请来了学生的家长，让他们说服学生回校复课。

达王府四校学生的罢课，表面上看来是学生反对邵巴图校长的贪污和克扣学生伙食费的斗争，其实质是学生反对奴化统治，要求民主的爱国斗争。这起学生罢课斗争，引起当时统治科左中旗的日本参事官以及其他日本人的特别注目，认为对小学生来说能有如此举动，既有斗争的计划，又有目的要求，非同一般。如果对这些蒙古小学生实行武力镇压，无有治罪之名；说幕后有人操纵策划，又找不出其人。确系学生的自发行动，难加罪名。倘若强行镇压，势必引起更大的骚乱。因此，日本统治者在学生复课后，令伪旗公署以不同形式先后调走了校长邵巴图和体育教员徐洪勤，撤消了巡官王梦梅的职务。

达王府四校学生的罢课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却引起了日本统治者对爱护学生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民主思想的校长张扎木苏的监视。他于1941年6月被日寇逮捕入狱。

蒙旗师范学生参加 东蒙自治运动的回忆片断

白音布鲁格

1931年，在科尔沁草原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东蒙自治运动。我作为一名沈阳东北蒙旗师范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一运动。虽然这场自治运动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最终又被日本侵略者所扼杀，但是，这毕竟是一段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作为一名参加者，我应该将自己所耳闻目睹的事实忆述出来为历史工作者编史写志提供一点参证。

1930年，我入沈阳东北蒙旗师范讲四班学习。

沈阳东北蒙旗师范成立于1929年秋。这所学校分为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高级师范分文科、理科两个班；初级师范共有讲一、讲二、讲三、讲四、讲五等五个班。讲一班于1931年竟一年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时，这所学校被迫关闭。

1931年9月18日早晨，沈阳城内突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差不多持续了整整一天。据说，这是日本兵从沈阳车站向东北军北大营开炮，东北军也没还击就撤走了。接着，沈阳东北蒙旗师范就关闭了。家在附近的学生，都离校回家了，家在远处的学生只好暂时留在学校。我家在哲盟科左中旗，也一时回不去。

这时，有的同学问我：“哈丰阿要搞自治了，你知道

吗？”我说不知道。随后，我就去问哈丰阿，是否有这样的事。

哈丰阿对我说：“我们是要搞东蒙自治运动了。但考虑到你的年龄小，就没有告诉你，你也就不必去了。”

我当时辩解说：“我是蒙古人，蒙古民族血肉相连，搞东蒙自治运动应该有我一份。我愿为蒙古人流血牺牲。”

哈丰阿望着我，沉默了许久，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他还对我说：“这次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国际上一定会干涉的，也许苏联就会出兵，那么，对我们的东盟自治运动就会有利了。”

几天之后，我们36个同学跟随哈丰阿途经郑家屯，来到了科左后旗包善一家。不久，听说日本人为东蒙自治运动提供3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让我们这些学生到三江口取。包善一动用了十余辆大车，由学生搬运，整整拉了五、六天。然后，我们就开始列队和射击的训练。

就在这时，从日本归来的阿思根、乌云达赉、韩凤林、德古来等八个人，也来到了包善一家。韩凤林德古来呆了几天又走了。这样，我们学生队共有了42人。

就在我们练兵期间，哈丰阿、阿思根与包善一、韩舍旺、甘珠尔扎布等人开会。听说他们在开会时已经决定组建了三个军。包善一任第一军司令，以科左后旗为基地组建部队；韩舍旺任第二军司令，以科左中旗为基地组建部队；甘珠尔扎布任第三军司令，所组建的部队主要依靠招收散兵，主要是与嘎达梅林一起进行抗丈斗争的高山、天龙的一部分人马。后来，从库伦来的那钦双合尔团和我们学生队也加入了第三军。第三军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通辽地区。东蒙自治军自此宣告成立。它的主要目的是，以通辽为中心，向西打通开鲁、天山、林

西、经棚的道路，同日军进行游击作战，实行东蒙自治。

第三军参谋长萨嘎拉扎布到大林呆了十几天之后，在十月的一天，他动员我们学生队攻打通辽。但怎么个打法，都有哪些部队参加，我却不得而知。于是，我们把马、车留在大林，坐上火车，便开始向通辽进发。这时，火车上还有几个日本人（据说是日本记者）也同我们一道攻打通辽。几小时之后，火车停在了通辽东南的沙坨旁。我们下车后，就开始向通辽前进。这时，高山部队也开始进攻了。我们来到通辽北市场口时同学们说：“咱们去占领车站罢。”

刚刚来到车站，我们就发现驻扎在这里的军队约一个连的兵力正在炮击车站，车站前后，站房顶端都遭到了迫击炮的轰炸。

于是，我们学生队便乱作一团。几个日本记者带头向东逃去，同学们也跟着跑。当时我在车站北门口处站岗，在最后无人的情况下，也跟着跑了出来。与此同时，从城里退出来的高山部队的骑兵也向东撤去。

我们撤到原来下火车的地点时，甘珠尔扎布等一群人也站在那儿，象是指挥部队，可是这支部队并没有什么战斗力，没重新进攻，就和我们学生队一起乘火车回到大林站。清点人数时，发现我们学生队少了高庆春、包明顺和一个姓秦的同学（后听说姓秦的同学从车站向南跑时，被国民党部队的炮弹击毙）。

我们回到大林后的第二天，有一股土匪围攻大林，我们一枪未还击就撤出了大林。这时，学生队有人议论说，我们攻打通辽没有自治军第一、二军配合，只是第三军高山、天红的部队参加，几个日本人带领学生队攻打通辽，打了败仗日本人就不见了，这大概是日本人为了制造国际舆论而蓄意

这样干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同学们谁也没弄清楚。

于11月底，我们来到了白音塔拉召庙，部队进行休整。这时，学生队的高庆春、包明顺归队，但有一部分同学却放下武器回家了，其中有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的殷殿都、云林、高万，以及内蒙古东部的官布、海宗耀等。这样，学生队就仅剩下了二十余人。就在这时，特木尔巴根、朋斯克来到了学生队，并给我们讲述了许多诸如蒙古民族要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为解放全内蒙古而奋斗的道理。当时，正值嘎达梅林抗丈斗争刚刚被军阀李守信平息的时期，通过特木尔巴根和朋斯克的启发和宣传，使我们加深了对民族革命的理解，也坚定了反抗外强，振兴民族的信心。

1931年12月，我们学生队与特木尔巴根、朋斯克来到舍伯吐，开始参与了以丰哈阿为首，特木尔巴根、朋斯克、阿思根等组织的东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活动，大力宣传内蒙古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此期间，我们除了和李守信打过几仗以外，基本上没有离开舍伯吐。

1932年4月，由特木尔巴根介绍，我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我的党证号是19号。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标志是一个象征着团结的符号。这就是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到内蒙古东部来领导自治运动时，于1932年3月开始组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在强化它们的侵略政策，建立了指导部（顾问部），搞掉了一些拒绝接受他们侵略政策的人，成立了南省、北省、东省。甘珠尔扎布首当南省警察厅长，萨嘎拉扎布也离开了第三军。

1932年夏，日本侵略者在通辽、舍伯吐以西地区施放了

病菌，死人不计其数，尤其是舍伯吐以西一带地区，人几乎整村整村地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在的自治军就无法活动。到了秋天，日本人盘井领导的顾问部，为了加强控制自治军，在钱家店组建了兴安南省警备军。曾大喊大叫要攻打日本侵略者的包善一，却当上了科左后旗旗长，并派他的三儿子到钱家店组建了兴安南省警备军第一联队，担任了联队长。第三军的高山团长在甘珠尔扎布的指示下，在钱家店组建了第三联队，担任了第三联队队长。第二军除滕海山部被改编为公安部队外，其他均分散组成了警察机关，维持社会治安。唯独由学生队组建起来的第七团和那钦双合尔的二团，虽然已被日本人决定派驻钱家店，组建兴安南省警备军第二联队，因怀有东蒙自治的愿望迟迟没进钱家店。

1932年秋，东蒙自治联合会确定那钦双合尔团和学生队组建的第七团进驻钱家店，编为兴安南省警备军第二联队，那钦双合尔任联队长，并把发展起来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派入伪军、伪政权和社会中，宣传群众，团结群众，待时机成熟之后，立即掀起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此之前，也曾研究过把学生队的学生送往蒙古深造的问题。最后考虑到要让学生到斗争实践中去锻炼自己，故放弃了派学生去蒙古的打算。

然而，不久轰轰烈烈的东蒙自治运动，就被日本侵略者和民族内部的败类，诱骗、扼杀、分散和瓦解而告终。沈阳东北蒙旗师范的学生，随着这一运动的结束而分散。但是，这场运动却播下了革命火种，曾参与东蒙自治运动的许多人（尤其是东北蒙旗师范的学生），后来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团结群众，宣传群众，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忆开鲁“二高”

高原 曹国卿

伪满洲国兴安西省在开鲁曾建立过两所国民高等学校：一所是兴安西省立第一国民高等学校，俗称“一高”；另一所是兴安西省立第二国民高等学校，俗称“二高”。一高、二高的学制均为四年。

笔者分别是二高的一、五两届学生，忆当年所见所闻，以供读者了解日伪时期的教育状况。

一

开鲁二高，建于1939年4月（第一届学生1939年4月22日入学）到1945年“八·一五”停办，经历了六年零四个月。

建校初，二高只有一个班，教职员只有八、九人，没有校舍，临时借用育英国民优级学校的教室。1940年，二高迁至八卦街。1941年，在开鲁县城东关路南一公里处建一处校舍，占地约二百亩。1942年，学校发展到四个班，学生达二百余人，来自兴安西省的各个旗县和兴安南省的部分旗县。教职工有三十多人。

二高学生全部住宿，宿舍先是在八卦街，后迁到东门里路南的四合大院，又迁到东关新校舍。

二高历经六年零四个月，曾有五任校长，其中日本人三名，中国人两名。日本人校长是：加来喜代男、守谷民男

（代理校长）和指宿民雄；中国人校长是齐光策和李雨田。当时的开鲁县长富查谦也曾兼任过二高的校长，但实际上是徒有其名。教职工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中国人教职工是：赵家谟、房显荣、张春风、刘兆周、张维藩、富继光、付种禄、杨润田、孟庆祯、任启泰、刁永明、姜轩春和一名姓张的老师；事务人员有：李益谦、李恩福、叶文华、李森连。此外，还有一名牧羊老人、一名工友和四名伙夫。

日本人老师除三位校长外，还有古川广、田矢芳三、安藤、斋藤章。军事教官有阿民布和（蒙古族）、有川（日本人）、布仁巴雅尔（蒙古族）。

二

二高的教育宗旨是：培养既懂粗浅的生产技能，而又不反抗日伪统治的奴仆。从第三届开始，学生入学首先过两关：一是长跑150米。和日语口试，二是学科笔试。这两关合格后，张榜录取。每年参加考试的人有500名左右，经过长跑和日语口试后，就有200人落选，余下300百人参加学科笔试，以六比一择优录取50名，建立一个新的班级。

二高的教学内容从第三届学生开始，重点是“国民道德”、军事和日语课。“国民道德”课多数由日人教官讲授，有些由日人校长亲自讲授，其内容是宣扬“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忠于天皇陛下”、“忠于皇帝陛下”、“信奉天照大神”、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等等。为了使 学生接受日本的奴化思想，学校安排学生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日语；同时，学生在校期间一律用日语会话。除此之外，还设有专业课《农业讯论》、《园艺作物》、《林业讯论》、《畜产讯论》等；基础课有数学、满语（汉语）、物

理、化学、动物、植物、地理、历史（日本史）等。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统治，日本人采取“以华治华”的手段，大搞阶级绝对服从。他们把军国主义的那套阶级服从搬进学校。规定老师可以打学生，上级学生可以打下级学生；还利用三、四年级学生训练一、二年级学生，三、四年级学生对一、二年级学生可以罚站、罚跑步。下级学生遇到上级学生必须立正、举手敬礼，待上级学生走后方可行走。

学生的生活完全是军事化、奴隶制。每天起床后，即跑步，饭前要祈祷，祈祷后方能就餐；睡觉前要点名，向舍务老师请示后，才能就寝。

“朝会”（早操或间操）要向东方遥拜（给日本天皇行最高敬礼）、向帝宫遥拜（给溥仪皇帝行最高敬礼）。每次朝会都要背诵“国民训”。开学典礼或重大节日时还要读诏书，借以灌输奴化思想。每星期一朝会时，还要进行军事检阅，借以灌输武士道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日本一方面大量征集国兵，一方面责成学生“勤劳奉仕”（就是当劳工）。1945年春、夏之季，学校命令一、二、三年级学生修开通公路（通辽到开鲁），将四年级学生经过简单训练，送到鲁北和白狼沟去架设电话线，还组织一些日语好的学生到防空监视哨所值班。1945年7月，又派三年级全班50名学生，到河南大段（奈曼旗北部）去给日本关东军割马饲草。

三

日伪在二高大肆推行“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的侵略政策，引起了中国教师和学生的强烈不满。因此，反抗日伪的事件在二高时有发生。

群起而攻守谷民男

守谷民男曾代理过二高的校长，他以日本太上皇自居，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他贪占学生的伙食费和补助费等，致使学生的伙食标准大降。这时，房显荣替守谷民男出了一个主意，让学生到苗圃做工，用酬金来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当时，全校除一个班级留在校田劳动外，其余全部被驱赶到苗圃做工。一连几天，学生为苗圃栽树累弯了腰，伙食却没得到丝毫的改善。还有一次，守谷民男从外地买来衣物，转卖给学生，从中渔利。

守谷民男的所做所为以及长期不上课而严重地影响着学生的正常学习和升学，终于引起了学生的愤怒反抗。首先，三年级学生刘汉良和四年级学生桑文珠私下写了一封匿名信，寄给兴安西省省次长，控告了守谷民男的罪行。随后，又有部分学生联名上书省次长，强烈要求停止在苗圃做工，立即复课。

省次长收到学生的联名信后，把守谷民男训斥了一顿，停止了学生的苦役。

守谷民男对上书告状的学生怀恨在心，房显荣也为虎作伥。于是他们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刘汉良、桑文珠和王海春等学生，并以反抗校长犯上的罪名，把刘汉良等三名学生开除了学籍。

赵家谟痛打古川广

1942年春，赵家谟从吉林高师体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二高教体育。因家中有事，他晚到校二十多天。到校后，见过校长，说明迟到的情况后就到办公室去见全体教师。古川广见赵家谟没有先向他报告迟到的原因，就极为不满地训斥说：“你为什么开学这么多天才来？”赵家谟说：“我已经

写信请假了。”古川广又说：“写信请假就行了吗？”赵家谟感到很气愤，说：“你有什么权利管教我？你是教导，我是教谕，我比你大一级，你就依仗你是日本人，我不理你这个日本小个子……”古川广听后，恼羞成怒地骂赵家谟“叭嘎！”（叭嘎，即混帐、混蛋之意）。赵家谟回手就给古川广一个大嘴巴。古川广也向赵家谟撕打过来。赵家谟身强力壮，小个子古川广哪里是他的对手？赵家谟把古川广按倒在地，痛打了一顿。

古川广见势不妙，挣脱出来要去省公署告状。赵家谟心思：反正我也把你打了，就打你个痛快。然后，他就追了出去。古川广见势不妙，逃进学生的宿舍里藏了起来。

那个年月，中国人打日本人就是反满抗日罪，就要被判处死刑。校长齐光策是一个机灵而明智的人，当场指责赵家谟年轻冒失，不该打人，随后摆了一桌酒席，使此事不了了之。

学生打伪警察

日伪时期，在开鲁县城的警察，经常耀武扬威，欺压百姓。他们上街买柴禾不给钱；借防疫之机无理刁难百姓，甚至发横财。二高学生路见不平，几次与警察发生争执，日久天长，与警察之间的矛盾便逐渐激化。

1941年春，二高学生在西门里与警察相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学生人多势众，把两个警察打得鼻青脸肿。警刀被打弯，警帽被打进了阴沟里。

10天之后，二高学生列队去东门外的校舍上课，当途经东门里警察署门前时，署长和几个警察正站在门前。突然，一个警察指着学生队伍大声喊：“就是他！”随着喊声，一群警察窜了上来，动手抓人。学生临危不惧，蜂拥而上。学生人多，与警察对峙起来。老奸巨猾的警察署长陈天富见势

不妙，撒腿就跑，还威胁学生说：“取枪去！”学生们听后，嘲笑地说：“你回家取那根大烟枪吧！”

被打伤的几个警察，连滚带爬地逃回了警察署。

二高学生打警察事件，震惊全省。于是，日本宪兵队和警察联合对学生进行了大搜查，没收了学生的日记本和文艺书籍若干册，还有一部分学生遭到省公署警务厅的传讯。

静 坐 示 威

1945年春，日伪当局把二高的四年级学生派到鲁北和白狼沟“勤劳奉仕”之后，又让一、二、三年级150多名学生“勤劳奉仕”——抢修开通公路西段。抢修开通公路的劳役十分繁重，学生每天却只能吃上三顿小米稀粥，每顿一中碗，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愤慨。

一天，狂风大作，黄沙弥漫，对面不见人，但监工仍不准停工。150多名学生愤怒已极，不约而同地坐在公路上。不顾监工的吆喝，静坐示威，致使监工被迫下令收工。

尾 声

1945年8月初，苏联飞机在开鲁上空撒下传单，日本侵略军惶惶如丧家之犬，慌忙撤退，随即苏联红军部队开过来，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年末，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开鲁。

1946年，新的开鲁中学诞生了。原开鲁二高的大部分学生，成为开鲁中学的第一批学生，一部分高年级生学转入华北联大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开鲁二高的绝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积极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伪满的“勤劳奉仕”

李 万 贵

一、建立伪满勤劳奉仕队的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对中国人民长期法西斯统治，除在我的家乡扎鲁特旗范围内搞了一整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机构外，还于1934年在农村搞小村并大村，在牧区也将散居的牧民强行集中建起了新村。又于1939年进行了国势调查、建立良民簿、颁发良民手册、抓壮丁、派出荷粮、抓劳工等活动。当时的勤劳奉仕队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它和其他劳工的不同点是穿军装、学日语，是经过比较严格的体检和基础训练的半军事化的劳工队。

二、勤劳奉仕队的组建

勤劳奉仕队的组建，由日本人主管，有一整套办法。

首先，在全旗范围内凡年龄在25岁至45岁的男性中壮年统编为自卫团，25岁以下的统编为青年团。旗里还专门设立了训练机构（地点在南大营，现扎鲁特旗食品公司院内）。他们搞的几次轮训的重点是自卫团和青年团中的骨干分子，然后以村为单位对青年团和自卫队成员进行训练。

其次，自1941年在我旗共征三期团兵和勤劳奉仕队员，其方法是按户籍，凡20岁男性青年不分身体状况好坏（包括

癩、拐、瞎、聋、哑、瘫痪、精神分裂)一律到旗所在地进行体检,由日本人统一掌握,合格者第二年应征入伍,不合格者统编为勤劳奉仕队,规定每人无代价服役三年。当时能够检查上国兵的没有几个,所以多数人都成为勤劳奉仕队员。

勤劳奉仕队的机构设置,是按当地满洲国的统一规定,根据每个旗县的大小,分别设立大队、中队、小队、分队。大队辖三个中队,中队辖三个小队,小队辖三个分队。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至三人;中队设中队长一人,中队副一二至人,书记(秘书)三人,卫生长一至二人,卫生员一至三人;小队设小队长一人;分队设分队长一人。按上述规定,扎鲁特旗勤劳奉仕队于1943年春季组建,当时有一个中队,两个小队。

中队长:巴雅尔忙来(解放后曾任巨流河牧场场长,已故)

中队副:陈拉西(曾在伪和会任职,解放初已故)

卫生长:天仓(解放后曾任鲁北镇医院院长,已故)

以上三人当时属国家指派。

第一小队长:图门扎拉根(牧民)

第二小队长:朱永智(解放后任香山公社医院院长,已故)

1944年总人数增加到180人,分为一个中队、三个小队九个分队。

中队长:巴雅尔忙来

中队副:玛尼扎布(解放后扎旗林业局局长,现离休)

第一小队长:布和特木尔(扎旗忙哈村牧民)

第二小队长:朱永智

第三小队长:王清玉(解放后曾任巨力河公社保安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已离休)

书记：郭洪祥（巴彦他拉苏木农民）

岳占清（联合屯村农民）

沙格日嘎（解放后曾任扎旗政府秘书，已故）

卫生员：李万贵（即本文作者，曾任扎旗政协副主席，现已离休）

色布格扎布（解放初当国民党兵，现下落不明）

分队长：苏勒特木（解放后曾任扎旗乌兰哈达公社书记，已离休）

何鹏程（解放后曾任扎旗糖酒业公司干部，已故）

杨许林（解放后曾任义合林场书记，现已离休）

三、我在勤劳奉仕队的遭遇

1943年4月，我们扎鲁特旗勤劳奉仕队120名队员，分为两个小队，6个分队，在日本人塔泽（教官）的带领下，奉命从鲁北徒步出发，赴乌力吉木仁（梅林庙）修建公路至查布嘎吐（60华里），时间为3个月。1944年5月初，在巴雅尔忙来、玛尼扎布、田仓带领下，徒步由鲁北经由开鲁到通辽，在通辽乘火车（闷罐）经过三天时间到达阿尔山，在满洲第785部队服役6个月，10月份返回扎旗。

1、在勤奉队服役期间，每天劳动强度大，吃饭限量，加之思念家乡，有些人生病险些丧生。如在梅林庙修公路时每天每人的任务是挖完并平整好1米宽、1.5米深、16米长的边沟，否则必遭毒打。因此，有好多入因完不成任务挨打，我本人也因此遭受毒打三次。因为吃饭限量，吃的又是玉米面大饼和大豆瓣，大约有半数以上人每天吃半饱，有的人连半饱都难维持。如乙旦村张凤鸣、鲁北镇石埋太（都是勤奉仕队员）等人服役两年零九个月，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因此，有些人积劳成疾险些丧生。

2、当时的勤劳奉仕队员，95%以上是农牧民。因为家里没其它人顶替，有的被迫结户，有的把租种的地退回，有的把耕种的地和放的牲畜转让给别人。这些人服役回来，由于前半年白干，下半年黄金季节的错过而造成无衣无食饥寒交迫的困境，有的投亲靠友，有的挨门乞讨，实在生活不下去的就外逃他乡。据我所知，1943年冬，原四区就有12户全家外逃，必喜大队王国祥外逃致今下落不明。

3、我们两年的服役生活受尽了人间苦，没有一个人因家中有事请下假来。家中来信或往家写信都经过严格的检查。因此，我们每人接到家中来信都是平安无事，家中接到我们的信也是安全、生活愉快等内容。可事实正相反，有的在服役时丧失了父母，有的丧失了兄弟姐妹，有的妻子被他人霸占。我本人在乌力吉木仁修路三个月，回来后才知家中16岁的妹妹、13岁的弟弟先后病故。兴隆地屯潘军，因顶替哥哥潘发的名字被发现，日本人强迫120名勤劳奉仕队员每人打潘两个嘴巴，其中有些人因不忍心打而自己又遭了日本人毒打。

4、服役期间每天从起床到晚休，都必须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每天起早就是哑斯咪（稍息）、条斯克（立正）、米路那里（向右看齐）之类。每日念两遍国民训和勤劳训，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全用日语。

由于办事和会话全用日语，再加上勤劳奉仕队员多数没文化，接受慢，学不会，每天都有人挨打受骂。我记得有一天挨打的就有32人。轻者拳打脚踢，重者用逮国杖（专用打人的一米多长的木棍），一打就是一、二十下。

在日伪时期，我和我的同代人饱尝了丧权辱国和当亡国奴的滋味，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我的后半生。

田宝屯鼠疫追述

陈 铎·杨玉福

“田宝屯”原名叫忙沙窝堡，据《科左中旗地名志》记载，1882年有个叫赵忙沙的蒙古人在这里立窝堡放牧而得名。1940年，这个屯曾发生了延续40余天的鼠疫，全村70多户人家、400多口人，有一半人在鼠疫中死去。这是科左中旗历史上危害最大的一次鼠疫。

1940年农历7月的一天晚上，忙沙窝堡老毕家兄弟二人饭后觉得浑身没劲儿，头晕发烧，躺在炕上休息了一会，起来后站立不稳，东倒西歪。经家中亲人检查，发现患者腋下和大腿部有黄豆粒大小的疙瘩。家人准备将患者送往架玛吐区卫生所治疗，不料病人很快死去了。这件事被架玛吐区警察公署的小林警尉（日本人）知道后，马上组成了防疫班子派驻忙沙窝堡屯。经大夫检查，这类患者还有几个，于是宣布忙沙窝堡为鼠疫区。小林警尉还亲自带着一伙警察把屯长冯汉书和排长（十户为一排）等人叫来，让他们列横队跪在地上。小林开口骂：“鼠疫的发生，报告的为什么不去？你们良心大大地坏了！”小林骂了一阵又指使左右的警察拳打脚踢，冯汉书等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斑斑血渍浸透了衣服。小林带着警察这样折腾一阵后，关闭了响窑南大门，并增派一批警察和民工将忙沙窝堡团团围住，五步一岗，哨兵密布。另外还在围墙外扎了四座帐篷，里边住着警察，日夜站岗。整个忙沙村里不出外不进，实行全屯隔离。

全屯隔离后，警察和防疫班子每天清晨，从隔离所里都要抬出几具尸体来，用麻袋做成简易担架，将尸体送到村北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土葬。所以当时群众都非常害怕“摸疙瘩”。

“摸疙瘩”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不分男女老幼，不论老公公或儿媳妇，也不论儿子或母亲统统站成一排，全部脱掉上衣，裤子脱到小腿弯处，防疫人员分别在每个人的腋下和腿根部连摸带捏，摸到皮肤有疙瘩则判定为鼠疫患者。村里有个叫马××的，媳妇新婚不久就被拉去摸疙瘩。防疫班子人们见她年轻漂亮，故意慢腾腾地拖延时间，摸个没完没了。这个新媳妇见他们不怀好意，于是用手捂上了害羞处，防疫人员见这个“花姑娘不听指挥”，顿时翻了脸，当即强迫她把双手举起来，两腿叉开，然后往她身上喷药水，说是要“特别消毒”。好端端的一个良家妇女就这样被他们戏弄之后关进了隔离所，没过三天就死了。

在小林警尉的指使下，警察把鼠疫患者关进隔离所后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更不给医治。家中的亲人十分关心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鼠疫患者，每到夜晚，人们都偷偷地往隔离所送水送饭。这样一来就苦了光棍汉田老歪，他没家没业，孤身一人，自然就没人送水送饭了。他意识到继续呆在隔离所只有死路一条。想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他决定逃出这个鬼门关去寻找新的生路。一天夜里，田老歪冲出隔离所，拼命朝村外跑。当看守的警察发现有人逃跑时，便呼喊追赶，边跑边打枪。村外站哨的警察听到枪声，也都做好了截击的准备，田老歪刚爬上响窑围墙时，被警察击毙。

小林警尉唯恐鼠疫传染到自己身上，暗中决定将忙沙窝

堡的人畜统统烧死；食品、房舍全部烧掉。当人们看到警察拉来几十桶汽油，关紧了响窑南大门，村外又增派了哨兵，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要下毒手了。在野蛮的大屠杀即将来临之际，屯长冯汉书把亲属和一些骨干群众串通起来，由他出面谎称鼠疫已经解除，不让警察把汽油拉进来，要求小林警尉给忙沙窝堡群众恢复自由。

小林警尉对冯汉书的报告半信半疑，于是指令防疫班子再次进村，挨门挨户复查一遍，如发现一个患者，则全村皆死。理由是消灭病源，防止鼠疫蔓延。村里有个叫李俭的人是在复查前夕死掉的。如果这件事被防疫班子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全村人命难保、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冯汉书决定用“移花接木”的办法迷惑敌人，便指挥群众悄悄将李俭埋在他家墙根下。当警察和防疫班子拿着户口簿叫李俭出来时，一个和李俭性别、年龄相同并穿着李俭衣服的成年人站出来顶替李俭接受了复查。就这样，骗过了小林警尉和“二鬼子”，全村人免遭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据当事人陈铎老汉和杨玉福老汉回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隔离所仅存在40天的时间，被关进去的就有200多人，死去近200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50%。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有鼠疫的危害，但更主要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人为造成的，很多因感冒而发烧的群众也被当作鼠疫患者关进隔离所传染致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法推卸的历史罪责。

1941年春季，忙沙窝堡群众为躲避疫害，将整个村子南移二华里，同时为祈祷苍天的保佑，村名改为“天宝屯”。1953年又易名为“田宝屯”。

（张利 王福生整理）

科左后旗出荷万头牛纪实

达瓦敖斯尔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后，把东北和东蒙地区作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兵站基地。实行经济统治，疯狂掠夺整个东北的丰富资源，并对人民实行法西斯镇压和奴役，使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伪政权为了满足日本侵略军的肉食供应，对伪兴安四省所属各旗实行“出荷”牛政策。在三年当中约掠夺牧民的一、二十万头牛，使蒙古族老百姓遭受了严重灾难。笔者当时曾任兴安南省东科后旗旗长，对日伪政权1943年从东科后旗掠夺万头牛的情况知之较详。本文里专将此情况及其后果纪述如下。

1942年开始掠夺“出荷”牛时，日伪政权尚未掌握兴安四省所属各旗所有牛的实数，只是根据大体估计数字，摊派了“出荷”牛头数。当年，东科后旗（今科左后旗）被摊派的“出荷”牛数是两千多头。东科后旗在兴安南省各旗中是黄牛最多的一个旗，“出荷”两千多头牛困难不大，比较容易地交了当年“出荷”牛差事。伪兴安南省所属其他各旗1942年“出荷”的牛数也不太多，他们也比较容易应付了这件差事。这件事引起日本人的疑心，他们觉得省里对各旗所有牛数估计过低，大有潜力可挖。于是他们想出一个非常毒辣的办法，即决定对各旗所有牛进行普查。这里只介绍伪兴

安南省普查牛的办法。省里制做了一个旗一个统一番号的铝制耳钳（耳环）发给各旗，令各旗在普查牛时，把铝制耳钳夹在每头牛的右耳上，并进行对号登记，记入调查登记簿内。省里发给东科后旗的铝制牛耳钳从一号至十万号，号前刻有“东科后”三个字。东科后旗公署执行伪兴安南省公署的命令，于1943年夏季抽调日满官吏多人，组织若干工作组分赴全旗各努图克、嘎查，挨屯挨户进行了牛的普查工作。在进行牛的普查工作期间，笔者曾去一个普查点看过一次，亲眼见到给每头牛戴上铝制牛耳钳对号登记的做法。耳闻目睹到老百姓对此的惶恐和怨恨，认为自己的牛已成为公家的牛，随时都可能被征调公用，往后的日子更不好过啦！省里对普查的牛有这样规定：经过调查登记戴上耳钳的牛，牛主不能随便买卖或宰杀。如果牛病死或因其它缘故死掉，牛主必须将牛皮和耳钳送到旗公署申请注销其登记番号；如牛被盗窃丢失时，牛主带当地嘎查达保甲长的证明向旗公署申报。如违犯上述规定，牛主要受处罚。从这个规定来看，牧民的牛简直成了日伪政权的占有物而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了。

东科后旗普查牛的工作队，1943年5月开始到同年7月末结束。经统计，全旗大小公母牛数达十万头。这时贪婪成性的日本统治者找到了更多掠夺牧民的数字根据，1942年要的“出荷”牛数翻了几番。1943年命令东科后旗“出荷”一万头牛。不但要的多，而且都要大的好的。全旗虽有十万头，但其中大牛好牛不到三分之一。因为净挑大牛好牛要“出荷”，牧民种地用的耕牛和吃奶用的乳牛被掠夺殆尽，大大影响了牧民的生产和生活，使后旗老百姓遭受惨重的灾难。强迫“出荷”牛，使牧民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日伪

政权收购“出荷”牛，不是按当时行情收购，而是半价收购。当时一头犍牛市场价是100元伪满币，而对“出荷”牛只付半价即50元。名义上收购，实际上是掠夺。被掠夺的广大牧民敢怒而不敢言。

当时，东科后旗参事官松本幸是一位有正义感而且还有一点同情牧民的日本人。他觉得本旗“出荷”一万头牛，牧民负担过重，曾去省里要求减少“出荷”牛数，却受到其上级的训斥，结果还是如数交了万头牛。身为傀儡旗长的我，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什么，说了也不顶事，只好无可奈何照办了，但自己良心受谴责，深感内疚，愧对本旗乡亲，难以自容。

日本侵略者在开鲁实 行的经济统治

王 广 钧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开鲁，实现了军事占领、政治统治以后，接着实行了经济控制。从此开鲁各族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过了13的被奴役、被压迫的生活。本文仅就日本侵略者在开鲁期间的经济统治情况做一记述。

日军侵占开鲁后，为了控制和搜刮开鲁人民的财富，从政界、军界 渗入到 商界。他们强行占据商务会的领导权位。据满洲日日新闻的《全满商工会一览》一文中登载：开鲁商务会会长牛国兴，副会长佐藤一夫、杜玉贵，常务理事铃木富雄。虽然日本人是副会长、商务会理事，但商务会的事务都得他们说了算。日伪在开鲁县实行交出荷粮，皮毛统治，布匹、煤油、火柴配给制措施，部分是通过商务会为其宣传晓喻各商户的。如有的商户违犯，就冠以损害了满洲国利益的罪名（实际是影响了日寇的掠夺和搜集军用物资的任务）。对所谓“经济犯”，或灌辣椒水，或行刑拷打，以至关进牢房。佐藤、铃木等人，是通过掌握商业活动情况，来发现所谓“经济犯”的。他们从经济活动领域祸害开鲁人民。日本人在开鲁县进行经济统治，通过金融、商业两条“管道”吮吸开鲁人民血汗：

一是搞垮了兴业银行。

民国时期，兴业银行以存储兑换天津票、奉天大洋票、银子、铜子、制钱、大洋等货币沟通金融流通为其主要业务。日军侵占开鲁后，日本驻军大量地使用所谓日本纸币“金票”购买实物，并以大量“金票”换去开鲁当时流通的银子、大洋、铜子、制钱等硬通币。而当时流通的天津票、奉天大洋票被贬值，不仅使开鲁县各族各界人民深受其害，兴业银行也在经济上受到极大的损失，而且也失去了它在开鲁金融流通中的枢纽作用。1933年1月3日，伪满中央银行开鲁办事处成立，9月28日发行纸币88170元，9月30日，以现金收买日本“金票”（纸币）额达9635元。当时兰宽面布每尺价一角二分，棉花每斤价五角，高粱米每斤二分。换算一下，日军用一把废纸就能买高粱米489150斤或能买棉花19270斤或兰宽面布30020尺。而奉天大洋票、天津票先是被贬值，而后便不流通，烂在开鲁民众手中。日本强盗以日本纸币（金票）换走的各种物资、银子、大洋、铜子、制钱等硬通币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

二是日本人搞所谓商业投资，实行高利盘剥。

日军侵占开鲁后，除在五区（现麦新）抢占土地，成立“稻子把”，在三区成立平岗、天拜公司占地屯垦，在城外东、西郊成立大烟组合种大烟外，还在商业上进行投资，仅康德二年就有25000元之多。主要是经营当铺、收购开鲁县的特产甘草和经营日本出口衣等商业活动。日本人越发荣松办的兴隆当，有资金5000元，1934年8月交易额当进1421件，赎出1158件，月末所得计10756元，纯利是资本金的二倍多；日本人富田开劲办的日升当，资金12000元，当进数为2118件，赎出935件，所得利金为15016元，纯利是资本金的126.8%之多。日本当铺美其名曰押物贷款，

它规定五元以上的利息为8%，50元以上的利息为10%。六个月到期，到期后不赎，由当铺开卖。以低价当进，以高价卖出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三是抢购土特产品，牟取暴利。

黑瓜子和甘草是开鲁特产。他们除收购黑瓜子运往当时的奉天（沈阳）外，特别感兴趣的是抢购甘草。开鲁所产甘草和东北满沟（俗名甘草沟）的产品齐名，因而开鲁甘草，在民国时期中外驰名，历年都大量收购，销往国内外。1933年5至10月，全县甘草收购总量就达473800斤，在镇内有五家商户经营甘草。在五家商户中，就有二户日商。仅日商目光洋行（资金1000元，代理人郭信久）就收购了20万斤。该年干品甘草价格上等每斤为15元、中等为12元、下等为10元。而日商多以湿草论价：上等11元、中等9元、下等7元。随意降质降价（以干当湿，以好说次），来欺骗农牧民。每百斤少付农牧民三至四元不等。以每百斤平均少付3.5元计算，20万斤少付给农牧民7000元。为了垄断开鲁县甘草的收购，以日商为后盾的永和甘草公司（代理人施义九）又投资一万元，参加了收购竞争。日商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后，运回本国大坂加工成酱油添加剂或其它副食品着色剂（液），销往西方各国获取高额利润。

四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毒害开鲁人民。

日伪在开鲁镇的城市东南和西南郊区设立了大烟组合各一处，种植罂粟。收割的产品加工成鸦片，日本人就据为专利品，由专卖局供给开鲁镇97处烟馆和有鸦片台帐的吸毒者销售 and 吸用。仅镇内烟馆（投资11509元）年交易额为123,595元，可买高粱米6179750斤。一年吸毒消耗可供五口之家食用三百多年。日伪种植、贩卖鸦片，不仅大量消耗了开鲁人

民的财力，更为严重的腐蚀了一部分开鲁人民的肌体。那时看到一些鸦片嗜好者的惨状，真是目不忍睹。他们吸毒成瘾，骨瘦如柴，失去劳动能力，最终是贫穷如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潦倒街头……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通过吸毒成为“东亚病夫”，无力反抗其残酷压迫。

五是利用捐税途径，大量搜刮民脂民膏。

日伪对开鲁人民的苛捐杂税，仅1933年即达55038元，其中罚款592.52元。从伪兴安西省调查科至开鲁的出差人绪方笃太郎，在1933年10月25日上报给兴安西省政府的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到日伪为向开鲁人民要税，所干出的卑鄙可耻的勾当。他们把开鲁商户统计为432户，为什么经过日寇的侵略和掠夺，开鲁商户不但没少，反而多起来了呢？原来他们为了搜刮民财，竟把妓院8户、大烟馆97户，拎鞭的牛马经纪人5户也统计在商户内了。实际上是322户，资金是368180元，一年交易额为：3963000元，所得纯利为22.4万元。绪方在他的调查材料中说，考虑“商人怕上税过多，可能上记（报）的数字少，所以得照上记（数字），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税金”。这不仅增加了商户的支出，而且也增加了消费者负担。收购土特产品的税率，高得使人无法承受。如收购甘草，每百斤干湿均价为13元，而税金每百斤缴纳8元，税收总额占收购价的61.5%。

吉尔嘎朗屠杀惨案

白广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侵占我国东北，东北各族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纷纷结伙和侵略者展开了英勇斗争。

当时，在科左前旗（今辽宁省彰武县一带）由十家子村盛宝山牵头，从外地请一名姓官的法师，自愿组成了一百余人的“红枪会”。其口号是：“打倒满洲国，赶走日本人”。与前旗接壤的后旗姚揽头、五家子等村也有人前去参加了这个组织。然而这一自发的农民组织，缺乏正确的组织领导，没有根据地，所以，不久便被日军所镇压。从此，日军更进一步加深对当地人民的威胁和血腥镇压，开始从广大农村收缴民用枪支，甚至于猎用砂枪的枪筒等部件都得上缴。

于1932年1月，日军从后旗南部边境地区逮捕五十余人，分别送进康平、前旗和后旗监狱。被捕者当中除个别人外，大多数是在各村屯有一定群众基础，较有威望的人。当时目睹者回忆，在吉尔嘎朗“三府”被关押的“囚犯”，除挨打、挨吊、压杠或灌辣椒水之外，也有被烧的、烙的、烤的，还有用子弹头和针往指缝里插的。“囚犯”中双庙子村老郑家有位刚满二十岁的黄花闺女，因反抗这帮野兽的侮辱和糟蹋，就惨遭了用烧红的炉钩子烙烤阴户的刑罚，其惨景令人目不忍睹。

第二次从后旗刘木匠窝堡、四喇嘛窝堡和黄花甸子一带

共抓了郑有财、张靖、张马官儿、刘玉、刘宝、张文、伍玉林、牛秧子（绰号）、孟老三和纪二瘸子等15人。其中，刘木匠窝堡的郑有财是特别五村（村名）的村正（村长），他虽然没上过学，但从小心灵手巧，有一手木匠活儿的好手艺遐迩闻名。此人为人忠厚，能说善辩，对五经四书也略知一二。所以，村里人都称他“铁嘴钢牙”。哈日干吐村的肖忠贤和赵玉坤二者在回忆中说：郑有财虽然当过村正，但没作过有害于百姓的事，咱村里的穷人都很敬重他。因此，咱村儿的王大爷（名叫王铎，穷人称他“王大爷”），为了营救他，领着自己的二小子跑几趟王府，找熟人说情并听到些郑有财在狱中的情况。可是王大爷的举动，却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不但没救出郑有财，反而把自己二小子王庆云给搭进去了。日本人把他的孩子抓到康平后，没过几天就活活地喂了他们的狼狗。在这15人当中，还有三官营子的纪二瘸子，是位多年赶车的车把式。日军见他身强力壮而腿有毛病，硬说他当过胡子（土匪），瘸腿是被人打伤的，于是，被抓去活埋了。

就这样头两批被关押监狱的“囚犯”，没几个幸免，甚至有的人如潮海的蔡忠、白云广，阿尔乡东菜园子村的祁海山、赵家兄弟三人和魏家坨子的大粮户孙殿奎等人，在何处何时被害，谁也不敢打听，连尸首都不见了。

时隔7年，即1939年暮春，在吉尔嘎朗西南坨子去二区新庙的路旁，由于多年风吹沙移而露出一堆尸骨，在烈日下曝晒。当时在吉尔嘎朗国民优级学校念书的我和其他走读生都亲自到过现场。这堆尸骨直径约有四米方圆，连土带骨有二尺来厚，露出地面的五六个头盖骨模糊不清地与仍未完全脱落的头发混杂在一起，东一个，西一个的，没和全身骨骼相

连。过路者见了此景不免心里发怵。据孟老五等当事人说，这堆尸骨就是日本守备队进驻科尔沁左翼后旗，为了镇压反满抗日分子，从刘木匠窝堡一带第二批抓的郑有财等13人的尸骨。孟老五（孟昭富）等二人由于托亲友，被看守（监狱看守叫胖沙，吉尔嘎朗索道艾里人）放走而得全性命。

郑有财等被害者个个都是硬骨头，敌人通过非人的严刑逼供，叫他们交待反满抗日的同伙，他们没出卖自己的良心，宁死不屈。特别是郑有财这位极为普通的农民，真正表现出了他那种“铁嘴钢牙”的硬骨头精神。他从非人的折磨中苏醒过来后，高声呐喊“我们没做错事，能对得起黎民百姓，你们洋鬼子好不了，不要忙！”气得日本人暴跳如雷，一个个直发抖。这时叫泽田石的“指挥官”显露出狰狞的面目，顺手操起炉钩子，把郑有财的舌头勾出来用匕首给割掉了。郑有财被割掉舌头醒过来后，仍继续骂日本人，并连吐带喷弄得敌人满身是血。最后，这帮野兽对他们下了毒手。用汽车把他们13人拉到吉尔嘎朗西南坨子后，挖了一个大坑，叫他们下去，他们谁也不下，反而又喊又骂，骂个不停。特别是郑有财用他那已经不好使的舌头骂道：“洋鬼子……你们……好不了……不……要……忙！”他把这句话断断续续地不断地重复着。这时行刑的日军乱成一窝蜂，用东洋刀和刺刀乱砍乱插，随后把他们推到坑底，填了土。

从此，在吉尔嘎朗附近听说过泽田石的人们，一见到他就不寒而栗。此人凶狠残暴、心毒手辣、无恶不作。有时他见了老百姓还很得意地说：“我们日本人是来帮助你们的，是建立‘皇道乐土’的，现在，坏人的大大的有，统统地杀掉！杀掉！”后来人们都怕遇见他，一听到他来了，就赶

紧躲避。有些家长，也常常以“泽田石”来吓唬好哭闹的孩子。大人说“泽田石”来了，孩子就不哭不闹了。

1943年初秋，日本侵略者为了收买人心，以协和会东科后旗本部的名义，由事务长早勘次郎派关朝格珠等三人把这13人的尸骨“埋葬”在路西北坨坑中。吉尔嘎朗分会书记王文楼在这13人的墓碑上题写了“无名十三义士”。

日本侵略者正是用这种极为残无人道又无耻的手段，来达到其所标榜的“东亚共荣”、“皇道乐土”。他们建立所谓“皇道乐土”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和凌辱的过程。

（那顺巴图 整理）

全家出劳工

程恩英

我叫程恩英，家住奈曼旗沙力好来苏木东沙力好来村。

1945年春节刚过，伪保长通知我丈夫韩宝山，说要他给日本人出劳工，并让我们全家都跟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惊呆了，因为在当时，出劳工就意味着死亡。怎么办呢？和我家同时被通知出劳工的另外一户倾家荡产给保长送了礼，被免除了劳役之苦。而我家跑又跑不了，躲又躲不掉，求保长又无用，送礼又没钱，只好做走的准备。出发前，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正月20日，西北风呼呼地卷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压下来，天冷得出奇。村里的一辆三套马车在一个警察的押送下老早就停在我家门口。我们家连早饭都没吃，我大伯哥和几家亲友都赶来送行，一个个眼泪汪汪地，想哭不敢，想说又说不出，一副副生死离别的样子。我们带上家里仅有的一床破棉被，留下的只有一口破柜和一间在狂风中吱吱呀呀乱响的小马架子。我们故意磨磨蹭蹭想和亲友多呆一会，押车的警察却凶恶地喊叫，催促我们快走。当我们领着四岁的女儿，抱着两个多月的儿子爬上车，车轮开始滚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声。

我坐在车上，回头望那风雪中伫立的众亲友和那熟悉的小马架子，心里有一种死亡将要来临的滋味。

我们坐的车在风雪中朝阜新赶去。天冷，衣服少，带的

棉被两个孩子盖不过来，冻得直哭。我丈夫冻得太厉害了，就下车跟车跑一气。我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就是不照顾孩子也跑不动），只得坐在车上，冻得胳膊腿象不是我自己的似的。实在挺不住了，就央求警察路过村子时找个人家暖和暖和。但到了人家屋里烤火时，连手都伸不出来了。

天下着雪，路又滑，到衙门营子区（今青龙山镇）八户村时，车突然翻了。我们全家都被砸在车下，可怜我那四岁的小女儿腿被砸断了。孩子砸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着大夫，押车警察又不让停，只得让孩子拖着断腿继续在风雪中赶路。这样，马车在风雪中拉着我们挣扎了3天，到正月22日晚上才赶到阜新。

到了阜新，押车的警察把我们交给日本人后就押空车走了。日本人随即将我们装到了火车的闷罐车厢里。火车虽然能挡点风，但从车门缝进来的风也很刺骨。我们又冷又困，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晃晃荡荡走了一天一夜，于第四天晚上到了抚顺。日本人将我们赶到离抚顺二十多里的大片村。这儿有日本人的一个工厂，我丈夫就在这工厂里给日本人干活，后来听说，我们奈曼旗一共去了280户呢！

我们到大片村的当天晚上，日本人将我们男女老少107人赶进一个啥都没有的大筒子屋里。大伙就只好睡到凉砖地上，地上连点草也没有。每天睡到半夜，有一多半人被冻醒。前三天，像蹲监狱一样，不让出屋，每天只给两顿饭吃，顿饭都是高粱米粥，粥里还有虫子或耗子屎。三天后，日本人将我们分开，我们两户人家分了一间小屋。我家4口人，那家6口人。一间屋一铺炕上住两家的10口人，晚上只得大人孩子一颠一倒睡，而且只能侧身躺着。住的地方安排好，我丈夫就开始干活去了。他们干活时日本人只是来回

巡视，让中国汉奸当工头。汉奸工头姓王，对待劳工特别凶狠。劳工干活稍有怠慢，皮鞭子马上就会落到背上，而且连情绪不好脸色忧郁都不行。劳工们每天干活都超过12小时，还要每三天加一个夜班。干完一天的活，劳工们回到“家”里，一个个都瘫在炕上。

男人们每天出去干活，剩在家里的妇女和孩子只能在屋子里老老实实呆着，不许乱走乱动。日本人在家属区也来回巡视。家属区的气氛也出奇的吓人。屋子里虽然有炕，但没有多少烧的，炕几乎都是凉的。

来到大片村后，我那在半路上砸坏的女儿一直不能动，加上炕凉，最后失去知觉连拉屎都不知道了。但劳工营里没有医生，又不能出去，二十几天后她就死去了。两个多月后，我那刚刚四个月的儿子也因得了抽疯病，无医无药，可怜地死掉了。孩子死了不准埋，只准扔到村后的河堤让水冲走。孩子死了，我丈夫也必须去干活，连扔孩子都不让他去。我把第二个孩子的尸体扔进河里，看着他被河水冲走时，心都要碎了，真想跳进河去和孩子们一起走，但想起整天在日本人皮鞭下当奴隶的丈夫，我又动摇了，只得回到那又窄又冷的小屋。

两个孩子都死了，我由于过度悲伤，加上吃不饱穿不暖，到春天得了一场大病。整天头晕、恶心、手脚冰凉，犯病时全身抽成团、冷得发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压在身上也不管事。我病得那么重，我丈夫还必须去上工，每天上工时间一到，不管我犯不犯病，都得马上走。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眼泪汪汪地回头看着我。那情景真叫人难受。我不能做饭，他就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工。我看着他那可怜样，非常心疼。所以，我每天只要稍微能动就爬起来给他做口饭吃。有

一天早上，因为未吃上饭，又加上我的病迟迟不好，他上工时精神不振，汉奸王工头看见了不由分说“叭叭”就是两耳光。

从劳工们开始干活起，日本人每十天给大伙发一回口粮。但是除了这霉小米、苞米面，一点蔬菜也没有，只得吃盐水。等天气暖和了，我们家属们就到工厂附近的地里挖野菜。烧的不够，我们就到工厂附近拣煤核儿，但日本人发现后不仅要把煤核儿倒掉，而且还要毒打一顿。在这个劳工营呆了半年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死，时时有哭声。大人死了日本人一个也不让埋，都扔到村北的河里让水冲走。我们整天提心掉胆地活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轮上自己。

我丈夫每天的活非常累，还经常遭到日本人和汉奸工头的打骂，就产生了逃跑的念头。有一个抚顺附近的劳工，和我丈夫一起偷偷地商量，找机会逃出去。我丈夫回来后就和我商量，还要我准备点干粮，并开始偷偷地收拾行李。我听了他的话后又喜又怕。喜的是一旦能跑出去就离开了虎口，怕的是万一跑不掉被抓回来可就糟了。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呆着，忽然听见后院传来一阵阵凄惨的叫声和凶狠的骂声。我们慌忙赶过去一看，见两个日本人正在用皮鞭残暴地打一个逃跑被抓回来的劳工。他的家属就跪在跟前，怎么哀求也无用。日本人把他踩在脚底下用鞭子没头没脑的打，打了一阵后，又用脚踢翻过来再打，直到打没气了，还用脚踢过去，然后呜哩哇啦地骂着扬长而去。等日本人走远了，他家属才敢跑上前去，可是人已经死了。所以我把怕被抓回来的想法说给我丈夫，要他小心。后来我们试了几次，都因为日本人防范太严，才未跑成。

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劳工营里苦苦地熬着，等待着时机

到了1945年旧历7月，我们突然发现呆的这个劳工营的气氛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和汉奸工头都不象原来那样凶了，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劳工们干活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而不会遭到打骂了。有时他们也对劳工们说：“快了，快放你们出去了。”劳工们暗地里纷纷议论，都猜日本人快完了。

果然，农历7月20日，劳工营里的日本旗全部撤了下来，管事的突然告诉大伙说：“你们都走吧！”劳工们听了这话高兴极了，马上准备行李离开了劳工营。

离开劳工营时，身上无衣手里无钱，外面的世界也显得乱哄哄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久停，必须马上往家奔。路上，一家一户、一群一伙全是被放回来的劳工。背着包，挑着担，扶老携幼，象逃荒的一样。没有吃的，就一边走一边讨。不管白天黑夜，要着东西吃，吃饱了趁身上有劲马上赶路；要不着东西吃，饿得走不动就找个地方歇歇。实在要不着就找野菜充饥，吃完后马上再走。好在七月份天气暖，找着屋子就住屋子，找不着屋子蹲破庙。有时住在野地里，蚊虫咬、雨水浇、肚子饿，但是，可能因为回家心切，走了四十天才到家，居然未生病。

到家后，望着我们那间破烂不堪的，小马架子，想起走时那悲惨的情景，想起了半年来所受的罪，想起了我们那活泼可爱的两个孩子，我们夫妻俩抱头痛哭了一场。

（杨晓春 张斌整理）

三 次 出 劳 工

张 宏 耀

我叫张宏耀，祖籍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听说我家是在我父亲三岁时，祖父挑着担下关东，逃荒到辽河边上 的白音太来（通辽市城区的前身）北的兵营九家子。我父亲35岁时有的我，在我未满一周岁时从兵营九家子迁到扎来锡伯。扎来锡伯屯原属科左中旗五区，现在归属通辽市大林镇。这个屯子，解放初期一年发大水被水淹没。居民搬到附近的各个村，我搬到西归力村至今。

从1943年到1945年，我三次被抓当劳工，饱尝了在侵略者的皮鞭与刺刀下的亡国奴的生活。

第一次当劳工

1943年，我24岁，家有60多岁的老母和一个瞎弟弟。一家三口人，只靠我给地主扛活所得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穷人不用想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这一年的二月，我被抓去当劳工。扎来锡伯屯，与我一同被抓当劳工的还有陈金柏、张金刚、张套格套稿、佟德喜、何布和吉亚、额勃德仓和林喜山等七人。林喜山被任命为小队长，只监工、不劳动，还有打骂劳工的特权。中队长是马家窝铺的郑万山，是个狠毒的家伙。

我们这些被抓的劳工，由“自卫队”押送到区上，再押到大林车站，关进火车的大闷罐里，一直往老北山开去。在

日本人和汉奸的眼里，我们这些被抓的劳工，就象一群被赶去服役的牲畜。全区80名劳工，被装在一个大闷罐里，每天只送进一桶凉水，每人两个玉米面窝头，大小便也在车厢内。忍饥挨渴、臊臭难闻。车窗也都封着，不见一丝阳光。就这样熬了三天三夜我们被押送到牙克石北的羊鼻子沟。

我们在羊鼻子沟里，自搭草屋（其实并不是屋，只是个窝窝）。铺草，盖草，草底下地面还渗着水。任务是扒树皮。每个班（36个人）每天要扒出能出一吨油的桦树皮，也就是长三米、宽二米、高一米五的一大垛。完不成定额不准下班。干活时稍怠慢，就要挨队长的毒打。队长打人，用的是劈柴拌子，打在人身上既伤肉，又伤骨，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劳工们在一年的劳役中，几乎天天挨打。我们每顿饭是两个橡子面窝窝头。一天三顿，常年吃不到油和蔬菜，每顿饭只分得几个盐粒。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干着超体力的劳动，总吃不饱，还得挨打、流血，怎能受得了？不久，得病的人就逐渐多起来。有了病，不但不给医治，反而说是偷懒，等待着的还是无情的棒打。

我们一年只发一身衣服。每三个月发一双胶鞋。衣服不能换洗，生的虱子成堆，痒得太厉害了，就脱下衣服抖一抖，算是抓虱子了。由于虱子咬，草屋地湿，人人都得皮炎，痛痒难挨。一双新鞋，穿不了一个月，就破得不跟脚了，剩下的时间只能打赤脚。草刺、石子扎破了双脚，鲜血直流。东归力屯有个叫德培惠的劳工，两脚肿得象个烂西瓜，领队的小队长还逼着他去干活。走不了，就是说“消极怠工”，用劈柴拌子乱打。一开始，他还咬着牙，坚持干活后来实在动不了了，他就把心一横，往地上一躺，说：“打吧！打死我！我实在干不了了！”到吃饭时，工友们送给他

吃的，他也不吃，绝食了。在好心的伙夫精心调理、照料下，用盐水洗脚，背着队长给他做点稀饭吃，才慢慢地将伤养好了。

这一年10月末，我回到家才知道，因为我被抓去当劳工。妈妈绝望后上了吊。后经乡亲们抢救，才活过来。因家中没劳力，没有生活出路，妈妈和弟弟只能靠沿街乞讨度日。

第二次当劳工

1944年春天，屯长林喜山把他一个亲戚应摊的劳工，硬加在我的身上，不容分说，抓了就走，在那个时代里哪里有讲理的地方。我又被抓走了，母亲和弟弟还得沿街乞讨。

这一年，我们屯去当劳工的有包杰拉根、何长福、孙老嘎达和我四个人。我们那个小队长是西归力屯的德阎王（此人对劳工非常狠毒，故得此外号）。

我们这个队的任务是在牙克石北绝户气站附近的大山根修飞机窝。把山硬是凿开，在山底下修个飞机场，每个窝里放三架飞机。这项工程是对付苏联的，打仗时既可行动又可隐蔽。

这一年，我们吃的苦不亚于头一年，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石头碰伤脚、碰破头是常有的事。小队长德阎王是个没有一点中国人味的洋奴才，他心狠、手黑，常常把劳工打得遍身鳞伤。我是个气粗、性耿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就有时打抱不平，所以，我挨打的次数最多。

十月底，修飞机场的工程完成了。日本侵略者把劳工们集中起来，训话：“你们的听着，修飞机场是军事机密，回去后，不准对别人说，谁要泄露了机密，你的，全家的，统统的死拉死拉！”这样，我们被装进闷罐拉回了家乡。

第三次当劳工

1945年春天又到了抓劳工的季节，我想，我已经连去了两年劳工，今年怎么也不能让我去了吧，就托人找东家，准备扛一年大活，好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丧尽天良的伪村长，又串通伪警察，第三次把我抓去当劳工。这次，我不知又是给谁当了“替死鬼”，他们欺我是外来人，人地两生，无亲无故！这一年，我们屯去当劳工的除我以外，还有佟玉和郭老三。

这次是到牙克石北的羊鼻子沟北修森林铁路。小队长是庄头屯的李存方，住的还是草窝窝，吃的还是橡子面窝窝头，每天还是在刺刀和棒槌下挨打、挨骂，受尽了日本人和汉奸们的残酷迫害。于是，我们就企图逃跑或反抗，可是，山沟里到处日本哨兵和狼狗，逃跑是根本办不到的，反抗也只会变成冤死的鬼。所以，劳工们只好把仇恨深深的埋藏在心底，盼望着苦尽甜来！

这样，我们一直熬到公历八月十五。这一天，听从关里被抓来的“终身劳工”（有些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人称为“老傅代”的人说：“日本鬼子完蛋了，没人管啦，别干了。快回家吧！”人们听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半信半疑。我就悄悄地到日本人的监工棚边去察看动静，才发现连一个日本人的影儿都没了。这时，我们才注意到空中的飞机不是日本人的，也不是伪满洲国的，而是印着红五星标记的苏联飞机。日本人真的完蛋了。鬼子们都逃跑了。人们再也不干了，就往家走。我们这个小队三十多人，染上伤寒病的已有二十多个。瘦得皮包骨，走都走不动，大家都是乡亲，都是阶级兄弟，哪能扔下不管呢。我们就你扶我，我搀他往前走。到了车站，才知道火车也不通了。

当时，我还未得病，我一个人就照看着四个病号。一路上，我们渴了就喝点山沟里的流水，饿了就掬两把野菜野果充饥。

在途中，有一个劳工队长还耀武扬威地欺负劳工们，大家一怒之下用扳枕木的铁撬子把他撬死了，以泄劳工之仇和亡国之恨。我们不分昼夜地往前走，走了七天七夜，到了嫩江边。这时，几个病号的病情都有所好转，我却连累带饿地病到了。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发冷，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步也迈不动了。我强打精神，把一件从家里带来的、妈妈亲手做的布衫递给一个乡亲，说：“我可能回不去了，不连累大家了，你们走吧！到了家，把这件衣服交给我妈，就说过些日子就回去。”说完，我就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是一个守桥的苏联红军救了我。我终于在农历八月十七（公历9月22日）那天到了家。

先到家的人把我的衣服交给了我母亲。母亲以为我不在人世了，连哭带着急，病倒在炕上。我的盲弟弟只好只身一人出去讨饭，照料母亲。我活着回来后，全家人又惊又喜，围坐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后来，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劳动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当了国家的主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全体乡亲们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吴长春 整理）

劳工在异国

宝勒朝鲁

我叫宝勒朝鲁，蒙古族，今年70岁，老家是科左后旗哈日格嘎查，现住巴雅斯古楞苏木查干伊玛嘎查。1944年我被抓去日本当劳工，深切体验到了亡国奴的苦难生活。

被抓劳工

1944年农历7月的一天，我们屯子的艾里达(村长)到我家跟我父亲说，根据努图克达的指令，确定你的大儿子出劳工。我父亲说，我们一家七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全指望这一个劳动力养活呢，请艾里达老爷高抬贵手，免了这一差事吧！艾里达听后很不高兴，他说这是旗公署的命令，谁也不准违抗，再说我也做不了主，还是让孩子去吧。我父亲问他去什么地方，多长时间？他说去的地方可能远一点，但时间不长，几个月就会回来的，快点收拾东西，统一到巴彦宝努图克集合。艾里达说完就走了。艾里达一走，我们全家人哭天喊地，不知道出了劳工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在安东(丹东)受训

农历7月下旬，全旗各努图克艾里的劳工都集中到旗公署所在地吉尔嘎朗，然后经郑家屯到了安东。我们一下闷罐车，便见到人山人海。据说光从内蒙古、东北及关内抓来的劳工有10万人，光是我们科左后旗(当时称东科后

旗)去的就有二百多人(其中蒙古族劳工58人)。这些被抓去的劳工先在安东受训,除了每天做扛抬大木头等重活外,劳工们还得接受立正、稍息、走正步、跑步以及用日语报数等训练。吃的棒子面窝窝头,住的是能容纳几百人的简易工棚。劳工们在安东接受近三个月的训练以后,日伪当局从这10万劳工中挑选出三万人分期分批去日本干活。我就是当年被抓去日本岛的三万名蒙汉劳工中的一个。

在日本国的日日夜夜

我们在朝鲜,从釜山上轮船又走了十几天到了日本的福冈。一到福冈,劳工们重新编队,科左后旗、库伦、奈曼三个旗的92名蒙古族劳工编成了一个劳工队,由两名日本人监管并配有翻译。劳工管理当局给每个劳工都编了号,点名、派活儿时只叫号不称呼名字。出工干活就象军队一样,稍不留心就遭到日本监工的毒打或体罚。在日本国,我们这些人举目无亲,也不知自己能否生还祖国与亲人见面。为了互相有个照应,一旦有人活着回国,能把自己同伴的消息带给家乡的亲人,我们92名劳工一起按照家乡古老的习俗,背着日本监工磕头拜了把子,无论年老年少一律以义兄弟相待。

我们这队劳工被分配在福冈叫唐津的地方修船坞(一平方华里,三丈六尺深)。我们干的活儿就是挖深坑,运出土,从岛边采运石头,浇铸混凝土。劳工们每天早三点起床出工,中午十一点半收工,休息一个小时后出工干活儿到晚九点。除吃饭休息时间外,每天干活的时间长达16个小时。劳工们吃的是干饭或稀粥,每天只有一斤二、三两。干那么重的活儿,这么一点点饭量,人人吃不饱,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劳工们住的是用树皮钉的简易工棚,一百来号

人住在一个工棚。工棚上边露着天，既不避雨，又不挡风，春夏秋冬都住在这个潮湿阴暗的工棚里。日本那个地方雨特别多，如不下雨，便是烈日当头，劳工们既干超体力的重活儿，又遭日晒雨淋。

我们这些在家乡种地放牧的农牧民，只会说民族的语言，有的至多懂蒙汉两种语言，但是到了日本国以后，日本监工当局派活儿，训话等一律用日语讲，由翻译翻。当局规定，凡是中国劳工只准用日语对话。因此，谁要是当着日本监工的面用本民族语言说话，谁就会遭到日本监工的毒打。劳工们干活，日本监工就拿警棍或鞭子在旁边监视，稍不顺眼就拉出来抽打或打嘴巴子。劳工们一天集合数次，每次集合都得用日语报数，报错了或报迟了都要挨打。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前要用日语向日本天皇祈祷，说错了也要挨打受罚。

有的劳工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时报病请假，日本人就把他的饭量减少，而且强令其出去跑步，扛抬沉重的东西，把人累得实在喘不过气的时候才允许回工棚，说这是“治懒病的妙法”。有的劳工病得实在重，或者患了传染病，经日本劳工管理当局详细检查诊断之后才允许回国。说是“回国”，其实不知道给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劳工队中，曾有三、四个人因病提前被送“回国”，至今下落不明。

日本的女劳工

我们到了日本国以后，看到的不仅有数万名中国劳工，还有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他们都是被日本侵略者抓去的。同时，在开山采石、修筑船坞的工地上，还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妇女劳动，她们中多数是青壮年妇女，当天来当天

走。当局规定，不准她们同外国劳工接触，可时间长了，当监工的不在时她们有的也接近我们中国劳工，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诉说日本当局对国内实行的反动政策，表达她们对日本政府的不满和对中国劳工的同情。

日本投降，劳工回国

1945年8月，我们在工地上亲眼看见了大批美军在日本登陆。昔日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警察们乖乖地缴械投降。此后半个月左右时间里，对中国劳工的监视、强制性劳动稍有松缓，伙食也比以前好了一点，还让我们看了一场电影，破例给中国劳工发了服装（日本黄军装）。我们从家乡到日本国一年多来第一次被当人对待。这时，在中国劳工中传出“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我们这些人该回国和亲人团聚了”的说法。可是日本当局还没有发话，大家非常着急。后来我们听说，祖国光复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同日本当局交涉让他们负责把中国劳工遣送回国。9月下旬，日本劳工管理当局宣布：中国劳工可以回国了，我方准备了船只，可是只能把你们送到朝鲜，那一段路火车不通了，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吧。这时，劳工们在法西斯的警棍和皮鞭下超体力的紧张劳动的心理开始松弛下来，一些人睡下就起不来，推也不起，唤也不醒，这样持续了好几天。

日本当局给准备的是大型机帆船，数万名劳工归国心切，都争先恐后地爬上船。船在海上走了十几天才到达了朝鲜的釜山。护送劳工的官员说，我们奉上司命令把你们送到这里，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啦。

归国途中的坎坷

在朝鲜釜山，我们这些人一登陆，就去找火车，想尽快

回到家乡，可是铁路被炸毁，火车不通了。劳工们各自成帮结伙，自谋生计，自找回乡之路。那时，我们在朝鲜南部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美国兵，他们正在那里到处拉夫抓差修筑工事。美国兵一见到我们这些刚下船的劳工，挡着我们不让走，并向劳工们宣传说，朝鲜北部已被苏联军队占领，你们的家乡也被八路军占领了。他们到处抓人杀人，你们留在这里好好干活，美军保证你们吃好穿好。就这样把我们数千人都带到美国兵集中的地方去修工事、修碉堡、架铁丝网。美国兵也是横行霸道不讲理，动不动就打人。我们这些中国劳工的命够苦的了，刚从日本法西斯的火坑里逃了出来，又被美国兵抓住往火里塞。在美军占领区被迫劳动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放我们走的迹象。我们劳工中岁数最大的拜把子大哥海宝山悄声跟我们说，这样干下去可没有头啊，不如咱们趁他们不注意时逃跑。我们百十来个人秘密串连了一下，乘监工人员不在之时大家就往西北方向跑。离开了美军营区以后，我们举着从日本带来的写有“中国劳工”字样的一面小旗继续北行。从朝鲜南部一直走到朝鲜北部，路途中没有人管饭，我们又没有钱，只好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换吃的，衣服脱完了就乞讨着走，晓行夜宿，走了几十天总算走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大桥边。我们等待放下吊桥过江回国。大桥一放下来，等候在大江两岸渡江的人们一涌而上，我们这些久离祖国、远离家乡的劳工们终于回到了祖国。

八路军胜亲人

过了鸭绿江，踏上祖国国土，第一眼看到的是岸边有不少军人迎上来主动和我们热情握手。我们当时有点莫名其妙，是不是象美国人说的那样要把我们抓走，心里有点害

怕。不大一会儿，驻在安东的八路军派出的接待人员把我们这些被日本抓去的苦难同胞领到市里去，安置在当年的劳工棚里歇宿。他们还派人给我们送来了白面、文化米、猪肉、蔬菜等食品，并安慰我们好好休息几天，恢复好身体再回家乡。我长了这么大，从家乡到过异国日本、朝鲜，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他们象亲人一样热情接待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就在我们休息期间，八路军和当地的敌伪残余、土匪武装打了一仗。我们这些劳工们主动要求跟八路军上战场，八路军领导劝也劝不住，我们跟着部队抬担架，运伤病员，给部队做点好事。正在此期间，我们在安东街上碰到了当年在日本国给劳工们当翻译的高翻译（名字记不清了）。他邀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作客过后，我和海宝山等几个人代表劳工到高翻译的单位，这才发现他是八路军的一位领导干部。经站岗的通报后，高翻译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他详细询问了我们这些最后一批回国劳工的情况。他说：“内蒙古现在天气已经很冷了，你们穿这一身破烂衣服怎么能回家呢。你们先回住地等着，我们跟军队领导机关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没过两天，由八路军那里为我们八十多个蒙古族劳工发了棉袄、棉裤、棉帽子和大头鞋，并给每人发200元的路费。在回到祖国的短短几天中，我们从八路军身上，从高翻译身上体验到了祖国的温暖，看到祖国未来的希望。我们即将从安东出发往家乡走的时候，赴日本劳工中的田虎（白福林）、铁丹、苏日乃、敖其劳、达来、白金丹等十几名蒙古族青年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他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这些人在亲人八路军的关怀照顾下，不久回到了家乡，和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巴根那 整理）

伪满的“大烟组合”

李志武 周 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毒害中国人民，搜刮钱财，支援战争，在开鲁种大烟。先是在东门外劝农模范场（现糖厂附近）试种。当时种植的大烟品种有四平头（高产）、紫花大头和白花头（稳产），最大的烟桃比鹅蛋大，能割13至14刀。每次割1刀，一人在前面割烟桃，一人在后面捣浆。烟浆刚出来为白色，晒稠时呈深酱色，此时叫生烟土，待炮制成熟烟后才称为大烟。

日本人试种成功后用钱强行征购民间好地，成立了大烟组合。在1942年以后，先后成立的大烟组合有：西关大烟组合、东关大烟组合、西扎兰营子（现大榆树工农村）大烟组合、南关大烟组合、道德营子大烟组合。其中东关和西扎兰营子两处规模较大。

每个组合设有理事长、监事长、会计、保管、勤务，另有工人百余人。组合是企业，理事长由日本人担任，主管一切。

每个组合在割烟时，还雇用很多临时工，把割下来的烟浆晒稠，再送开鲁行政科烟政股。由烟政股用专人（称之为“鉴定”）把它制成烟砖。每块60两。

南关和道德营子每处各年产烟砖千余两，西关年产2500两。东关和西扎兰营子两处都在3500两以上，全县年总产大烟11,000多两。

当时，开鲁是伪兴安西省省会，所辖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奈曼旗、林西县和开鲁县共八旗县，所产大烟都在开鲁统一制成烟砖，定出等级，包装成箱，贴上《福寿膏》商标，运往伪满首都新京（现在长春）由禁烟总局验收核算后拨款给各旗县大烟组合。

后来，随着战争的升级，日军需要鸦片毒品的地方也随之增多，开鲁各大烟组合土地都有所增加，计有2000余亩，年产烟砖可达20000多两。这些罪恶的企业，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垮台。

1933年3月，日军侵占开鲁县后，取缔了私人烟馆，日本人即在城内南街路南（现南旅社）设“白中天”，在东街路北（现东副食）设“凌云阁”大烟馆两处，统归管烟所管理。此外，还在开鲁农村双四台、道德营子、扎兰营子、破庙四处设立管烟所。各管烟所统归县公署行政科烟政股管辖。

日本人把吸食大烟的人都集中起来，当场实际鉴定，即一次能吸食多少就定量多少，发给《鸦片瘾者领烟证》，每天凭证定量购买烟泡（重量在6—7毫克，添加其他成分后制成粗0.5公分，长2.5公分，圆柱状，外用蜡纸包装），在烟馆里吸食。

烟馆，象饭店的雅座和旅馆内的小单间，门上挂半截白布门帘，两人一室；炕上有炕席，两边铺条毡，毡子上蒙白布罩，还有两个很大的方枕头；室内冬暖夏凉，条件一般说都很舒适，两条毡子中间的炕席上放有银盘、铜灯（用豆油）、烟枪供人使用。吸食鸦片者终年无所事事，整天在烟馆里喷云吐雾，日本人得了钱，中国吸毒的百姓却成了没有

灵魂的行尸走肉，把人变成了鬼。

当时吸烟者多是生活较为富裕的中年以上的男性，大体分为三等，一等吸烟的还在烟馆里摆阔气，抽烟的同时吃着糕点、水果，有时还把饭店的饭菜叫到烟馆来吃。一般的烟泡能抽6—7遍（最多的能抽10遍），他们只抽2—3遍便不抽了，说是怕脸色发灰不好看。二等抽烟的把一等抽下的烟廉价（约原价的三分之一）买来再抽。三等的抽不起就喝从烟枪里挖出来的烟灰，扎用烟灰过滤下来的所谓烟汁。

当时每个烟泡凭证购价为一角七、八分钱，私卖高达一元多。当时的一角钱可买十多个大麻花。瘾大的一天能抽2—3个烟泡。久而久之，一等抽烟的也持续不了多久。如西扎兰营子有位满清宣统元年由热河都统派到开鲁任镇守的车大人（营长称大人，连长称少官，副连长称副爷），家有房屋、土地、车马，可谓富甲一方。其子车贵抽大烟，倾家荡产，最后抽得家连炕席都没有了。二、三等抽大烟的也很快沦落下来，起初是家财一空，继而卖女卖妻，本人披麻片当小偷最后冻饿而死。

伪满时，开鲁设有康生院，也叫康复院，地址在东街路北（现粮食仓库），一个叫王复的辽宁人当院长，共有工作人员十余名。康生院内是大屋大炕，收费戒烟，给打针、吃药，但往往戒而不绝，今天出院明天还抽，抽烟者不见少却逐日增多。据说盛行时城内有鸦片瘾者大约2000人。农村不论村屯大小，就是十余户的小屯也有抽大烟的。

日本投降，伪满垮台，国民党盘踞时期黑市倒卖烟价大涨，称大烟为“黑金子”。国民党是明收缴、暗自肥，就是土匪也把抢大烟做为重点，为索取大烟竟施以毒刑拷打，甚至烟熏火燎，使人毙命而不顾。

解放初，公安机关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区为单位，由公安助理具体主持，把有大烟瘾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强制劳动，硬性戒除。有的犯了烟瘾哈欠不断，鼻涕眼泪一起流，有的坐立不安，满炕乱滚，有的高声吼，有的低声吟，有的实在难挨，甚至还刮炕洞土吃，其状可笑、可气、可怜，由“鬼”变人真难。一般的十多天过劲，一个月以后身体才逐渐恢复。经人民政府禁烟，有大烟瘾者明显减少，但还不能根除，有的偷种，有的偷用。

1952年全国性的清毒运动进行的较为彻底，县成立了清毒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任正副主任，另有11名委员，下设办公室，室内又设内勤、外勤、审讯、宣传四个组。

通过各种会议，反复宣传党的清毒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并号召贩卖、吸食烟毒者坦白登记，交出毒品、烟具。全县坦白登记的近千入，清出大烟156.4两。

对拒不坦白登记的25名顽固分子，全部集中到县进行短期集训，采取上课形式，讲烟毒危害，动员交出毒品和烟具，对其中6名表现不好的逮捕后转交县人民法院作了判刑处罚。

清毒运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热情支持，他们说：“中国共产党真是伟大，大张旗鼓地镇压了反革命，轰轰烈烈的搞了“三反、五反”，接着又搞了清毒运动，处处为人民办好事”。麦新区有一个叫兰荣的吸毒品者说：“这次清毒运动太好了，我过去扎大烟啥活不能干，连水都不能挑，没钱买烟，我不但偷家里的东西，还偷别人的东西，家里外头谁都看不上我，不用说养活我的老婆孩子，就连我自己也养活不了。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得扎死。”

通过清毒运动，不仅没人吸食，也没人再种植鸦片了。至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加给我们的烟害流毒在开鲁绝迹。

十三年血泪史

吕景清

1933年3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血腥统治开鲁13年。开鲁县人民饱尝了亡国奴之苦，过着任人宰割牛马不如的生活。为了使青年人了解这段国耻民恨的历史，笔者搜集部分资料整理如下。

(一)

1933年3月，日军占领开鲁后，网罗汉奸、走狗成立了伪“县公署”，旧商务会长姜明远为日军侵占开鲁斡旋有功，被日军委任为县长，日本特务机关的寺田茂七任参事官。开始，伪县公署只拼凑了二个科，即内务科和总务科，科以下设股。不久，又增设了警务科、行政科、实业科。各科、股都委任一个日本人掌握实权。

1933年3月，日军侵占了热河省后，将西拉木伦河一带划为兴安西分省。省公署定在巴林右翼旗王府所在地大板，根据当时的情况，省公署没去大板，暂设在开鲁信成东粮栈处（今明仁供销社）。兴安西分省统辖六旗二县：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奈曼旗、克什克腾旗、巴林左右二旗、开鲁县、林西县（翁牛特旗开始归兴安西分省管辖，不久就划出了）。1934年12月1日，将兴安西分省改为兴安西省，“省公署”正式定在开鲁，在开鲁城内既有伪“省公署”，又有伪县公署。为了强化统治机构，日本侵略者还加强了基层政权的

建设。1933年至1934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在一些地区首先建立了保甲制度。1935年间，开鲁县在农村设有八个保公所，保长由地主出任。1936年，开鲁县进一步推行保甲制度，即每十户居民编为一牌，一个屯为一甲，一个警察署所辖区域为一村。设村、甲、牌长，实行“一人犯罪，十家连坐”的统治法。全县将保公所改为村公所，在农村建立九个村公所，村长由地主出任。九个村公所分别为：金家店、道德营子、东扎兰营子、西扎兰营子、三道湾子、富通镇、坤都岭、陶官堡、双四台村公所。开鲁镇为开鲁街，辖崇仁、耀武、正义、宣威四个区。街、村公所设街、村长一人，助理员（副村长）一人，司计一人。街、村公所内设总务系、动员系（兵事户籍系）、财务系、实业系、防疫保健系。各系设主任一人，下有三名办事员。街、村公所内还有“协和分会”、“青年训练所”、“兴农办事处”等。

村公所以下设有屯公所、甲，一般每村分八个屯，每屯各设屯长（甲长）一人，管帐的一人（也叫书记）。屯以下每十户为一牌，选有牌长。这些机构的头头、办事员，通过分配生活物资、征兵、抓派劳工、进出户口等对劳动人民进行敲诈勒索，肆意盘剥。

与保甲制度相辅相成的是归屯并户。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便于统治，推行保甲制度，实行并村、户，将小屯并为大屯，稀疏的居户一律搬到指定的地点居住。当时，很多农民被撵出家院，人们恋恋不舍地观望着自己居住多年的旧房子不愿走；伪警察跳上房去拿镐乱刨房顶，硬性拆毁，或者放火把房子烧掉。被强迫搬迁的农民经济损失惨重，很多人没房子住，只好几户挤在一起住。

在归屯并户推行保甲制度后，于1940年日本侵略者实行“国事调查，”对所有的人进行编号码、挂牌子、照像片，采取发国民手帐、劳动票、出门证等办法进行控制。

开鲁县公署成立的同时建立了开鲁县警察署。刚建立时仅有署长一人，文书一人，巡官二人，开鲁街四门各设派出所一处。伪警察多数是旧民国时期的兵痞爪牙。警察署的大权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指导官手中。为了培养汉奸走狗，1935年在开鲁成立了警察学校（在今食品公司饲养场处），校长是日本人盘井。警察学校训练一批具有治安知识与特务常识的为日寇效劳的忠实奴才，大部分人都是地主子弟、旧警察、有点文化的地痞流氓。1936年日本侵略者扩大警察权利，推行警察控制法，在伪警察署内增设机构，添加人员。警察署内设警务系、保安系、特务系。在农村五个区分别设有警察署，五个警察署又分别统辖着十个警察派出所。日本侵略者把在警察学校精心豢养的汉奸与走狗安插在警察署和派出所。警察署与派出所的职责范围很大，警察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日夜在人民群众中嗅来嗅去，查辑所谓“经济犯”、“嫌疑犯”、“思想犯”等等。日伪警察厚颜不惭地自称是：天皇陛下的警察官。他们一方面控制着广大老百姓，一方面要挟着伪职员；经常制造黑名单，采取种种恶劣手段给一些老百姓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敲诈勒索、草菅人命。1939年秋，日本宪兵队带领伪警察，到各户清查户口，搜查枪，如果警察说你有枪不交，那就要遭毒刑，如什么灌火油、压滚杠、跪碗碴、举秫秸、翻肋条、坐火车（放在锅腔上用火烤）等等。警察的汽车一进村，老百姓吓得心惊肉跳，面如土色，唯恐“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黑龙坝忠厚村有个叫周凤鸣的，家里原来有条枪，实际早已卖了，可是警察非

和他要枪不可，没枪就给他灌火油（煤油）和辣椒水，用火燎胸膛，周被折磨的脑袋肿得象小水桶，身上烤的象鱼鳞，病倒在炕上一年多，差点送了命。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日本侵略者占领开鲁初期，驻开鲁的日本兵并不多，为了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他们组织了自卫团。团长由县长兼任，副团长由汉奸温某充当。全团共有366人，团部设在县警察署的后院，经费由各区农民负担。自卫团都是骑兵，搜罗了一些地痞、流氓、走狗为骨干。各区村公所在广大群众中强迫抽拔团丁，组织区自卫团大队，归县自卫团领导。如果抽上团丁不去，或是反对抽团丁，就被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施以毒刑。1935年日本宪兵队和关东军一部进驻开鲁，这时取消了自卫军团。日本宪兵队就是一座杀人不眨眼的地狱。宪兵队豢养了大批特务、密探和走狗。老百姓中、群众团体中、宗教集团内、甚至伪傀儡政权内，也常有日本宪兵队活动。如发现稍有可疑者，那人便大祸临头，被抓进宪兵队，轻者被打得残废终生，重者惨遭杀害。1936年，城内有一家商号经理得罪了宪兵队的特务，被扣上嫌疑犯罪名，关进宪兵队，受尽了种种酷刑，后经家里人多方周旋保出来时，因负刑过重不久就死了。1942年，县兴农合作社张林标和崔嘉祥，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他俩的总部在四平，因叛徒告密遭到破坏。驻开鲁的日本宪兵把张、崔二人和有关参加活动者全部逮捕，伪机关内的工作人员都成了“反满抗日”的嫌疑对象，警察特务整天调查职员的身世、履历和平时的表现。伪协和会有个翻译叫刘昆被误认为政治犯，关进监狱后打得死去活来。警察特务乘机敲诈勒索，吓得人们不敢讲话，整天提心吊胆。老百姓称日本宪兵队是“杀人工厂”、“阎王殿”，就连汉奸走狗都说：“宪兵是

见官大三级”。

(二)

日本侵略者一手把握着各级行政统治大权，一手控制着财政金融的命脉。他们将旧民国时期的税捐局加以扩充，在旧税制的基础上，象吸血鬼一样又增添了数十种新税目。如：物品贩卖业税、饮食业税、承揽业税、印刷税、旅店业税、理发业税、澡塘业税、卖淫税、代理税、法人所得税、营业税、游兴税等等。随着税目的增加，税率也无止境的提高，有的税率高达百分之百，最低的也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特别是日军大肆侵华后，和所谓大东亚战争白热化时期，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对被占领区人民进行掠夺，全县的税收总额急剧上升。下表为日伪时期全县税收总额部分年度表。

| 年 份 | 税收总额 (元) |
|--------------|----------|
| 1934 | 44,458 |
| 1940 | 56,000 |
| 1941 | 72,000 |
| 1942 | 90,000 |
| 1943 | 137,000 |
| 1944 | 154,000 |
| 1945 (1—6月份) | 90,000 |

日本占领开鲁前的1930年全县税收总额为27,765元。日本侵略者除通过税收掠夺广大劳动群众的血汗外，还通过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兴安西分省开鲁支行以存款放贷的手段进行

勒索。用强硬手段大发种种公债和彩票。如：邮政储蓄、“爱国（指伪满洲国）公债”、大东亚战争储蓄、兴民储蓄及福民彩票等等。

为了控制全县农业经济命脉，加紧对农副产品的掠夺，在1939年建立直属伪中央兴农部领导的金融合作社，后改成兴农合作社。日本侵略者规定了“出荷粮”制度，强行征购粮食，不管年景好坏，收成与否，必须按规定的数交纳粮食。老百姓风里来，雨里去，千辛万苦生产的一点粮食和畜产品，除了缴纳地主、牧主的地畜租金，所剩无几。再加上奸商的欺骗剥削、交纳日本侵略者的出荷粮和苛捐杂税，只得过着“肚里糠和菜，身上肉迎风”的日子。交出荷粮略有迟缓，轻者骂，重者打，再者被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带上手铐脚镣，蹲监坐牢，遭受刑罚。

1944年是开鲁县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之年，从春天到秋季滴雨未落，种子埋在地里不发芽，野草刚刚长出来不久旱得黄焦焦的死去。老百姓每天都望着火辣辣的太阳叹息，渴望甘露救生。许多农民家一粒粮食吃也没有，向地主借，多数地主一看年景无望，多大利息也不借粮。有的地主说：“犁杖倒挂三年也没关系”。他们手中有粮大放高利贷乘机发财。贫苦的人们爬遍了沼坑野地挖不到一簇野菜、草根，把能吃的树皮全剥光了充饥。到了秋天满山遍野光秃秃的，为了活命，很多人被逼得卖儿卖女，丈夫含泪抛爱妻。讨要无路，借贷无门，许多人饿得爬不起炕，想喝口水也无力到井边去提。十七、八的大姑娘只要给一顿饭吃就嫁给谁，也找不着个主。很多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富通镇老崔家六口人饿死了五口。就是这样，日本侵略者逼粮、地主讨租还是毫不放松。十冬腊月，数九隆冬，许多穷苦的农民被逼得

偷偷离开家门，去投亲找友，逃荒要饭，处处可见冻死、饿死的尸体。有个外号叫李大晃的卖尽了全家的物资交不够出荷粮，最后一家三口人活活饿死了。原麦新公社太平庄的王老太太就是这年冬天将三岁的小儿子卖给了地主，只换半斗糠秕粮食。第二年正月又卖了七岁的大儿子，只换得一顿饱饭。王老太太以后一提起这段往事就伤心得泣不成声。

由于1944年大旱，伪政府从吉林、黑龙江调运一批粮食。粮食运到通辽后怎样拉回开鲁呢？各村公所、街公所负责调查，按地主招青人数把粮食分配在地主名下，让榜青户替他们去拉。

1945年正月末，几十辆开鲁拉粮的牛车出现在通辽到开鲁的大道上。天刚朦朦亮，西北风渐渐地刮起来，越刮越冷，人们赶着车勉强地走到半截店东，突然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打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喘不出气来，大白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分不清东南西北。拉粮的人只好把车上的口袋搬下来挡在车轮旁，人趴在车底下躲着。狂风象要撕碎麻袋和木车似的怒号着，从当天早七点一直刮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才渐渐地平息下来。这时，象蜗牛般蠕伏在车底下的人被冻僵了，口鼻塞满了沙土，肚子膨胀很大，奇形怪状，惨不忍睹，多数人再也爬不起来了。五区地主张兰亭的一个榜青拉粮人冻死在路上，抛下白发苍苍的二位老人和弱妻幼子，死者含悲地下，生者啼哭饥寒……

从1939年以后，日本侵略者物资极度匮乏。于是，推行了物品控制，对棉布、食盐等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制度。配给对象分为几个等级，中国人列为最低层，配给量少质劣，成年人与儿童每人每月仅配给粮食20斤，除年节配给2斤面粉外，平日细粮是罕见的，日常配给的杂粮面粉内，都掺着很

多的橡子面。人们吃了不是胀肚就是大便阻塞。有的人家生病长灾托人借或买点细粮，也象偷盗似的小心谨慎；如果一旦被警察发现，不是借机勒索，就是遭到毒打给予没收，再则以经济犯的罪名抓去蹲牢房受惩罚。

1940年，日寇更加勒紧了套在人民脖子上的绳索，严格了生活必需品统配制。在用品方面，日本人的供应机构采取消费组合，一般商店成立了“小卖联盟”。这样，日本人牢牢地控制了商品流通大权，限制了民族资本经济，残酷地掌握了粮食市场，卡住了农民咽喉。农牧业产品必须在指定收购机关出售，否则不售予一切日用品。日本侵略者不仅尽力压低农牧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且极力提高工业产品的出售价格。从部分工农业产品的差价上就可以看出广大农牧民受苦之深了。如：一头140公斤的牛，只能换一块砖茶，一石粮食仅能换几尺更生布。棉麻类工业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以农民出售粮食的多少配给一定的数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除了交租、纳“出荷粮”、还高利贷外，根本没有什么余粮可卖。只好看着日用品“望洋生叹”。很多农民冬无棉、夏无单，两口子穿一条裤子，全家盖铺草帘子。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光屁股，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一丝不挂不敢在人前站的现象屡见不鲜。

开鲁县是兴安西省各旗县农、牧、副产品集散地，又是向通辽、四平、朝阳、沈阳输出商品的门户。日本侵略者每年都将大批的牛、羊、粮食、药材等从开鲁运到沈阳，其中大部分商品经由大连运往日本。根据当时日本人的调查资料表明，每年大约从开鲁运走高梁500000石、荞麦1000石、瓜子150000石、大豆20000石、谷子10000石、糜子20000石、小麦2200石、玉米400石、大麻子500石、小麻子500石、黑

豆500石、绿豆500石、芝麻800石、牛20000头、马300匹、驴10000头、羊2000只、猪10000口，各类皮张13400张。

日军占领开鲁后不仅掌握了全县的金融财政大权，而且拼命向开鲁推销日货，妄图挤垮中国的民族经济。1932年以前，开鲁县各商铺经营的大部分工业品都是上海和天津的产品，只有少量的日货。日军占领开鲁后，用税收制度一卡，日本商品以惊人的速度充斥整个市场。全县商品销售额共44万元，其中日本商品销售额为24万元，占60%。日军占领开鲁几年后，日货就占整个市场的80%以上。如布匹(洋布)、钟表、锁头、刀具、钢笔、油漆、铁钉、陶瓷器具等都是日货。

(三)

日本侵略者一方面运用法西斯军事暴力，一方面搞奴化教育，削弱人民的斗争意志，积极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战略，提倡所谓“日满协和”、“共存共荣”。在1938年组织了所谓代表民意的“满洲帝国协和会开鲁县本部”和各基层分会，并拉来一些地主豪绅、资本家做为协和会委员，以撑其门面。协和会由伪县长任名誉会长，日本人任理事长。协和会积极宣传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思想。协和会的纲领中写道：“满洲帝国协和者，乃为一永久、举国一致之实践组织体，与政府表里一体。(一)建国精神之宣传。(二)民族协和之实现。(三)国民生计之向上。(四)宣德达情之彻底。(五)国民动员之完成”。伪协和会县本部下设“青年训练所”，向广大青年，主要是当伪国兵的适龄青年灌输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思想毒素，进行奴化教育。伪国兵法规定：检查合格的青年为国兵，对于检查不合格的适龄青年

必须编成青年“勤劳奉仕队”，强迫青年接受军事训练和做苦役。每人每年必须进行六个月以上的训练，每年一次，连续三年。

“勤劳奉仕”队采取军队性质的编制，分为大队、中队、小队。队长由日伪精心豢养的忠实走狗担任。他们用暴力强迫青年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劳动在14个小时以上，中间不能休息。有的人有病或体弱难以支持，稍有怠慢就要遭受棍棒的毒打，肿腿坏手也得挺着干，不少人死于工地。不管严冬酷暑永不停工，有时距坝三四里路去挑土、抬土，队长用棍棒指挥，一天到晚吆喝着：“满满的装、快快的走”，吃饭时间就算是休息了。苏家堡河堤姜家大坝几十里长，都是“勤劳奉仕队”修筑的。“勤劳奉仕队”伙食每天只喝三顿稀粥，没蔬菜，每人只给二三十粒盐豆，吃饭前要进行默祷，意思是感谢天皇陛下的恩赐。

1942年成立了伪开鲁县报社，每日一刊《开鲁日报》，宣传所谓“大东亚圣战之战绩”，恫吓欺骗开鲁县老百姓，诬蔑和贬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战果和民众抗日热情，企图削弱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抗日的意志。

1936年，在伪县公署内设立了教育股，王占山任股长，祖父岩芳雄、桑原拜俊正、何田三郎三名日本人为指导。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在每个学校都增添了日文课程，并规定教学以日文为主。会日文者，在社会上给予种种方便。学生期考与升学考试时都以日文为主，不管其它科如何低劣，只要日文好就可录取，伪满时期学校使用的都是改编了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课本。优级以上的学校，内部规定有日语会话日，学生见老师或者互相见面时，都必须以日语互相问候。否则，被视为思想不良或有违校章，轻者给予体罚，重者遭

受迫害。日伪统治者积极地硬性地在学生中灌输忠于“天皇”和“康德皇帝”陛下的思想，企图把学生训练成为忠诚的奴隶。学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每日晨起，第一项便是背诵所谓的“国民训”和“访日回国诏书”，并向东方遥拜。每日三餐前都要强迫学生默祝三分钟，表示感皇恩颂德政。学生每逢路过神社，定要躬身祈拜，提倡信奉“天照大神”。否则，便被诬为有失帝国公民之德而遭受责难。

(四)

1940年全县开始执行劳工法。首先是按区、村规定摊派劳工的数字，然后由区村摊派劳工。被摊派去和被有钱人雇出的劳工，去者多，归者少，即或是侥幸回来亦吃尽了苦难，甚至终生残废。老百姓一听“劳工”二字人人畏惧，惶惶不可终日。伪官吏借摊派劳工大发横财。那户派上劳工，如不愿去，多送些钱就可不去。劳工数不够了，他们到处去抓，被抓的对象都是劳而又苦的贫民百姓，年龄在十五、六岁到五十岁之间。有时在市场上或娱乐场所把人抓走，被抓的人和家人告别的机会都不给。有时深更半夜闯进住户把人抓走，送往劳役工地，家里的人不知道下落，妻儿老小生离死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们为逃脱这种大灾祸，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不敢上街，夜间不敢在家睡觉。在春、夏、秋抓劳工的季节，很多人经常昼夜以野地树丛为家。

被抓去当劳工，基本上就是在死亡册上注了名。劳工被送往最危险的工地去做苦役，而更多的是被送往国境线上修筑军事工程，如挖工事，筑碉堡等。做苦役的劳工往往是完成一个地方后，又被送往另一个地方，永不让回家，最后因日军怕劳工泄漏军事秘密而遭受集体屠杀。劳工的悲惨生活

是举世罕见的，他们住的是上漏雨下流水“牛顶架”的草窝棚，吃的是人根本不能吃的橡子面，并且还不给吃饱，穿的是水泥袋子做的衣服，脚上缠着猪鬃草。如果一旦生了病，连吃点橡子面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只好等待着死亡。据逃回来的劳工讲，死者的骨灰箱挂在工地周围的树上，到处都是。被烧毁的劳工尸体堆积的象小山一样。日伪时期开鲁县被抓去的劳工共有2000多名。前几期的劳工大部分死在服役的工地，最后去的一批劳工因为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才得以回到开鲁与家人团聚。但是，这批劳工去了400多名，还死了30多名。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对东北三省的经济掠夺，强迫农民到黑龙江省开荒种地。伪县公署累累征派苦役，加上地主残酷的剥削，使很多农民疲于奔命，男女老幼，全落得赤身露体，最困难户和“黑户”就成了迁民的对象了。

1941年到1945年，开鲁县搞了三次迁民。日伪迁民都是冬末春初开始。说也奇怪，每逢迁民天气总是变的格外的冷。1941年正月有一次迁民，各村、街公所动员系的人和警察押送一批迁移户集中在县公署行政科，准备用汽车把迁民送往通辽，上火车去黑龙江省，预定第二天走。不料夜里天气突然变了，北风呼啸，雪花纷扬，马棚里的马冻得哐哐乱叫，汽车的铁板一摸就粘一层皮。天明雪住，寒风凛冽，唾沫落地成冰球。行政科负责人见此情景心也软了，请求等好天再走，可是副县长岩崎(日本人)等人声色俱厉地说：“不行的，快快的走”。这批迁民面如土色，身体枯瘦如柴，破烂着身，有的上身披着破麻袋，下身穿着缀了又缀的破羊皮裤，大点的孩子穿着好心人送给的破棉袄，小点的孩子用麻袋片裹着，贴在母亲的胸前偎着。没等上车，这帮人一见寒

风就冻得牙咯咯直响，浑身筛糠，孩子们冻得呜呜直哭。迁民无奈，长嘘短叹，哭哭啼啼，扶老携幼上了冷冰冰的汽车。车一开动又下起了清雪。汽车带着急风，向前飞驰。行至开鲁东25华里时就冻僵了三个人，停下车扔下三人继续前进，到通辽迁民店时，大人孩子冻得下不来车，扶到店里半天才活过一些人来，差点没全冻死。穷人每听到“迁民”二字就脑皮发麻，不敢得罪地主和村公所的人，更不敢要伪政府的“救济物资”，怕说穷得生活不下去，被列为迁民对象。1944年大旱，伪政府发下一批救济布，说是救济穷人的，可是谁也不敢要，怕被列为迁民对象，后来这批布都被村公所的人分了。

（五）

日本侵略者为了搜刮民财毒害中国人民，于1942年组织了大烟组合。在原种烟土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5000亩，年产约3万两。在伪县公署内增设烟政股，组织专卖局，把原私人烟馆合并，统归国家（伪满洲国）经营。在各区、镇共成立六个烟馆。为具体掌握吸毒者之人数，各烟馆都建立了大烟台帐。当时吸、扎、喝鸦片者很多，差不多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患鸦片瘾者。每当春夏，吸鸦片者体内烟毒溃烂成疮。因吸鸦片导致倾家荡产、卖儿卖女、被冻死在街头巷尾、乞讨要饭者处处皆是。

在日本侵略统治的13年中，开鲁地区鼠疫连年不断。在1938年的一次鼠疫中就有159人丧生。每逢鼠疫发生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不但不予防治，反而假借防治为名把活人做了试验，进行残害。日伪统治者往往以防治疫病蔓延为名，进行整村整屯封锁，被封锁的人们只好困死待毙。1942年，道德

营子一带发生疑似性鼠疫。伪防疫员与日本人便把村民集合一起，强迫姑娘、媳妇脱掉衣服，赤身裸体进行检查，不脱衣服就打。他们用手到处乱摸，污辱妇女。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开鲁的13年里，开鲁县人民的反满抗日活动层出不穷，如：抗丁、抗捐、逃避抓国兵、抗出荷粮等等，还有少数人拿起武器袭击日本汽车，或写“天书”诅咒日本必亡等。由于当时开鲁地区没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都是民间自发的，没有形成较大的运动。

我在开鲁兴农金库的遭遇

张 雪 中

1945年，日本侵略者末日来临。他们在垂死挣扎之际更加穷凶极恶。为了镇压人民起来反抗，颁布了战时特别刑法，疯狂地采取特务恐怖手段，逮捕和屠杀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一时间，许多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惨遭逮捕、刑讯和屠杀。据我所知，仅在开鲁街光复前夕就有上百名各界人士被捕。有的被弄到外地惨遭杀害，有的就地关押审讯。

本文忆述的是我本人在当时的一场悲惨遭遇。

一、晴空霹雳

1944年秋，经人介绍我考入开鲁伪兴农金库当佣员（勤杂员）。当时仅16岁。因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对中国人民残酷压榨的步伐，数月后谋划将伪兴农金库与银行合并（实际上撤消开鲁银行），机关迁到原银行旧址办公（开鲁街东门里路北）。

该金库与银行合并，实际上是向银行夺权，进一步控制兴安西省（开鲁当时为西省省会）金融的具体手段。因原开鲁银行从领导到职员还没有一个日本人。新设的兴农金库的支店长（相当行长）山崎权兵卫，支店长代理（副行长）有井秀男、庶务系长（人秘股长）若山茂都是由伪首都新京（长春）派来的日本人。两单位合并后，上述负责人原封未动，只纳入一名叫刘济众的中国人（原为银行职员）任支店长代

理。

也许由于我能讲比较流利的日语，加上在学校学过一年商业知识（簿记和珠算），合并后不久被调到预金系（存款股）做业务工作。当时金库设有庶务、国库、会计、预金等六个系，其中有六名日本人和一名朝鲜人。他们的分布是：除上述负责人之外一名叫作田中美美子的日本姑娘在人秘股作若山的助手，其余都在预金系任职。朝鲜人松都禎次（用的日本名字）任预金系长。他是跟随支店长山崎从东部勃利调来的。他精通日文，能讲汉语，只是以讲朝语为耻。另外两人为伊藤静子（21岁）、山川稜威子（19岁）。这个系只有我们两名中国人，另一名叫谷文库（21岁），他是大连人，通晓日语。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松都、伊藤、山川联系自然较多。他们相互讲话我都能听到。我常与他们讲话，但很少涉及时局形势问题。1944年冬以后，他们相互谈论形势的时候多起来了。尤其松都这个人，他当时虽然属二等国民，可他关心形势不亚于日本人，而他是唯一跟我讲形势的人。他曾几次用手做着“八”的手势（指八路军），谈八路如何厉害，他们非常害怕等等。有时也向我探听消息。而我一是确实知道得很少，二是即使知道些也不敢跟他说。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在高压下生活，已养成了缄默、自卫的本能。只记得在看了电影《万世留芳》（当时上影拍的反映林则徐反英焚烧鸦片故事的）之后，由于过分激动，跟他谈过称赞林则徐讲的“中国人有骨气不甘当亡国奴”的话。以后，日本宪兵到处乱窜，调查看过《万世留芳》电影的人和反映，使我后怕不已。

尽管当时坚持“闲谈莫论国政”，唯恐谈话走嘴招惹是

非而特别小心，而想不到的祸事还是从天而降了。

1945年2月的一天上午，开鲁伪警察署司法股长高国祥和特务股长乔文来到了兴金农库支店长山崎的办公室。他们谈了一会儿之后，便来到我的跟前，叫我跟他们去一趟警察署。我到警察署后便被拘留起来。直到住进拘留所后几天，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听有的警察说金库丢了一万块钱。我想这跟我怎么也沾不上边呀，我一不管出纳，二没进过金库。再说也根本没听说金库被盗的事呀。又过了两天，高国祥和乔文把我提出来作第一次例行公事的审讯。他们倒是没有为难我，只是轻描淡写地问我知不知道金库丢了公文夹，是否我拿去了。我说我没听说过，我根本没拿什么公文。就这样把我又送回号里。这回我可是有些慌了，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丢失案呀，尽管与我无关，可是究竟为什么单把我抓起来呢！莫不是有什么人说了我的坏话？这可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哪。又过了两天江岛洋服店的经理江岛（朝鲜族）因经济犯也关进拘留所。因他常到金库存款和我认识，他一见我就说：你的问题很严重，日本人都说你是“斯派”（间谍）。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大难临头了。我当时还仅在日本人的大肆宣传和道听途说中听到过有关间谍的事，当时在开鲁还从未听说有过间谍的事呢。

二、17岁的间谍嫌疑犯

从此我便六神无主了，我才只有17岁呀。我怎么能成为间谍呢？但自己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想不管怎么说，日本人认为有间谍嫌疑，即使满身是嘴也是说不清的呀。从此精神上背上沉重的包袱，只想我这短促的一生算是完结了。严刑拷打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我怎能讲得清楚呢？

就在我被提审后两三天，令人惊异的是高国祥和乔文俩人，竟遭到和我同样的命运。他们都换上便衣被关进拘留所。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对我的精神压力。我胡思乱想起来，他们怎么也在这时候进来了？难道因为前天对我提审过分宽容了，还是因为别的事呢！

可怕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大约又过了三、五日，日本警务股长关川喜兵卫和日本人警长石本提我过堂了。他们在桌子上放着两份地图。问我这地图是做什么用的。我一看一份是我在小学读书时用的伪满洲国全国地图，另一份是金库与银行合并时在废纸堆里拾到的全国银行分布图。我知道这是从我家里抄来的。我便如实地说了，这只是我学习用的。他们便凶神恶煞般的“巴嘎”、“巴嘎”地骂着，操起警棍（一种审讯时用的水曲柳木棍）开始用力地打我的胳膊肘，一面吼道：“快说地图是干什么用的？你把公文拿到那里去了？”我的胳膊象触电似的立刻由疼痛变得麻木，怎么也抬不起来。我又重新说了一遍，并说根本不知道公文的事。

于是他们就把我带进刑讯室，不由分说地把我捺到凳子上，手脚绑住，头垂到凳子下面，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壶凉水提起来往我鼻子里灌。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灌凉水的滋味。开始只觉得喘不出气来，脑袋疼得要炸裂似的。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两头野兽一面动刑竟用汉语唱了起来：“自在呀，自在呀，喝凉水自在呀”。当听到他们唱时，我真是怒火中烧，心想这群野兽把中国人欺凌污辱到什么程度了。当大约灌完一大壶水之后，我已神志不清了。他们用手又往我脸上泼水，当我醒来后又继续逼问我。为了暂时逃避这场灾难，就说拿家去烧了。他们又问文件夹上的铁夹子放到哪里了，我说扔到院里灰堆上了。最后总算又把我押回拘留室。

从此，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尤其当想到年迈的穷困而又可怜的父母，家里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我，这他们唯一指望的儿子要是死了，他们可怎么活呢！尤其第二天当我父亲去看望时，一个姓韩的警长说道：“快看看你儿子吧，昨天差一点给灌死！”我不知道他说这话的目的是幸灾乐祸，还是同情。但在我年迈的父亲面前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无疑是增加我们父子的精神压力呀！果然在我出狱后不久，我可怜的父亲竟精神失常了，光复时他已神志不清，于1946年悲惨地死去。

在这次刑讯后大约又过了二十几天，金库支店长山崎和关川到拘留所来。山崎是来接我回去的。在离开之前，我简直不敢相信是放我出去。关川还装腔作势地训斥了我一顿。说什么我以前不老实，不好好工作，今后不老实不好好干不行等等。

三、不解之谜

当我回到机关之后，才从同事那里听说公文已经从兴农合作社的仓库的卷柜里找到了。原来兴农金库开业时的地址是在合作社的前院，临时跟合作社借了一个卷柜装公文。这就是说公文负责人若山茂当返还卷柜时由于工作马虎，把一卷公文落到卷柜里了。后来多亏合作社的人收拾仓库时发现了。听了这话的当时，我根本没怀疑这个事实，只感到保住命出来，比什么都强了。可是过后经我一回忆，此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卷柜送还时是我和姓蒋的工友俩人抬去的。由于不便于抬，记得曾把卷柜门打开过。如果里面有厚厚的一卷公文能会不被发现吗？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可以说是个不解之谜。时间已经过去43年，我想这个

谜更没必要去解了，就把这笔账记在日本法西斯身上好了。

在我被关押期间，我父亲到处求援无门，奔走呼号。几次找过我到金库的介绍人，兴农合作社的职员叶青钱，请求他给询问一下捕我的原因。据叶说他真的去询问过金库的负责人，他问金库三、四十名职工，为什么偏偏抓了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呢？而回答只有三条：一是我年龄小而比较聪明；二是能讲比较流利的日语；三是值宿当班。意思这绝不是一般的案件，叶也就不敢深说了。实际上把上述三条作为怀疑的依据，纯属无稽之谈，前两条不能成立自不必说，第三条也是胡诌，根本不知道哪天丢了公文，跟值班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值班的也并不是一人，还有专门警卫呢。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14年的统治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磨难，更是一言难尽的。我所遭受到的这场悲剧，也仅仅是千百万件中的一件罢了。

少年时的一段苦难经历

张 连 学

逼 进 白 狼 沟

1945年，我刚满16岁，在王爷庙（乌兰浩特）育成学院读书。那年，学院共七个班，一、二、三年级各两个班，四年级一个班，总共大约三百五十名学生。日本侵略者把我们当作奴隶，逼迫我们到兴安岭扒桦树皮，美其名曰“勤劳奉仕”。四年级去老头山，一、二、三年级一部分去牛汾台，另一部分去白狼沟。我便是去白狼沟的一员。1945年端午节后不久，学院主事洪沟（日本人）下令，各年级学生做好准备，不准请假，不准掉队，去兴安岭勤劳奉仕。没过两天，由日本老师带队，分批去了兴安岭。我们则由森山（日本人）带队乘白阿线火车进入白狼沟，傍晚时分到达白狼北林组报到（北林是日本柜头的名字）。第二天将我们便编队进山。森山在讲话中“鼓励”我们一定要拿出“山本”精神。进山这天，乌云翻滚，整个天空象要坍下来似的。汽车刚上路，便下起了倾盆大雨，不一会衣物全被浇透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奔波，到了兴安大坝南麓汽车站，开车的是个日本人，叫我们统统下车。同学们各自背着湿透的行李，步行走进深山老林中，过兴安大坝十多里路，便到达了勤劳奉仕的地点“协儿罕”。这时天已开晴了，于是我们便忙于安排住处，先砍了些桦树杆搭起了棚，然后扒些桦树皮钉好，又胡乱找些干草垫好铺，就算是住下了。第二天便开始了紧张而繁重的

劳动。

“协儿罕”困境

“协儿罕”是黄色的悬崖绝壁，故名为“协儿罕”，地处大兴安岭北麓。这里人烟绝迹，群山环抱，树木蔽天，杂草丛生，是狼虫虎豹、黑熊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毒蛇更是遍地可见，有时夜里爬进被窝里。有一名同学在劳动中不慎被毒蛇咬伤，送到百里外的白狼沟医院，未得抢救便去世了。

我们一天三顿吃的是发霉变质的玉米面大饼，咸菜是海带根子，烧的劈柴拌子，山野里到处生长着蘑菇、木耳、黄花，可是没有咸盐，就无法吃。在这种非人的生活条件下，我们的劳动极其繁重，每天每人必须完成一百斤桦树皮的任务，由日本老师森山监督过程。除二、三年级的同学能完成任务外，一年级的同学是很少能完成的。接近完成的罚站，差得太多的打嘴巴。

扒树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刀子不大，刀柄有一丈来长，桦树长的老高老高的，伸直了手臂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扒下一张，而且是很薄很薄的。一张一张扒下来后，再用草绳子打好捆，然后拨开溜腰深的草丛，一步一步地背下来。每天都是汗流浹背，泪水淋淋。

说实在的，在那深山密林中如果继续干下去，不死在日本人手中，也得被野狼吞掉。于是我们也想逃跑过，可在那人烟绝迹的鬼地方，你又往哪跑呢？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辛劳动，同学们面黄肌瘦，体质明显下降了。

坎坷归途

8月7日这天，日本老师森山下令，让我们准备回校。

同学们欢天喜地，这下子可熬出了头，恨不得马上离开那个鬼地方。我们整好行装，一夜没睡。8月8日东方欲晓，同学们就在森山的带领下出发了。恰好这时我和三年级的宝音巴特、二年级的贺喜业拉吐同时得了感冒。要回校了，我们再三恳求森山老师带我们一起回白狼沟，可森山说什么也不肯，说我们是病号，一起走会影响同学们的进程，并假惺惺地安慰我们，等到白狼沟后来车接你们。就这样，把我们三人活活地扔在深山老林。三个月是熬过去了，可这一夜真难熬啊！大队人马一走，山林寂静得可怕。等一天，盼一夜，汽车影音皆无。夜幕又降临了，山谷里不时地传来狼的嚎叫声和山鸟的怪啼声，吓得我们三人把门死死顶住，挤在一起一夜没睡。

第二天刚黎明，宝音巴特就说：我们别傻等了，情况不好，可能出事了，宁可往前爬着死，也不能在这等死呀。于是我们三人便背起简单的行装，艰难地上路了。当我们走到兴安大坝岭上的时候，就看见飞机接二连三地在天空盘旋，轰炸声响彻山谷。战败的日本兵正在狼狈逃窜。有的坐汽车，有的骑马，也有的步行，谁也不顾谁了。我们走着走着，正好碰上兴安学院的学生，便同他们一起搭伴。渴了喝口泉水，饿了拣把野菜。夜晚露宿在路旁的山谷和树林中，相互挤在一起取暖。山区的夏天，阴雨连绵，气候像猴子脸，说变就变，几乎是没有开晴的时候。幸好有桦树皮夜里搭在身上遮雨挡寒。就这样足足走了十多天也没有遇到村屯人家。当走到索伦马场时，碰上了日本人扔下的大米和“令当麦”。可下见到了吃的，乐得不得了，于是我们除了装满随身带的米袋外，还饱餐了一顿。接着又继续向东南方向奔去。大约又走了近两天的时间，在烧下晚火的时候，来到了

扎赉特旗西北边境的一个只住四五户人家的洁日根吐屯。

多少天没见人家了，偶尔遇到一个村落，真是喜出望外。当我们进屋求宿的时候，一看，满屋子都是逃难的学生，还有几个受伤的日本兵，两手攥着手榴弹。屋里没有呆的地方，我就蹲在灶坑门旮旯里，边烤火边休息。吃点饭根，喝点米汤，身上感到热乎乎的，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直到天亮才醒来。多少天在山谷里露宿，一碰上屋子，哪怕是蹲在灶坑边也睡得香。再往前走，十里八里，就是山沟小庄，三户五家的牧民农舍。

遇到好心的老人

当走到珠日干义玛吐村时，遇到一户姓王的人家，这家老人没儿没女，只有老夫老妻相依为伴。这时，我们同行的三人就剩下我和宝音巴特了，贺喜业拉吐已随同乡学生奔前郭去了。好心肠的两位老人留我们俩吃了一顿饱饭，又同情地问这问那。瞧我俩的鞋都坏得没样了，脚上打的都是泡，老人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就说：“可怜的孩子，你们歇歇脚再走吧。”一听这话，可把我俩乐坏了。宝音巴特扑通一声就跪下磕头，我也随着磕起了头。就这样，我俩被这一对好心的老人收留了下来。老人对我俩特别热情，就象亲生父母一样。白天砍柴领着我们。为了少给老人增加负担，我们俩也经常拣些蘑菇和野菜。一晃冬天到了，可我们的单装又怎能挡住那呼呼的北风呢。再一看，两位老人也都穿着麻袋片裤子，炕上只有几块枕木，哪能补充我俩的衣着呢。没过多久，刺骨的严冬逼近，身上无棉衣的我们俩，相继得了伤寒病，偏僻山村没医没药，两位老人急得不得了。看我们发烧得那样，只好想法吃点催汗的偏方，盖上几块麻袋片，

通辽沦陷时期的国民党

地下组织

杨德田

我出生于哲里木盟通辽县（现为通辽市）杨金屯，曾在伪满通辽县公署实业经济股当过吏员，因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地下抗日工作，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关押在伪满兴安总省所在地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狱。日本侵略者在其残酷统治宣告结束的前夕，曾疯狂地屠杀了我的一些同仁。我有幸在厄运到来之前逃出了虎口。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45年了，但是，我耳闻目睹侵略者所犯下的罪行及通辽人民的抗日壮举，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本文忆述的是在日本侵略者残酷统治通辽之时，参加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青年，反抗侵略者的史实。

1942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从重庆派罗大愚（原名罗庆春，辽阳人）为东北（辽宁）党务专员，到东北建立国民党地下组织，进行抗日活动。他到达东北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物色抗日同志，吸收党员，开展抗日活动。在新京（今长春）、哈尔滨、四平、沈阳、锦州、安东（丹东）等大城市，先后建立了国民党地下组织。1943年在长春成立了“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亦称“辽宁党务专员办事处”，罗大愚为办事处负责人。

1944年春，当时在伪通辽县公署实业科任技士的王文民

（化名任再生，28岁）回铁岭老家，与他的同乡好友、在哈尔滨工大的老龙相遇。经老龙的介绍，王文民加入了罗大愚领导的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地下组织，并受命回通辽，暂以“通辽抗日光复社”名义，秘密物色同志者，发展党员，进行抗日活动。

王文民回到通辽，在交通门外家畜交易市场办公室，单独让陈玉佩（伪县公署实业科的委任官试补，化名再立，30岁左右）写了入党申请书和誓词，举行了宣誓仪式，正式吸收他为国民党党员，参加地下组织抗日光复社（几天后又改名为抗日复兴社，因蒋言斌的那个组织叫抗日光复社，以示区别）。

接着我和王文民、陈玉佩一齐来到交通门外家畜交易市场办公室。在他俩的介绍下，我填写了入党申请书、誓词，举行了宣誓仪式。当时，我年仅23岁，化名孙继行，简称继行。

随后，尹广惠（化名中一，郑家屯人，伪满国高毕业，伪满第9军管区司令部委任官，二十七、八岁，国民党37分部党员）等相继参加了复兴社。

1944年，蒋言斌（化名维中，当时23岁，通辽兴农合作社职员）赴四平市，由其同学何广文（化名克默）及王介梅介绍，参加了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领导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被发展为党员，受命回通辽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以抗日光复社的名义，物色同志者，建立地下组织。他回到通辽后，吸收徐鸿章（化名继文，锦州人，兴农合作社职员）、崔嘉祥（化名宏民，开鲁人，兴农合作社职员）等参加了光复社，进行抗日活动。

至此，通辽抗日复兴社、抗日光复社相继成立。复兴社

负责人为王文民，光复社负责人为蒋言斌。通辽地区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总负责人为王文民。复兴社联络地点：交通门外家畜交易市场，联系人陈玉佩。光复社联络地点：振兴街蒋言斌家。省方来人接头地点，一是伪通辽县公署实业科找王文民，二是城东巴家围子采种圃找王文民。

这阶段光复社、复兴社主要活动是：阅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小册子）；物色抗日同志发展组织，提交“物色统计表”，办理入党手续；寻机对日伪行政工作设置障碍，尽力为群众减少苦难。王文民指示我以筹备经费为主，故称我为“经建”主任。

抗日复兴社、光复社以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打倒日本侵略者、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为宗旨，所以，发展很快，人数迅速增加。

由于当时形势的险峻，为使国民党地下组织更好地在通辽地区开展工作，一个融指挥部、联络点、地下办公室为一体的“伪家庭”，出现在通辽城内小街基露天市场东十路口西南角不远的三间土房里。这个伪家庭成员是：

户主王志诚，30岁左右，沈阳人，初中文化，职业是南顺区公所事务员。

户主之妻王陈氏，25岁左右，家庭妇女，有一个两岁小孩。

户主内兄赵德成：沈阳人，高中文化，职业是交通门里路东日满商事株式会社职员。

其实，赵德成是化名，他的真名叫韩庭桂，职务是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督导员，驻通辽督导抗日地下工作的。

陈氏叫陈泽丘，也叫博修，是从新京转来的国民党地下

党员。为了方便活动，她佯装王志诚之妻，赵德成就成了她的哥哥。王志诚原名张绪武，化名王晓峰，沈阳人，30岁左右，职务是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省方督导员助理，来通辽工作。

从此，这户人家成为国民党地下组织在通辽地区活动的指挥部。

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把通辽定为重点活动地区，成立了通辽二十支部。王文民领导的“抗日复兴社”改为三十七分部，蒋言斌领导的“抗日光复社”改为三十八分部。不久，在开鲁县设九十七分部，由崔嘉祥负责。

国民党通辽第二十支部组织机构成员：

省方督导员：韩庭桂

省方督导员助理：张绪武

通辽二十支部书记：王文民

三个分部的组织机构成员：

三十七分部负责人：三文民（兼）

组员：陈玉佩（联络点负责人）、杨德田（本文作者）、尹广惠、曾繁硕、李玉秀、郭瑞林、刘孝谦、信淑兰、赵春秀、季守正、王晋宇、张文宏、郭传第、张绪武。

三十八分部负责人：蒋言斌、徐鸿章（化名纪文，锦州义县人，当时年龄约26岁，新京兽医大学毕业）。

组员：关维珍、关维珍之妻、郎式武、王长顺、刘照兴、李继尧、郑玉凤、陈泽丘。

九十七分部（在开鲁县）负责人：崔嘉祥（原在三十八分部，后转移到开鲁，负责九十七分部工作）、单玉清（女，崔嘉祥之妻）、张林标、方中杰。

以上是1944年春至1945年5月末通辽地区国民党抗日地

下组织的全部人员。这些人员分布于通辽地区的伪机关和周围的一些旗县。具体分布情况是：

通辽县公署：王文民、杨德田、陈玉佩；

兴农合作社：蒋言斌、徐鸿章、王长顺、郎式武、刘照兴；

第九军管区司令部：尹广惠、曾繁硕、李玉秀；

通辽兴农金库：郭瑞林、信淑兰、赵秀春；

通辽铁路车站：刘孝谦；

通辽国民高等学校：季守正；

种马场：王普宇；

通辽街南顺区公所：张绪武；

日满商事株式会社：关维珍、韩庭柱；

气象台：李继尧；

小学教员：郑玉凤；

开鲁县兴农合作社：张林标、方中杰；

开鲁县教员：崔嘉祥、单玉清；

舍伯吐警察署：张文宏；

在此还值得多写一点的就是郭传第。当时他在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任宪补，主要任务是探听日军军情，设法掩护其他国民党党员进行抗日活动。对于郭传第的工作，当时二十支部和省方都很满意。

1945年5月31日深夜12点，特务股长剑崎率领一群特务，包围了王志诚的“家”，逮捕了赵德成、王志诚和客人吕文毓，但没有逮捕陈泽丘。陈泽丘趁特务押走赵德成等人之机，抱着小孩逃走了。

警务科司法股长真柴率领一群特务，包围了王文民的家，逮捕了王文民、孙守贤（王文民的对面屋，重要嫌疑犯）。

第二天，通辽城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日本特务机关要抓经济犯的消息，吓得小商小贩躲躲藏藏，国民党员纷纷逃走，如郎武武、王长顺、徐鸿章、蒋言斌、刘照兴、郭瑞林、信淑兰、赵秀春、季守正、刘孝谦、郑玉凤、李继尧等。

我和陈玉佩没有走，继续上班工作，因为相信了组织规定。国民党地下组织是按单线发展的，有纵的联络，但不准发生横的关系，所以只要跑了一个人，住下线就断了，别人是不知道真名实姓的，上级也只知道代号和人数。工作发生破绽不能株连他人。我们还想，王文民等不会供出我们，能潜伏下来还能继续抗日。同时，我又是搞经费筹备的，逃走会连累许多人。于是，我同陈玉佩约定，我们不同时在实业科办公室，互相换着，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出去做文书传阅或别的工作，万一特务来抓人时，也只能抓一个，还能跑一个。这样，我们提心吊胆地生活了一个多月。

6月4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经济股写文件，警务科特务股长剑峙走到我跟前，低声说：“杨德田，请跟我到业务科去一趟。”我立刻明白了，就故意大声说：“好，走吧！”一出实业科办公室门，我一眼看见陈玉佩站在走廊门口，我又大声问剑峙：“股长先生，往楼后去吗？”（这是在暗示陈玉佩立即逃走）剑峙只吭了一声。陈玉佩听到我和剑峙在走廊的说话声后，立刻溜进食堂，从食堂逃走了。

日本人企图把通辽地区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成员“一网打尽”，但仅仅抓到了9人，其余早已逃之夭夭。被捕后，我们被关押在通辽城内的一座秘密监狱里。伪兴安总省警务厅派特务主任大井、监督警尉菊池、金城，还有新京来的两名日本特务，会同通辽警察署受理我们这起所谓“反满抗

日”案件。在刑讯中，我们都遭受了难以言喻的皮肉之苦。

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约10点钟左右，我们9人被日本特务用绳子五花大绑，脸上蒙着黑布，有的还给带上了脚镣，用二马车运到火车站，然后用火车把我们运往王爷庙。到达王爷庙的第二天就开始审讯。我们备受酷刑，有的人挺住了，什么也没有说；有的人经不住惨无人道的折磨，供出了一些情况，致使郭传弟、张文宏、刘照兴、郑玉凤也先后被捕。

这样，国民党通辽第二十支部共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13人，逃走14人，在通辽潜伏的还有3人（包括关维珍之妻）。

1945年7月的一天，我们13个人全部被带上手铐、脚镣，并用黑布蒙上头，推上汽车拉走了。几分钟后我们被从汽车上拉下来推进几个新的牢房里。当把蒙在脑袋上的黑布拿掉之后，我发现我和崔嘉祥住在一个小号，心里想，政治犯多监狱不够用了。后来得知，此处就是特务分室的秘密监狱。

1945年8月12日，天刚蒙蒙亮，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赶着5辆小驴车走到了特务分室的秘密监狱。不一会儿，日本兵把每个单间牢房的门上的小木板拉开，给每个被押的人扔进来一张白面饼。这时被关押在这里的均为国民党二十支部的13名党员和2名女重要嫌疑犯。我们一见白面饼，立刻惊恐不安。在此监狱里，犯人一旦得到好吃的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不是转移就是进杀人坑。不过，人到了此时此刻也就没有什么怕的了。于是各个小号都开始议论起来：“不管怎样，临死前吃他一张饼吧。孝子饼得快吃呀，吃不吃到了钟点也得入殓呀……”

我和崔嘉祥很快就把饼吃完了。这时，走廊传来了日本兵互相低声的问答声：“什么车也没了，三次拉完吧。”

正当我不解其意地猜测着日本兵的问答是啥意思时，“咔嚓”一声，小牢房的门开了一个，日本兵喊道：“张林标出来！”接着，张文宏、关维珍、郭传弟、崔嘉祥等先后被叫出去，每个人都被戴上手铐脚镣，用青布把全身缠上，然后一个人被装进一辆驴车里拉走了。后来得知，这5个人于8月12日在王爷庙被日本特务杀害。

我们剩下的8名国民党员和2名重要嫌疑犯，从门缝目送着这五位同志被拉走。

大约一小时之后，兴安总省警务厅长派日本特务把韩庭桂、王文民从牢房提出去，带到了警务厅。据韩、王二人后来告诉我，当时日本人厅长亲自对他俩说：“原计划把你们这13名抗日分子全部在今天杀掉，但根据现在形势的需要，决定宽恕你们二人，但必须替我们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准备从草地转移，道不熟，语言不通，需要你们二人给作向导。你们能做到吗？”韩、王立即回答：“能做到。但是，你们能不能把牢里的那6个人也放了？他们会蒙语、日语，还能帮助皇军干活。”

时间将至6点，日本特务主任大井、特务菊池把韩庭桂、王文民从牢里放出去，卸掉了身上的刑具。在韩、王的一再请求下，我们6个人，即单玉清、郑玉凤、方中杰、刘照兴、张绪武和我都被放出来，卸掉身上的刑具。

我们从牢房里出来之后，日本兵立刻让我们洗澡、理发、刮胡子，然后换上日本黄军服。接着，伪兴安总省警务厅特务主任大井把我们领进一个会议室，对着墙上挂着一个木制小神龛，对我们说：“咱们结为盟友吧！”向神龛致

敬、行鞠躬礼，并在一块白布上写自己的名字。有的写的是真名，有的写的是化名，我写了化名“继行”。之后，开始饮酒。可是，谁也喝不下去。韩庭桂、王文民偷偷地对我们说：“大家要吃得饱饱的，一会儿还要给皇军干活呢！”意思说，看情况是跑是拼都得用力气，所以必须吃饱饭。

饭后就地待命，谁也不准乱动，大井、菊池看守着。天黑时接到命令，菊池端枪在前，大井端枪在后，押着我们8个人朝兴安总省警务厅走去。

到那一看，警务厅内外都是关东军，后院还有那么多车马，唯独不见汽车。大约12点左右，大井对韩庭桂、单玉清说：“现在情况急变，厅长指示我把你们8个人统统杀掉”。这时，一个日本兵把大井叫走了。韩、单二人立即把大伙儿叫到一起，说：“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逃。于是，王文民一马当先出去，大家紧随其后。因为我们都穿着日本军装，又是夜间，所以用日语很轻易利用大井、菊池的名字骗过了第一、二道岗。当我们跑上马路拼命朝东跑去时，后面传来了一阵枪声，但并没有人来追。

逃出来之后，我们一夜之间跑了30多里路，但因道路不熟，衣物等全部被持枪的散兵、土匪抢走。我们分成了几帮，我和单玉清、郑玉凤一共走了20天，才回到了通辽。

本文中有些人的当时情况未说明，现录附于下。

尹广惠：化名中一，当时年龄26岁左右，国高毕业。

曾繁硕：化名允时，当时年龄30岁，铁岭人，高中文化。

李玉秀：化名心行，当时年龄28岁，法库人，初中文化。

郭瑞林：化名建毅，当时年龄28岁，通辽人，初中文化。

刘孝谦：化名弑夷，当时年龄33岁，通辽国高毕业。

- 信淑兰：女，当时年龄约23岁，通辽女子国高毕业。
- 赵春秀：女，当时年龄约22岁，通辽女子国高毕业。
- 季守正：吉林人，当时年龄约30岁，伪满大学毕业。
- 王普宇：原名王德生，当时年龄约30岁。
- 张文宏：当时年龄约26岁，初中文化。
- 郭传弟：通辽人，当时年龄约23岁，初中文化。
- 关维珍：当时年龄约27岁，初中文化。
- 郎式武：当时年龄约27岁，沈阳人，高中文化。
- 王长顺：沈阳人，当时约23岁，高中文化。
- 刘照兴：化名山都，通辽人，年龄约23岁，国高毕业。
- 李继尧：当时年龄约22岁，国高毕业。
- 郑玉凤：化名化民，四平女子国高毕业。
- 单玉清：女，崔嘉祥之妻，化名嘉帼，吉林梨树县人，四平女子国高毕业。
- 张林标：开鲁人，年约28岁，通辽国高毕业。
- 方中杰：开鲁人，年约29岁，通辽国高毕业。

（冯庆和 整理）

共产国际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活动

色希浩

193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决定派一个地下工作小组去内蒙古，严密监视京绥沿线的日军动态和德木楚克栋鲁布的政治动向。遂遴选活动能力强而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的乌瑞廷、玛尼拉二人，扮作夫妻以行商做掩护，携带一台小型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和足够的金条、贵重皮毛，同一名助手分乘三匹骆驼沿二连浩特、集宁这条线，于是年冬到达内蒙古西部。

乌瑞廷，喀喇沁旗人。玛尼拉(女，化名吴淑珍)，自称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旗人，自幼随父母迁居苏联布利亚特蒙古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得，在那里读完了小学、中学和高中之后，又考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他们二人及特木尔巴根等，均于1929年11月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之后，被共产国际派送到蒙古工作。

乌瑞廷和玛尼拉到归绥后，没有找到预定落脚的联络人吴祥文。后来，他们获悉德木楚克栋鲁布和他的一伙人，在嘉卜寺(现名化德)筹备成立军政府，遂去嘉卜寺找到了吴祥文。吴祥文是乌瑞廷的同乡和中学时代的同学，又有亲属关系，也是一个关心民族前途问题的蒙古族青年。因此，他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言。见面之后，乌瑞廷就把来意明确地告诉了吴祥文，并求得他以多方面的帮助。

吴祥文慨然应诺了乌瑞廷的要求，把他们二人留在家里

工作既方便又安全。

乌瑞廷小组的工作，在吴祥文的大力帮助下，进展很顺利，获得不少重要情报，其中包括日本关东军从1936年夏季开始，在长城沿线集结的情况。他们将获得的情报，及时用密码电报给赛音山达站的一个联络点。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京、津地区，并有一部分向居庸关推进。乌瑞廷小组把这一情况及时电报报告，回电指示：“根据日军的动向，势必大举进兵打通京绥路，之后有可能把侵略的战火燃烧到蒙古，因此，必须密切注视日军的一举一动，并将情况及时报告。”

1937年8月7日下午，日军侵占了张家口之后，遂沿着京绥路向西长驱直入，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相继侵占了大同、集宁、归绥和包头。乌瑞廷小组把这些情况及时作了报告，并根据判断，日军暂时只能驻扎铁路沿线。这就给蒙古加强南部防御力量以充足的准备时间。

日本侵略军侵占张家口后，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和吴文祥有莫逆之交的德古来担任了财政部长。他一手提拔吴文祥担任了税务监督署长。

乌瑞廷把上述情况通电报告，回电指示：“为了更好地、更多地了解敌人的情况，通过吴祥文的关系在北京找个临时落脚点，以采购和出售货物作掩护，要经常往来于京、张、归绥之间。收发报机放在吴祥文家保存和使用最稳妥、方便。”经过商量，乌瑞廷和吴祥文二人同去北京。吴祥文把乌瑞廷领到居住在护国寺喇嘛住宅区的一位亲戚包寡妇家里。吴祥文说，乌瑞廷是在草原的行商，因经常到北京采购货物，准备租赁一、二间房子。包寡妇人口不多，故租给了吴

祥文一间房子，并同意他另开一道门。

乌瑞廷在吴祥文的帮助下，在北京找到了下榻处之后，工作很方便。由于乌瑞廷的活动能力强，结识了几位护国寺和雍和宫的著名喇嘛。这些喇嘛与当时的日本军警 宪 特头子，以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要人经常来往。因此，乌瑞廷在和这些喇嘛闲谈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军事、政治方面的情报。如日本侵略军将要进攻上海、南京以及日方正与汪精卫进行政治勾结等情报，据说是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在雍和宫白达喇嘛处抽大烟闲谈时无意透露的。

1938年3月间，乌瑞廷、玛尼拉接到赛音山达联络站转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文大意：“据侦悉，日本关东军正在呼伦贝尔的将军庙以西地区集结，还有很多车辆从海拉尔向将军庙运送物资。现在对其详细情况虽尚不了解，但这种军事行动对蒙古东部国境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故决定暂停京绥地区工作，派你二人前去伪满军事、政治重镇——王爷庙设点，深入详细了解敌人的兵力、武器装备、运输物资的种类和使用车辆数等情况。收发报机要委托吴祥文给带到满洲，设点之事也要求他给以解决。”

1938年4月间，恰巧吴祥文去长春参加几个傀儡政权召开的税务署局长联席会议。乌瑞廷把上述情况说明之后，吴祥文便一口答应。他把收发报机带到开鲁交给兴西安省人事股那斯图保存。他告诉乌瑞廷：“那斯图是我的亲表弟，可以直接找他，他一定会给帮忙的。”

过了几天，乌瑞廷、玛尼拉来开鲁找到那斯图家，就直接在当地说明了来意，并要求夜里在他家架设收发报机。那斯图表示坚决给以帮助。于是，乌瑞廷要求那斯图去买大电池，因当时在开鲁的商店买不到大电池，买了不少一号电池

实验，结果不行，第一天晚上未能通电。

夜里闲谈时，那斯图突然对乌瑞廷说：“直流无线电收音机用的大电池行不行？”乌瑞廷说：“正对！谁家有？”那斯图说哈丰阿家里有这种电池。乌瑞廷听说哈丰阿在开鲁顿时喜出望外，因乌瑞廷与哈丰阿有一面之交，而且很了解哈丰阿的情况，便要求那斯图立即带他去见哈丰阿。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那斯图说中午他先去打个招呼，晚上下班后去。第二天中午，那斯图去哈丰阿家，把乌瑞廷来开鲁的目的和要借电池的事，毫无隐讳地告诉了哈丰阿。哈丰阿同意见面并答应借给电池。

吃过晚饭后，那斯图领乌瑞廷和玛尼拉二人去见哈丰阿。关于谈话的内容据玛尼拉说，只谈了一些家常，未谈有关政治问题。电池是由那斯图带回来的。

当天晚上十二点，乌瑞廷很顺利地通了电，报告了现在的地点，并请示可否在开鲁设点。到达开鲁的第三天夜里，回电指示：“开鲁地处偏僻，既不是军事要地，又不是政治中心，不宜设点，仍按原来指示，必须设法在王爷庙设点。在王爷庙找到适当场所之前，收发报机要在开鲁妥善寄放。”

他们把收发报机暂时交给那斯图保管之后，便离开了开鲁。王爷庙没有熟人，乌瑞廷和玛尼拉商定先去叶柏寿南屯，找乌瑞廷的舅舅。乌瑞廷对其舅舅说，他在牧区行商数年，赚了不少钱但常年出没于冰天雪地很艰苦，准备在王爷庙开设一个小商店，希望能找到一所房子。正好乌瑞廷的舅舅在王爷庙有个相好的朋友，就答应尽力帮忙。

在朋友的帮助下，乌瑞廷的舅舅很快找到了两间过去曾开过店铺的房子，便匆匆回来通知乌瑞廷，要他们去看一看

场所是否合适。乌瑞廷、玛尼拉到那里一看，那两间房子地处中心街，且北边不远的胡同里就是日本特务机关监狱。这里不适合设点，故乌瑞廷又委托舅舅求其朋友最好在郊区弄到一所房子，决定过些天再来。

他们在途经通辽时住了几天，无意中遇见了特木尔巴根。老同学久别重逢，感慨万分。特木尔巴根邀请他俩到家里做客，吃了一顿饭。在回张家口之前，乌瑞廷、玛尼拉又到特木尔巴根家去了一次。关于他们的谈话内容，玛尼拉与特木尔巴根的口径是一致的。玛尼拉说：“因为分别多年，他又当上了日本官员，所以未敢谈政治问题。”特木尔巴根说：“我问他们干什么时，他们回答得很干脆，在牧区行商，因此不便深究。”日特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后来曾对特木尔巴根施加各种刑法，但终无所获。

乌瑞廷、玛尼拉为找房子，后来随乌瑞廷的舅舅又去过一次王爷庙，但因郊区除军队营房、军官住宅而外，也无适当场所。1938年10月间，第二次去开鲁通电报告了这一情况。回电指示：“已另派了一个工作组接替了你们的任务，因此请速回张家口执行原来任务。收发报机和密码如携带不便就立即毁掉，派人再送去一台收发报机和密码。”

乌瑞廷、玛尼拉感到毁掉收发报机和密码很可惜，将来或许有用，就与那斯图商量，用两层毡子包好，挖一个深坑，底部和周围又铺塞很厚的小米糠，埋在那斯图的房后。

乌瑞廷、玛尼拉此次到“满洲”来，虽未完成上级交给的全部任务，但获得了一个最重要的情报：在将军庙一带集结的日本侵略军大约有九个师的兵力。1939年，苏蒙联军在哈拉哈河和诺门汗草原上能够用暂短的七、八天全歼日本侵略军十五万，与事先获得准确情报有足够的准备是分不开

的。

二

1938年10月间，乌瑞廷、玛尼拉回到张家口，仍往来于京绥（北京至归绥）从事搜集情报工作。

1939年，吴祥文被派往日本进修一年。因为他不在家又无孩子，他妻子就经常去德古来家和德妻打牌。不知谁给吴祥文连续写去几封匿名信，说吴祥文的妻子和德古来搞得火热。吴祥文深知德古来的为人，同时自己之所以能登上税务监督署长的宝座，完全是德古来一手提拔的结果，因此根本不相信信里的谰言。年底学习结束回张家口，吴祥文到家见妻子不在，问仆人，仆人说去德部长家几日未归。他令人用电话通知妻子，妻闻讯赶回家。离别一年，夫妻见面非常高兴，妻子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给吴祥文接风洗尘。吴祥文高兴得喝到半夜，酩酊大醉后言及匿名信所说之事，并施以拳脚，最后竟用行李绳将妻子捆绑起来，用刀把她的鼻尖削了下来。其妻高声呼喊救命。仆人们知道出事了，就跑出来叫人，用车把吴妻送进医院。这时，吴祥文已醉得不省人事了。

上班后，有关人员把此事报告给德古来。德听后恼羞成怒，立即通知警察总局逮捕了吴祥文，并送到最高检查署向法院提出公诉，要求依法严惩吴祥文。最高检查署根据吴祥文的犯罪事实，以“杀人未遂罪”向法院起诉。在法院宣判前，很多人向德古来求情。德尚念旧交，通知法院释放了吴祥文，但为了教训他，暂未复职。

吴祥文获释后，无颜去见德古来和同僚们，就跑到北平暂居。他在北平呆了半年多，由于精神压抑百无聊赖，终日为解愁消闷吃喝玩乐，结果钱都花光了。他以为德古来念旧

情一定会派人把他叫回去给以复职，出乎意料的是，半年之久音讯皆无。由于手中无钱，他在这种情况下，心中的希望变成了仇恨——认为他之所以落到这般地步完全是德古来所造成，恨不得立即把德古来杀掉。这种想法萌生之后，他不顾将会产生怎样的结局，竟跑到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检举了德古来勾结苏蒙企图颠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驱逐日本等情况。因为德古来是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最可靠的人，故没有理睬吴祥文，只是说：“需要经过调查了解才能下结论。”吴祥文等了数日没人找他，就再次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声称他完全可以做证。北平特务机关回答说：事关重大，空口无凭，必须详细了解才能定。第二次检举又未获成功，吴祥文以为北平特务机关在包庇德古来。于是，他改变了主意，跑到德化日本特务机关检举德古来的上述问题。德化日本特务也很了解德古来，未敢擅自受理，又向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报告了此事。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指示，此人已经两次检举德古来，我们没有理睬他，所以又跑到你们那里。

吴祥文为了达到陷害德古来的目的，就向德化日本特务机关交代了收发报机、密码的存放地点。德化日本特务机关派两名便衣特务随吴祥文去张家口，吴祥文从家中取出了乌瑞廷、玛尼拉存放的收发报机一台、密码本一册。德化日本特务机关把吴祥文连同交出的物件一并送交北平日本特务机关。

北平日本特务机关经过分析认为，德古来即使是主犯，但根据他的身份和现在的职位不可能亲自动手干，也不可能他一个人搞。同时这样重要的物件为什么会寄放在吴祥文家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北平日本特务机关强迫吴祥文交代实情。吴祥文不得不把他与乌瑞廷、玛尼拉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如何作掩护的事实坦白出来。当问到乌瑞廷、玛尼拉现

在的下落时，吴祥文说，乌瑞廷到集宁、二连浩特一带活动，玛尼拉去商都、多伦一带活动，并提供了乌、玛二人的相貌、特征。

北平日本特务机关会同德化日本特务机关，派遣了数名强干的特务分头去拘捕乌瑞廷和玛尼拉。1940年12月间，玛尼拉于多伦被捕。据说，乌瑞廷在听说玛尼拉被捕后便回到了蒙古。

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根据吴祥文的口供，经过三、四个月对玛尼拉的刑讯，完全掌握了上述情况。为了从那斯图家找到乌、玛埋藏的收发报机和密码本，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把伪满关联此案的人委托兴安西省保安局（分室）处理，并于1941年5月，派一名日本特务和两名随员，把玛尼拉带到开鲁，与局长当麻音治郎、理事官绿川胜治取得联系之后，把乌瑞廷、玛尼拉的全部材料和北平特务机关此案处理的意见书交给了理事官绿川胜治，建议立即派人调查收发报机和密码的下落，并逮捕那斯图父子。绿川胜治当即派事务官、机要股长横矢稔，属官佐藤敏雄带几名日本警官逮捕了那斯图父子，并挖出了收发报机和密码本。机件完好无损。

绿川胜治遂主持召开股长会议，参加股长有，机要股长横矢稔，对蒙政策股长吉田和我（宗教政策股长）。列席的有属官佐藤敏雄。

会议开始后，绿川胜治宣布，现在，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查获了一起“苏蒙间谍案”，其主犯之一玛尼拉已逮捕归案，其使用的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密码本一册，已由张家口通谍分子吴祥文交出。北平日本特务机关委托我分室（保安局）处理满洲的通谍分子和共产国际派来的赤党分子，为此决定设立专案组负责调查、审讯和处理。

专案组组成人员：

组长：横矢稔（机要股长）

组员：吉田次郎（对蒙政策股长）

色希浩（宗教政策股长）

书记员：佐藤雄属官

看守和提送隔离犯人：皆川××属官

另外，根据需要从省警务厅特高科临时调来了日本警官。

绿川胜治说，工作按下列顺序进行：

1、逮捕那斯图父子，并找到埋藏的收发报机和密码本（此事已完毕）。

2、按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送来的材料，复审玛尼拉，以便进一步核对证实。这个工作限三日完成，因北平日本特务机关要把玛尼拉和她的收发报机带走。

3、与通辽日本特务机关联系之后，分别逮捕特木尔巴根和乌瑞廷的舅舅。

4、研究对哈丰阿处理的最后决定。

5、把特木尔巴根逮捕之后，另设秘密收容所严加监禁。

散会后，绿川胜治把我单独留下，以从未有过的严肃态度，板着面孔说：“你和特木尔巴根是朋友，如果循私舞弊泄露机密，定按通谍论处。”说完之后，叫我写保证书。

按照北平日本特务机关交来的材料对玛尼拉进行了复审，复审的结果与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核定的材料基本没有出入。关于玛尼拉是否与特木尔巴根及其他人员接触的问题，没有问出结果。最后，为了让玛尼拉和赛音山达通电，还把保安局电台的技术员也叫来看，但玛尼拉却说她把呼号忘记了。

对玛尼拉的复审进行了两天半，没有一点进展和新的收获而结束。后来，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把玛尼拉和收发报机等带回了北平。

三

1941年5月中旬，我和横矢稔、佐藤敏雄以及省警务厅特高科的两名日本警官去通辽日本特务机关，会见了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主事麻生达男、主事中城熙喜等要员。横矢稔向金川耕作汇报了关于“苏蒙间谍案”的情况，并要求派人协助逮捕特木尔巴根等人。当时，金川耕作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指示要严格保密。会上决定派中城熙喜协助我们工作。

中午休息时，我去街里拜访同学嘎亚巴萨尔（第九军管区军法处法官）时，途中巧遇科左中旗公署会计股长齐木特道尔吉。我和齐木特道尔吉、特木尔巴根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从朋友的感情出发，让他转告特木尔巴根，如有什么重要材料及时销毁。齐木特道尔吉感到惊讶，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便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就含糊其辞地说：“你把我说的转告他就行了，明、后天你就知道了。”齐木特道尔吉立即去车站赶回了科左中旗公署。

下午，我们去通辽宪兵队取得联系后，第二天由通辽坐车到郑家屯，打电话通知科左中旗参事官室，翌日早由他们派两辆轿车把我们接到左中。

上午九点到科左中旗公署后，我们直接去警务科。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注目，只有横矢稔一个人去与参事官联系。中午下班后，横矢稔派佐藤敏雄和两名日本人警官先把特木尔巴根叫到警务科长办公室，横矢稔协同旗特务股长等人亲自去特木尔巴根家搜查。我和中城熙喜等人去文教科搜查特木尔巴根所使用的办公桌、卷柜以及卷宗、文件材料，但一

无所获。当天下午，由科左中旗公署用两辆轿车把我们送到郑家屯，然后乘火车回到通辽。

从旗公署临走前，特木尔巴根的妻子到警务科找我，她哭喊着要随特木尔巴根一同走。我再三向她解释：“你去对待木尔巴根也很不方便，我会尽力想办法，你放心好了。”

到通辽后，按照金川耕作的意见，直接把特木尔巴根送到日本宪兵队羁押。回开鲁后，把特木尔巴根送到单独隔离场所“阿祺图”，派佐藤敏雄和皆川二人专管。

接着，横矢稔带领我与佐藤敏雄和两名日本警官，协同中城熙喜经奉天去叶柏寿南屯逮捕了乌瑞廷的舅舅白老汉。我因到了奉天患肠炎未去叶柏寿先回了开鲁。

横矢稔逮捕了白老汉后，按原计划开始了审讯。那斯图父子及白老汉说出他们所知道的事情。白老汉的确不知道乌瑞廷二人是搞所谓“反满抗日”工作的，最后只承认先后接受过乌、玛二人约三百元的生活补助费。

特木尔巴根受尽了电刑、压杠、针刺、灌辣椒水等酷刑，每天被弄得死去活来，这样连续刑讯了两个月，除了先后承认日本特务机关提供的材料中的有关问题外，其他所有事情矢口否认。在刑讯期间，对特木尔巴根采取过软硬措施的办法。绿川胜治先后三次派我以个人的名义给特木尔巴根送了一些食品，我没有勉强相劝。特木尔巴根每次见到我时都很高兴，只是说：“我们既是朋友，听到有什么危险时，事先一定要告诉我。”他还说“假如可能的话请你照顾一下我的妻子和子女。”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特木尔巴根已经对自己的生存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只好从多方而劝慰他。日特对特木尔巴根所采取的这些软硬兼施的措施终未奏效。

1941年7月底，对特木尔巴根的审讯已告结束。根据横

矢稔的提请，经理事官绿川胜治同意去北平搜捕乌瑞廷。横矢稔带领我和佐藤敏雄及两名日本警官到通辽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协同中城熙喜一行六人前往北平。到北平后，横矢稔去日本特务机关和岗村宁茨的参谋部联系，回到下榻处便决定让我伪装成哈丰阿派来的人，以和乌瑞廷联系为名去包寡妇家，寻找乌瑞廷的下落，我只好照办。我在一名日特的指引下找到了包寡妇家。当打听乌瑞廷的去向时，包寡妇很爽快地说：“他们夫妇去年常来常往，现在已有十来个月没有来了、大概是又到牧区行商去了。”我一听老人说的是真话，未谈别的事，就回去把这些情况向横矢稔作了汇报。其实，在我们没去包寡妇家之时，北平日本特务机关就根本没有放松对乌瑞廷下落的调查。我们在北平只好呆了两个星期就回来了。

1941年3月下旬，横矢稔以专案组负责人的名义作出了关于特木尔巴根等四人的处理，报请局长裁决。局长很快裁定，指示向关东军军法会审提出公诉。

一、特木尔巴根，留学苏俄并受共产国际派遣，搞赤化工作，罪恶多端，且拒不交待罪恶事实，实属顽固的赤党分子，应处极刑。

二、那斯图身为帝国官吏，私通“苏蒙间谍”进行叛国活动，实属最大恶极，当处以极刑。

三、那斯图之父及白老汉，给间谍活动提供方便，丧失了国民立场，本当严惩，但念其文盲无知，从宽处以八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到这个裁决书后，横矢稔依据《关于处理外谍通谍者指示》一文中“外谍和外谍通谍者，经过改造教育也可逆利用”这一条，和专案组同意释放特木尔巴根的意见，以专案

组名义向上级提出建议，得到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和中央保安局批准，于1941年10月间，先后释放了特木尔巴根等四人。

释放后，对他们的安排情况是：

那斯图的父亲和白老汉经教育，令其回家做个安分守己的国民。

特木尔巴根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和中央保安局委托兴安局派往王爷庙蒙民厚生会任财务科长。

恢复那斯图兴安西省人事股长职务。不久他被调往巴林左旗任总务科长。

至此，轰动一时的“苏蒙间谍案”结案。在内蒙古地区活动了五年多的乌瑞廷、玛尼拉地下工作组惨遭破坏，被迫终止了工作。

钱家店农民道场

魏连云

钱家店蒙古农民道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在今通辽市钱家店镇开办的一所学校。“道场”，大体相当于现代汉语“学校”、“训练班”的意思。它开办于1940年，解体于1945年8月15日。

钱家店蒙古农民道场成立时，我就进场担任财会工作，负责管道场的修建等方面的业务，一直到道场解体。因此，道场从兴建到解体我都可以说是一个见证人。

道场只招收家住在兴安省的蒙古族青少年。

招收名额，每期两个班，每班25人，计50名蒙古族青少年，年龄要求为15—18岁。

学制规定为3年。计划招6期，共训练500人（实际只办了两期，日伪就垮台了）。

课程：以学日语口语为主，兼学农、牧、加工技术。

学生待遇：食、宿、服装、课木、文具全由道场供给。

毕业分配：主要是到学生所在各旗作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指导，待遇相当于当时的蒙旗各指导官。

道场有两名场长，主要负责人是日本现役军官少佐宫下博男，他是日本侵华军第九军管区金川大佐的外甥。

还有一个蒙古族人郭宝山，原为少校级军官，退伍后到道场任场长，但他只是到道场领工资，其余时间从不上班。

道场里还有几个日本人。加藤是宫，是宫下博男的内弟

主管道场财务；官下八男，是官下博男的弟弟，主管道场粮食、物品；此外，还有法月、高桥，也是官下博男的至亲。所以，当时人们说：这个道场是日本人“私有公办”。

道场分四个系：

农学系：系长是日本人法月，学生10名，学农业。

牧业系：系长是日本人高桥，学生10名，学牧业。

加工系：也被称为加工部，系长2人，分别称为张经理、于经理，还有一名会计，名叫王浴洋。此系有学生30名，学制粉、制油、制皮革、制肥皂、茶叶、调料、鞋等；外有工人30名。

财务系：系长加藤，管钱、粮物。雇员3名，除官下八男外，还有两名蒙古人。

此外还有长期木工、瓦工、窑工等19名。全场人员合计为110名。

道场拥有土地2000亩，自留200亩，主要是种瓜果；其余土地分别租给腰窝堡和翟家窝堡两村的种地户。这些土地只要地租不拿出荷粮。

这个道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一个由通辽招来的商号，是制皮厂。这个厂有两个经理一个姓张、一个姓于，还有个姓王的会计。经双方协商由道场出厂房，购入原材料，生产所得的效益“二一商作五”，并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由1942年开始。当时“大东亚圣战”已经爆发，日本经济危机加剧，物资特别紧张，采取这个办法解决了道场的经费。场长官下博男和沈阳、四平、长春日本私商订立合同，先交款，后付货。而道场生产出来的制品以高价出售。当时都是“统制产品”，除军用外私人是不准买卖的，如制皮革的药物、皮张等。为了购进这些材料，官下就以军队名义购进

来，其实并没供给军队，而是采取所谓公购私卖的办法进行。为达上述目的这个道场有三套公章，一套有“第九军管区特务机关”字样用，于专门购买制皮革的原料、药物，同时也用它和铁路要车皮，往外运输。一套公章有“钱家店蒙古农民道场加工部”的字样，用这个公章，再附有通辽第九管区特务机关的军用许可证，物品即可运出卖高价。一套公章有“钱家店蒙古农民道场”字样，是对内使用的。此外加工部还有一枚内外来往用的公章。

钱家店蒙古农民道场的财产、设备大体情况是：

（一）厂房：33间，其中制粉厂5间、制油厂5间、制茶厂2间，调味厂5间、制肥皂厂4间、制酱2间、咸菜10间；

（二）办公室：15间；

（三）仓库：44间，其中农具、家具和粮库各10间，此外有药房、被服仓库等；

（四）教室4间；

（五）牛、羊、猪、鸡棚舍60间；

（六）砖瓦窑一处；

（七）车辆：胶车、花轱辘车各2台；

（八）家属房15间。

钱家店蒙古农民道场学生的日常活动主要是上课。上午8点到11点学日语或政治课。日语是对话、书写、翻译，由法月、高桥二位日本教师任教。政治课主要是讲“日蒙一家、日本是太阳，蒙古是月亮，日蒙不可分离，月亮随着太阳走”，“大日本十分注意蒙古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等等，由场长官下博男亲自教授。下午是到各厂房学习技术，进行操作。学农业的到农田作业，学牧业的到养殖场、饲养场，当时道场还有牛、羊、猪、鸡等。此外还有一门天天都有

的课程，那就是刺杀和枪术，这门课由两个班的班长任教。

1942年秋天第一期学生毕业了。这批学生主要来自第九军管区的少年队。他们是转到道场来的，又经过了两年训练，举行了毕业典礼。

1943年春，钱家店蒙古农民道场又招收了第二期学生。招生由场长宫下博男亲自抓，并亲自到各旗去物色人，如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扎鲁特旗他都亲自去过。对学生都要做身体检查、家庭访问，并亲自和旗长研究，共招了50名，均为18岁以下的蒙古族青少年。

第二期学生5月1日入场，是由各旗旗长亲自送到道场的。形式极象新兵入伍，学生先到操场集合，然后场长做动员讲话，宣布编班。两个班每班25名。最后举办一次宴会，招待学生家长，由场长、班长、系长参加。宴会后给学生换衣服、安排床铺，发放被褥和用具。

1945年8月15日早8点，突然一架日本飞机沿铁路线上空缓缓飞来，它飞得很低，时间不大，撒下了一些《小报》，《小报》的内容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蒙古农民道场的日本人见此惶惶不安。宫下博男立即召集学生套上大车，拉上行李，赶着羊群，向钱家店南坨子一带溃逃，但逃到现在双宝乡的才道木村的老巴家就被留下了。

第二天一早，即8月16日清晨，蒙古农民道场上空来了十几架苏联飞机。这些飞机来了就轰炸，轰炸了一小时之久。从道场逃出来的这伙人再不敢在附近停留。至此，名噪一时的钱家店农民道场宣告垮台。道场的物资、家具、房屋、厂房、砖瓦、木材、药物、农具和粮油、米面、被服及各项设备等都叫当地群众拆除拉走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郝桂林 整理）

抗日爱国人士——张林标

曹国卿

(一)

张林标又名张克本，1919年9月4日出生于河北省滦县国家岭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张允泰，以农为主，母亲张姚氏，是位慈祥和善的家庭妇女。在张林标五岁时全家投亲到开鲁县。父亲在亲友的帮助下与人合伙开了一个小饭馆，维持全家十余口人的生活。

在张林标童年时，父母省吃俭用，将他送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就读。1934年他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辽源初等中学，毕业后返回开鲁在育英街国民学校任教。由于不满日本帝国主义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愤然离职外出求学。1940年经同学戴纪明介绍插班到通辽国民高等学校学习。不久又投考了满洲中央兴农合作社会计短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到开鲁县兴农合作社信用部预金系当职员。1944年春在兴农合作社派驻通辽办事处工作期间，经同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反满抗日地下组织。

(二)

1945年初，张林标受组织的派遣，利用兴农合作社职员的合法身份，在开鲁进行秘密反满抗日地下活动：

刺探驻开鲁日军和其他日本人的活动情况和军事行动，并及时报告给国民党反满抗日地下组织驻通辽地区分部。

秘密收听重庆方面电台的广播，将有关消息传达给地下组织成员。当时他们只有一台收音机，因张林标家驻合作社院内，为防止被敌人发觉，张林标把收音机安装在戴玘明家中，由戴负责收听记录。为了避免汉奸特务察觉，收听都是在深夜十二点以后，收听时先锁好房门，灭掉灯光，把收音机声音开到最低限度。这样记下的新闻广播，有时断断续续，人名、姓名更是常常写错，必须第二天再继续整理。重庆电台有时将重要文章重复播放几次，渐渐记录的比较完整了。整理完后，第二天再秘密转交给张林标，由他直接传达到地下组织成员。

秘密传播进步书籍，发给地下组织成员。张林标从通辽回开鲁时，带回一些书籍，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这些书籍在伪满统治时期都是被划为禁读之列的书刊。如被敌特查出，轻者被严刑拷打坐牢，重者直至杀头。张林标不顾个人安危，将这些书籍带回开鲁后，除在已加入组织的成员中传阅外，还秘密借给有进步思想的同事看。并时常与他们谈心得体会，从而培养了一些有爱国主义思想、民族意识、有文化的爱国志士。现在仍健在的戴玘明就是由张林标引导而走上反满抗日道路的。

利用工作之便，减少农民同胞的“出荷”。张林标利用兴农合作社职员的合法身份，在与农民同胞签订契约粮、契约麻时，千方百计尽量往少定。他经常对其组织的成员说：我们少收一些，就可以使日军的给养供应不足，削弱他们的战斗力，使我们能早一天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三）

1945年4月17日深夜，张林标家院子里响起了纷乱的脚步

步声、叫喊声。张林标知道出事了，他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平稳地坐在炕上。随着粗暴的吼声和冬冬的砸门声，几个日本兵和特务翻译冲进了屋内，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并把他家里里外外搜了一遍。张林标始终神态自若，轻蔑地藐视着匪徒。敌人见没搜到什么东西，就给张林标扣上手铐带走了。

张林标对被捕、坐牢、被杀害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在他被捕的前几天，就已获悉国民党东北反满抗日地下组织总部因叛徒出卖已被敌人破获，东北地下组织人员名单已落入敌手，敌人已经开始按名单进行大搜捕。当时，有的同事苦苦相劝，叫他到外地躲一躲。张林标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的，我才回来四个月，工作做得太少了。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我哪能离开呢？”

与张林标同时被捕的还有崔嘉祥（化名崔宏民）、戴玘明等人。他们被捕后先关押在县警察署院内，准备过几天押送到通辽。张林标的母亲和妻子听说要把他押解走，急忙赶去看望。张林标面对眼睛已经哭肿了的慈母，哽咽着对她们说：“妈妈，儿子没有做对不起您老人家的事，请放心吧。”崔嘉祥见围观的人们越来越多，就乘机对他们说：“同胞们！日本侵略者已经打了大败仗，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就要滚出中国了！同胞们，要团结起来。”刚讲了几句，穷凶极恶的日本兵凶狠地用破布堵上了他的嘴，连推带拉将他们几个人推上汽车拉走了。

（四）

张林标、崔嘉祥等人被押解到通辽后，不久又与通辽县党部书记长王文民等十多位抗日爱国志士一起被带上手铐

蒙上黑面罩移解到王爷庙（当时伪兴安总省公署所在地）监狱。在押解的火车上，张林标、王文民、崔嘉祥三人带头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抗议敌人给志士们带面罩。张林标首先愤怒地对押解的日本兵说道：“我们没干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给我们带面罩，马上给我们摘下去！”车厢里的其他志士立即响应，纷纷怒吼起来“给我们摘下去！”有的还用带铐的双手猛砸车厢。押解的日本兵怕把事情闹大，不好交差，只好乖乖地将面罩给大家摘掉了。

王爷庙监狱就是兴安总省囚禁“政治犯”的魔窟。每间牢房监禁几个人，吃饭、拉屎一切活动都在里面，阴暗潮湿，臭气冲天，跳蚤、臭虫横行。犯人每天只能吃到两餐发霉的米饭。敌人妄想用残酷的牢狱生活，摧残削弱张林标等志士的斗志。张林标、王文民几个地下组织的骨干，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然千方百计团结难友坚持斗争。他们在囚禁期间，有组织、有计划秘密组织会议，商讨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千方百计为被关押的难友讲当前国内的形势，鼓励大家的斗志。

张林标被捕后，多次被审讯。在刑堂上，张林标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凶残的敌人，他用铿锵的言词，痛斥敌人的无耻行径，淋漓尽致地揭露他们在中国大地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敌人对张林标用尽了种种酷刑：押滚杠、灌辣椒水、过电、翻肋条骨等等。有几次残暴的敌人把张林标折磨得昏死过去了，又用凉水浇醒过来。但是张林标始终没说一句有损地下组织的情况，有损中国人尊严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组织的任何机密。

1945年8月，敌人对张林标等爱国志士进行最后一次审讯，然后匆匆忙忙地将他和其他几位志士一起拉到王爷庙北山残酷地枪杀了。张林标被害时年仅27岁。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国民党开鲁县党部为纪念在反满抗日斗争中被枪杀的张林标、崔嘉祥志士，成立了以他们二人的化名命名的《克本剧团》和《宏民报社》，以寄托对他们的哀思和悼念。

“九·一八”事变后的达尔罕亲王

包 静 安

我是科左中旗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的五女儿。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的年龄虽小，但有些事情已经有所记忆。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沈阳，我和父亲达尔罕亲王、母亲福晋朱博儒以及兄弟姐妹们都住在沈阳小河沿。那时，日本侵略者人数并不多，在地方行政上，主要是利用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人。特别是在内蒙地区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鼓吹什么“蒙古独立”，并积极起用蒙古王公贵族等上层人物，充任地方各级行政职务，为其法西斯统治效劳。伪东科中旗公署（即科左中旗公署）成立时，日本人曾经多次做我父亲的工作，叫他从沈阳回到科左中旗担任旗长，但他坚决拒绝回旗，反而积极准备离开沈阳迁往北平（即今北京，当时尚未沦陷）。

我父亲离开沈阳迁到了北平。到北平后，我们住在安定门红罗厂老达尔罕王府，后来又迁居到北京马大仁胡同。

我父亲不为日本侵略者效力，而迁居北平。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南京国民党政府知道了，他们对我父亲的这种行动大为赞赏。为了拢络蒙古王公，他们委任我父亲为国民党行政院顾问，不用上班，每月薪金二百元；还特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外事处处长唐悦良，来到我们家进行慰劳，并送来了慰劳金。可是我父亲对这些事并不在意，他每天在家里总是手拿念珠闭目养神，实际上内心里在思念家乡，盼望着何时

才能把日寇驱出中国！他每天几乎都要上街一趟，习惯穿一件紫色的坎肩，手里提着篮子到市场买菜。以买菜为由，亲自到街上走走，一来消消胸中的郁闷，二来到街上了解一下国家和社会风情。有时见到了乡亲或者蒙古族同胞交谈交谈，回来后他的心情，显得特别高兴。听到一些有关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消息，他的心情特别抑郁和苦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进占华北，进入北平。这样，我父亲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又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之中，日本侵略者仍想利用我父亲帮助统治蒙古民族。因此，曾多次威迫利诱，叫他回东北筹建哲里木盟政府，让他当盟长，掌管全盟大权，这些都遭到我父亲的拒绝。这惹恼了日本人，他们说：“如果再不去的话，那就不客气了，只有到宪兵队去灌煤油！”以此来威胁我父亲达尔罕亲王。但是，我父亲推脱说：“我患有肺结核病。不能工作”。从此以后我父亲就经常到法国医院去住院，以躲避日本人。后来，我父亲托人从北京地安门大街的清原医院里买来了一张患有肺结核病人的X光透视照片，拿给日本人看。日本人看了这张X光透视照片后信以为真。从此，再也不强迫他出去工作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又任命我父亲为东北接收大员，让他回东北筹建哲里木盟政府，任命他为盟长，但是我父亲达尔罕王以年老体弱不能再工作为由，拒返东北。1946年正月十四日，蒋介石为了窃取抗战胜利果实，收买我父亲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授予他二等“景星勋章”。电文说：

那木济勒色楞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兼该盟副盟长在清代时爵封双亲王位极崇隆九·一八

事变后避居北平持躬谨慎七·七事变后敌伪迭施胁迫均
以病辞不为此用实属忠贞可嘉拟请授予该员二等景星勋章以示优异而励忠贞

虽然如此，但我父亲也没有回东北去当接收大员和盟长。到了1948年时，因为我丈夫金曾武的祖父去世，我同金曾武要去南方为其下葬。当时，我父亲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我母亲福晋朱博儒都没有去过祖国南方，因此要同去南方旅游。当我同父母从南方回到上海时，东北已经全部解放，解放大军正在南下。上海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已是惶恐不安，纷纷飞往香港和台湾。不久，我四哥包晋祺从台湾来到上海，把我父母亲以及弟妹等接往台湾。我和丈夫金曾武回到北京。我父亲同我母亲又从台湾迁居香港，后又移居九龙。1951年，我父亲因患脑溢血病，在九龙医院逝世，终年71岁。第二年，我母亲也因病在九龙去世。

（李景唐 整理）

伪满见闻拾零

贺佐

在《血雨腥风十四年》一书征稿过程中，张庆祥、吴凤玉、杨德田等一些亲身经历过伪满时期的老人，提供了许多亲见、亲闻的史料。现摘编于下，以飨读者。

两壮士夜闯道尹府

现在的哲盟公安处大院，伪满前为马道尹（马龙潭）府。日军侵入通辽后，这个大院为日本宪兵队所占。

1932年冬的一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西北风卷着黄沙尘土，刮得对面不见人。正当夜半更深时，道尹府门前，突然闪出两个人影。说时迟那是快，这两个人手起刀落，门前的日军哨兵顿时人头落地；尔后闯进道尹府，见日本人就用大刀砍，一连砍倒数人……这时日本宪兵队一阵大乱，院内枪声大作。枪声停息后，两壮士已倒在血泊之中。

这件事，震惊了整个通辽城。日军动用所有军队、宪兵、警察，马上进行戒严、搜捕，先后共逮捕几百名“可疑分子”。日军对抓来的人逐个审问，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找到。忽然，一个日本军官命令：对两个夜闯道尹府的死者进行剖腹检查。经检查发现，这两位死者胃里有高粱米饭、咸大豆。于是，日本人又在抓获的嫌疑犯中挨个问：“你的昨晚上的吃什么饭？”结果是，绝大部分人说“吃的是高粱米饭”。

日军头目无可奈何，气急败坏，把全体宪兵、警察集合起来，问那两个手持大刀的人是谁开枪打死的。宪兵、警察们以为，这回要论功行赏了，纷纷报名说是自己打死的。没

想到，日军官让这些报名的宪兵、警察出列，然后，每人狠揍两个大嘴巴，埋怨他们灭了活口。

（杨德田提供资料）

日本兵草菅人命

1934年初，伪满洲国政府下令，收缴民间一切枪支武器。于是，日本兵带领警察、汉奸特务到处翻箱倒柜，欺压平民。当时，通辽南顺大街有一户姓王的买买人，人称王老阔。此人抽大烟，刚抽完大烟，搜枪的日军闯进屋。日本人领头的问：“你的枪的有？”这位王老阔，被吓得晕头转向，顺口答道：“有、有”。他急忙打开箱子拿出吸大烟用的“大烟枪”，双手捧给日本人。日本人接过来一看是个“大烟枪”恼羞成怒地吼道：“叭格牙路（混蛋）！”顺手用大烟枪朝王老阔头上打去，竟把王老阔打得头破血流，气绝身亡。

（杨德田提供资料）

阿比留的“卫生队”

1939年，通辽南城壕外秫秸杖子连成片，这就是供应城内居民蔬菜的菜园子区。当时没有化肥，菜农种菜用肥全靠进城掏厕所。有个叫阿比留的日本人街长，看到这大粪也是发财之道，于是便下令，不许菜农进城掏厕所，违者罚款，城内居民每月按人头缴纳掏厕所费，违者罚款。

为了垄断厕所，阿比留雇了一些人，成立了所谓的“卫生队”，专门掏大粪。他再把大粪高价卖给菜农，坐收渔利。

（杨德田提供资料）

大林镇的“南霸天”

1937年到1945年期间，在通辽大林镇有个单老五（排行老五，真名鲜为人知），阴险歹毒，仗势欺人，人送外号“南霸天”。当时单老五已年近六十，却娶了个二十几岁的小老

婆。单老五以其小老婆为筹码，得到了日寇汉奸的庇护，成为大林镇的一霸。

从大林火车站到南坨子边上，是一片水草丰美之地，生长着茂盛的羊草、蒲草、苇子和柴草。这里历来是百姓放牧牲畜、打草搂柴的场所。单老五依仗权势，公然把这片肥美的草地窃为己有，坐收渔利。附近的百姓只要到这片草地放牧、搂柴、打草，不仅要经单老五允许，而且还没要向他交纳一定数额的钱款；否则，轻者遭打骂、挨没收，重受刑罚。

单老五的罪恶行径，引起了百姓的无比愤慨。日本侵略者垮台后，人民政府镇压了单老五，为百姓铲除了一霸。

（张庆祥提供资料）

“二狼四虎”做洋奴

伪满时期，通辽大林镇有个姓董的伪甲长，自称董大敢干；他和其弟及他的四个儿子横行霸道，无恶不做，因此，被百姓说成是“二狼四虎”。

日本侵略者侵占大林后，董大敢干便死心塌地地给日本人当走狗。他一方面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卑躬屈膝，表现出十足的奴才相；另一方面，对百姓心狠手辣，无恶不做。

他家在镇外雇佣长工种了十几垧地，放牧着几百头（只）牛羊，在镇内还开了个专为红白喜事出租的棚铺，可谓一方富甲。他身为甲长，在工、商、政、军、警各界游刃有余，因此，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得通过他。普通百姓找他办事就得行贿、进贡；有的送礼薄一些到他家连屋也不许进。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下，董家的“二狼四虎”在大林一带为所欲为，民愤极大。“八·一五”光复后，八路军来到了大林镇，处死了董家最凶残的“一狼”“一虎”。

（张庆祥提供资料）

“卫生防疫”坑百姓

伪满时期，通辽地区流行过几次鼠疫。统治者为了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常常也大张旗鼓地在城镇、农村搞卫生和防疫。实际上是以搞卫生、防疫为名，行坑害百姓之实。

（一）查卫生

每到查卫生季节，防疫人员和伪警察就下乡串户，挨家检查，卫生条件好的，门上就贴上“合格证”；不合格者，就在门上贴上“死人头证”。有钱的人家吃的好、穿的暖、住的也舒服、阔绰，搞卫生很容易做到窗明几净，无虱无尘。穷苦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生活，房屋又破烂不堪，何以能达到“卫生标准”？但是，日本人汉奸对穷苦百姓家反倒要求特别严，只要发现人身上有虱子，或室内有浮尘、鼠洞，就会打骂或罚款。人连饭都吃不饱，怎么能交付罚金？因此，每逢查卫生季节，穷人就象过鬼门关，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二）打药针

每年的春、夏、秋季节，日伪政府都强迫百姓打药针，说是预防疾病。可是，人们却普遍感到，所谓的预防注射，反倒会使人患上新的疾病，打还不如不打。于是，就有人愤恨地说“小鬼子是在打毒针，好让中国人慢慢死光了，他们再往这里移民！”这样，到了打针的季节，百姓就会东躲西藏。但是，伪警察和汉奸拿着花名册，挨家挨户逐人核对，一旦发现抓获躲藏起来的人，不仅要毒打一顿，还要强行注射。

（三）验鼠疫

每年的五月，在各个村屯挨家逐户检验鼠疫。防疫人员和伪警察在检验鼠疫时不是采取化验手段，而是摸疙瘩。所

谓摸疙瘩，就是不论男女老少，一律脱光衣服，检验人员挨个儿用手摸股沟部。有的检验人员趁机对年轻媳妇和大姑娘乱抠乱摸进行猥亵。更有甚者，让一家人都脱光，对面站成两排，男对女，公公对着儿媳妇。不从者，就被扣上“抵抗防疫”的帽子，遭受毒打。被逼站好后，再挨个抠、摸，野蛮地渲泄他们的兽欲。被辱者因无脸见人，投井、上吊者也有之。

（四）隔离圈

疫情发生后，日伪统治者不是采取防治措施，而是实行隔离。把整个村屯隔离起来后，只许进不许出。隔离圈外，围着铁丝网，重兵把守。被隔离的百姓，得不到医治，交叉感染，死亡者急剧增加；而且有的断水、断粮，有的虽庄稼熟了，也不许出来收割……患上鼠疫的人，打上药针后反倒死得更快，不知那是什么药。

在每个被隔离的村子边上，都挖了“万人坑”，死者会立即被扒光衣服扔进坑内掩埋。有的患者尚未断气，也被抬出扔进坑内活埋。

有的村屯根本未发生鼠疫，而当局者却以“疑似鼠疫”为由，把整个村子隔离起来。1942年夏，大林村胡耀先因中暑而死，却被说成“疑似鼠疫”。遂将一个居民街隔离起来当局者一方面把胡耀先解剖后，扔进“死人坑”掩埋；另一方面把隔离圈内所有人的衣物都放入锅中蒸煮。折腾了近两星期，才解除隔离。

日伪时期，通辽县象这样被隔离的村屯和街道约占整个村屯和街道的五分之一左右。

（吴凤玉、张庆祥提供资料）

通辽电业史上的一幅悲壮画卷

—忆伪满时期的通辽发电厂

贺胜文

新中国建立前，通辽只有一家小型火力发电厂，发电容量最多时为2100千瓦。新中国建立后的40年，通辽火力发电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8年，在市东郊建起一座热电厂，陆续装设四台机组，总容量为18000千瓦，即向附近的糖厂、纸厂、油化厂提供生产用热，并且输入东北电网供电。1979年，又在市区西北八公里处兴建通辽发电总厂，是东北电网的主力电厂之一，如今两个210米高的烟囱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发电能力已达到80万千瓦。三期工程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计划安装三台60万千瓦大型机组，在“八五”计划期间，投产发电，将为建设繁荣昌盛的哲里木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亲眼看到今天通辽电力事业的发展，我（离休前任通辽汽车修配厂党委副书记）和赵金堂（离休前任通辽市人大主任）、路宝和（离休前任热电厂车间主任）、姜官生（离休前任通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忠山（离休前任发电总厂厂长助理）以及马序武、张国富等当年通辽电厂的老工人打心眼里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电力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同时也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在日伪时期的通辽电灯厂以及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工人們的悲惨境况。

1918年通辽始行县制。1922年郑（郑家屯）通（通辽）

大（大虎山）铁路通车。次年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私人投资65万银元，在通辽筹建了第一个发电厂。因为是私人投资又因为当时通辽没有工业用电只是为了照明用电，所以厂名叫“通辽电灯厂长记”。为什么“电灯厂”后边还要带“长记”二字呢？据说，吴俊升的长子吴太勋，乳名叫“长麟”。在“电灯厂”后面加“长记”，是为了标明这个厂是吴家的私人产业。

通辽电灯厂长记厂址，在现今通辽市第一中学南面。如今这里已无机器厂房，而是哲里木电业局楼院了。通辽电灯厂长记，建厂之初，只有一台由美国进口的“卡其斯式”发电机，发电容量为200千瓦，两台叫“哈义那式”锅炉，蒸气量为3.8吨/时。1930年又增设了一台500千瓦的“卡其斯式”发电机，同时又增添了一些厂房和附属设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践踏了东北三省和内蒙东部的大好河山。1932年8月，通辽电灯厂长记被日本人定为“逆产”，由逆产委员会接收，归奉天省公署实业厅管辖。1934年这个发电厂改名为奉天电灯厂通辽分厂；同年，伪满洲国在东北实行电业一元化，分厂归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改名叫通辽发电出張所。

据1935年8月满伪（东北）境内的电力概论资料统计，当时通辽发电出張所，拥有500千瓦和200千瓦汽轮发电机各一台，水管链条式锅炉4台，供电线路延长239公里，电杆（木质落叶松）979根，用电户1,367户，灯7,843盏，电业员工60人，其中日本人2名。

1938年在钱家店大林镇送电路线接通之后，又开始向开鲁送电。1939年又增设复转式发电机一台，发电容量为140千瓦。到1945年“八·一五”前，通辽发电出張所共拥有

三台发电机组，6台水管链条式锅炉，总发电容量为2100千瓦。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通辽发电厂虽然几易其名，但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厂名怎么变，都是为了把电厂抓在日本侵略者和它扶持、操纵的伪满政权的魔爪中，使其成为侵略者吮吸中国人民血汁的管道，成为巩固日伪政权的设施。

说起在日伪统治下工人的苦难，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

从1933年起，日本侵略者开始派他们的人驻厂当监理。监理，这个名称是中国语，并不难听，其实质是“太上皇”“特务”，是强加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洋老爷。1933年至1937年的驻厂日本人监理叫奥野隆一，1937年至1941年的驻厂日本人叫犬伏，1941年到1945年的驻厂日本人叫手柴房次郎。

手柴房次郎这家伙最可恶。他四十多岁，矮个头，满脸横肉，工人们背后都叫他“白毛子”。这家伙当了监理以后把发电出張所的各部门负责人都换成日本人。这时电厂员工总数百余名，其中日本人多达十几名。发电车间负责的日本人叫小石包；内外线班有两个日本人叫吉田、日野；营业室负责的日本人一个叫佐藤，另一个叫大塚武夫……他们也都像手柴房次郎一样专横跋扈。

手柴房次郎经常手里拎着“二人夺”文明棍，到处乱窜，见谁干活稍有迟缓或不顺眼，轻者“巴格亚路”（日语混蛋）臭骂一顿，重者抡起文明棍一顿暴打。1944年秋的一个夜晚，他身穿“和服”、足登木屐突然来到锅炉房。无事生非，硬说司炉工陶德明、朱恩印行动迟缓。二话没说，抡

起文明棍就打；用文明棍打还觉得不解气，又抄起一块木板打。直把陶、朱二人打得头破血流，才骂骂咧咧地走开。还有一次，一个日本人查岗时，见抬煤工人李玉桥不在岗，报告给手柴房次郎。手柴房次郎就让李玉桥跪在地上仰脖，名曰“羊羔吃奶”；光是罚“羊羔吃奶”还不算，又专派了一个日本人打李玉桥的嘴巴子。直把个李玉桥折腾得昏迷过去，才算拉倒。锅炉抬煤工马序武，在值夜班时，抽空去收发室取饭盒，回来的路上碰见手柴房次郎查岗。手柴房次郎不容马序武分说，夺过饭盒就摔，举手就打。事后，手柴房次郎非要开除马序武不可；马托人送礼说情，才算了事。

在那个年月里，中国人不被当人看待；在日本侵略者眼里，中国工人只是会说话的机器，是他们的奴隶。所以，前面说的工人被打骂、惩罚的事件，几乎是三天两头都有，现已离休的通辽市人大主任赵金堂，当时是青年工人。一次他把软水器的水泵打开放水，去仓库背盐去了。这事恰巧让日本人小石包看到。他见水泵旁没人，就盯在那儿，等赵金堂回来，不许分辩，就左右开弓打赵的嘴巴子，打翻在地就用穿着皮鞋的两脚乱踢。赵金堂被打得两腮红肿，两眼封口左腿走不了路，但还得坚持干活。

那时候，工人的劳动条件是相当差的。日本人的办公室里，有沙发转椅，工厂各车间连个板凳也没有，想休息只能在地板上，而且坐下息休还得不断左顾右盼，以防止被日本人看见，一但被发现就得挨打受罚。发电车间用煤，没有卷扬机，连小推车也没有，全靠工人用大柳条筐抬。装煤少说也有一百多斤，装少了不行，走慢了也不让，两人抬一筐，真够呛啊！锅炉全是链条式的，煤放进去燃烧不好还得用炉钩子捅，烧下的煤碴滚烫的，炉灰还得用铁锹一下一下往外清

理。就是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厂里连一点特殊劳动保护也不给。1943年夏天，检修工贾四，进四号锅炉除水垢，触电身亡。日本人硬说他在里面睡大觉压坏灯泡，不但没功而且有过，结果只给了价值二百斤米的血金就不了了之。可怜的贾四，年仅21岁的小伙子仅换了二百斤米，扔下一位老母亲，只得沿街乞讨过晚年了。

日伪时期的工人，政治上受欺凌，劳动条件差、强度大生活待遇却是很低的。当时，厂内日本人有特殊待遇。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经常给通过电业员工运送一些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先拿个够，然后是厂内的职员，最后到工人这儿就寥寥无几了。老工人张连成、金恩祥，一开始就在这个厂，可谓工厂元老，十多年间只分过一盒罐头，可见一斑了。

日伪统治下的电厂职工，分四等：职员、雇员、用员、长用夫。如今还健在的路宝和、马序武都是长用夫，日平均工资最多时挣0.52元伪币，只能购买二、三斤高粱米。1940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侵略战争，所需军费扩大，国力消耗殆尽。这个时候，就更不顾中国工人的死活了。市场物价暴涨，吃、穿、用都实行了配给制。配给工人的食物是橡籽面，穿的是更生布，而且数量极少。橡籽面这东西，人吃了涨肚，消化不好，拉不出屎来。更生布像粗麻袋一样不结实，穿些日子就坏。日本投降的前一年，连更生布也不给了。工人路宝和下水池捞水笼头，忘了脱厂里发的“工作服”，从水池里出来后两只衣袖全泡掉了。原来，这时的“工作服”是纸绳做的！现在讲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可这全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实。

那时候的中国工人可真苦啊！1942年夏天的一天，刮大风下暴雨，营业室营业员张国富独自一人坐在窗口瞭望，被

日本人佐藤看到了。佐藤走进营业室操起算盘，就向张国富没头没脑地打来。张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知道为什么。一气之下，张国富跑到开鲁考上兴农合作社；考上新工作，怕惹事，又没敢干。后来，借钱买了50个鸡蛋给日本人佐藤送去，慌说“有病在家休息”，才幸免未被开除。老工人全景胜，为人厚道言语少，劳动能干。家有7个孩子，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困难。1943年秋的一天，他因忙家务迟到了一小会儿，遭到日本人的训斥。他悲愤交加，绝望中在自己家的锅台上上了吊。幸亏被孩子发现，邻居杨忠山的爷爷果断地用菜刀砍断绳子，才救活了他的命。

中华民族是善良的民族、英雄的民族，她能够吃苦耐劳但绝不容侵略者长期欺辱。早在日本侵略军投降前的二、三年，厂里收发员小刘的哥哥刘子江，从关里来到通辽，入电厂当了工人。此人平时少言寡语，跟工友们一道干活，非常关心体贴有困难的同事。那时候，老工人王凤长、路宝和等私下议论：有机会非把手柴房次郎这小子塞进锅炉膛里炼了不可！刘子江劝阻了工友们简单鲁莽的行动。

1945年8月10日左右，通辽上空出现了苏联红军的飞机日本人慌了手脚。发电所所长手柴房次郎从宪兵队请来一名姓于的特务。这个特务戴着八角帽跟着坐班，见大势不好就溜了。这时，手柴房次郎、日野、小石包、佐藤等日本人全身披挂，腰插手枪、手握战刀，心神不安地在厂内来回走动。刘子江对一些老工人说：“日本鬼子要垮台了，要严防小鬼子临逃时暗下毒手，破坏发电设备、杀人……”他还暗地转告大家，“每人准备一件应手家伙，以备紧急使用”。工人们听了他的话，有的预备了一根管子，有的预备了一把铁锹，还有的预备了钳子、扁担，隐藏在身边。

刘子江的预言应验了。一天下午，手柴房次郎和日野，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按着腰中的战刀，由锅炉车间走到汽机车间，又由汽机车间走到配电室。他们气势汹汹地走进车间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见工人们都在场，而且已有所准备，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滚了出去。手柴房次郎转到院内的变电所时，气急败坏地举起手枪朝向开鲁送电的变压器，连打三枪。变压器的油立时淌泄出来，通开线停电了。

第二天，手柴房次郎、日野、小石包等十几个日本人及其家属都随着日军逃之夭夭了。

1945年10月，通辽发电出张所由通辽红军之友社接管，1400千瓦的发电机继续发电，供通辽城内和环城电网用电。10月下旬，人民政府县长徐永清和杨政委、黄秘书到电厂看望了工人。之后，厂里成立起工会，刘子江被选为工会主任。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一度占领通辽。1947年5月我军收复通辽，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把电厂做为破坏目标狂轰滥炸，抢修发电厂的十多名工人受伤、夺去了电厂数十名家属的性命。英雄的通辽电厂工人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了1948年5月1日恢复发电。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我已在《通辽发电厂往昔》中记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昔日的通辽发电厂是一幅豺狼横行、中国人当牛做马的情景；今日的通辽发电厂高楼林立庭院花香鸟语，恰似一幅美丽的图画。

历史的画卷已经翻过，新的图画正在描绘，必将锦上添花。让我们不忘过去，珍惜现在，为争取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吧！

铁路装卸工人的一次罢工斗争

雷明义

1940年的深秋，正是铁路装运粮食的繁忙季节。在通辽车站的货场上，日本侵略者逼迫农民交的“出荷粮”堆成了山。日本人渡边经营的“国际装卸搬运公司”雇佣了许多装卸工，不分昼夜地抢装粮食。装卸工们每天要肩扛二百斤重的粮食袋子几百次，从一百多米远的货场装进车皮。一百多名工人每天装满几十节车皮。天不亮工人就开始干活，除了中午有一小时吃饭时间外，一直干到天黑为止，中间不许休息。有的工人累伤了，有的工人累吐了血，渡边不但不闻不问，而且每天只给工人三角钱的工钱。

这一天，劳累了一天的装卸工们吃完了晚饭，在宿舍里休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工资。有人说：“现在咱们一天只挣三角钱，吃饭都不够。”有人说：“工资太低了，我们都是拉家带口的，根本维持不了生活。”于是就有人建议：“咱们找公司去，如果不给涨工资就不干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并推选李玉生、吴方玉等五名工人为代表，去同公司经理谈判。

第二天一早，这五名代表找到渡边，正式提出涨工资的要求。渡边听后勃然大怒，不但不答应工人们的正当要求，反而非常蛮横地说：“你们的提什么的要求，你们要闹事的有，你们大大的坏了的。”说着，伸手就打了为首的李玉生两个耳光。工人代表一看他根本不讲理，只好退了回去。

装卸工人们得知此事后，个个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一

致表示：渡边不给涨工资，咱们就不给他干了！随后，工人们开始捆行李，收拾东西，一会工夫就走光了。

当天，铁路货场里没人干活，第二天，仍然如此。货场大门外排满了送“出荷粮”的大马车，粮食无人卸，货场内积压的粮食无人装车，其中包括日本关东军的军粮和军用物资。渡边的上司得知此事后，非常恼火，渡边也没有办法。狗急跳墙，他串通了警察署，把家住城内装卸工吴方玉关押起来。

但是，粮食还是运不出去，尤其是军粮和军用物资，如果运不出去，上司怪罪下来，渡边的脑袋也要保不住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渡边释放了吴方玉，还说：“只要把工人找回来我答应你们涨工资的要求。”

这次罢工，虽然只有三天时间，但是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渡边还被撤了职，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注：本文根据老工人李玉生、吴方玉等人的回忆整理而成）

后 记

《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四辑——《血雨腥风十四年——哲里木盟伪满时期史料》，现在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从1988年起，我们开始征集这本史料专辑，历时三载。在此期间，曾得到了各旗县市政协同仁的鼎力相助。可以说，它是我盟文史资料大协作结出的一枚丰硕之果；它也必将推动全盟文史资料的大协作，向更广阔的领域迈进。在此，我们向各旗县市政协的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自治区、盟委、盟行署、盟政协及盟财政部门的领导，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内蒙革命老前辈王再天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盟委书记张廷武为本书题词；盟长特日根为本书作序；盟财政处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部分经费；盟、旗诸多部门为本书的发行，尽心尽力，以诚相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所收录的文稿虽大多属“三亲”资料，但距今毕竟将近半个世纪，记忆上的悖误在所难免；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如有遗漏，恳望多方人士批评斧正，不吝赐教。

哲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0年10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四辑·哲里木盟伪满时期史料·血雨腥风十四年

作者 =

页数 = 2 4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